

关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由来、 内涵和面临的课题

——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庆典

暨第 20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徐敦信

(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本大使)

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应运而生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双方在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两国关系的未来而确定的关系定位。2006 年 10 月安倍首相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宣布,将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这是中日双方首次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目的在于通过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

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谐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先后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这种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结盟,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更没有所谓的“假想敌”。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中方当然希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同日本发展睦邻友好,在更高层次加强互利合作,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但是日方起初对建立战略性关系十分谨慎,就连中日“战略对话”也不愿认同,而是坚持称之为“综合政策对话”。据说“战略”一词在日本长期被习惯地解读为“军事安全”。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向前的。在中日关系经历一段曲折实现转圜的新情况下,日方主动提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共识并公诸于世。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是两国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双方顺应潮流做出的重要选择。

第一,从双边关系看,中日关系经过邦交正常化以来 30 多年的积累,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日本对中国发展的认识有了积极变化,更多的人认定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方对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予以积极评价。彼此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都有了新的认识。中日关系面临深刻调整,需要确定新的定位,为两国关系继续前进指明方向。

第二,从地区合作看,进入新世纪,东亚区域合作方兴未艾,日益深化。中日同为亚洲重要大国,东亚的发展离不开中日形成合力,中日各自得发展也离不开本地区这一依托。形式需要双方拓展视野,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

第三,从全球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各国间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中日在 21 世纪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肩负更大责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气候变化、资源、能源、粮食等诸多全球性课题上,面临共同的挑战,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开展有效合作,共同为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2006 年以来,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之旅,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也随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特别是 2008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文件在继承中日前 3 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确定了重点合作领域和方向,全面规划了两国关系未来。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一致确认,中日关系对中日双方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重申继续恪守迄今三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第二,经济上,日方积极评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的巨大机遇。双方确认将不断扩大互利合作,继续发挥经济互补的优势,努力打造新的增长点,实现中日经贸合作由量到质的飞跃,并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作出贡献。

第三,安全上,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

第四,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双方将就本地区事务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就重大国际问题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继承和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面向地区和世界负有重大责任的关系。在日本有一种把战略互惠同睦邻友好、日中友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在我看,这不仅不符合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本意,而且也是对中日关系历史的无知。将中日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有助于双方超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不仅有利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对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发表,标志着中日关系将从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向前迈进。

三、如何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一再宣示,重视亚洲外交,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当前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争端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和损伤,但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并没有变化。胡锦涛主席和菅直人首相日前在横滨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努力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我认为,双方应珍惜机遇,把握好方向,多做实事,不断提高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水平。

双方面临的课题是什么?在我看,

第一,增进政治互信,巩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基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方称之为尖阁列岛,是中日间的一个老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老问题为什么会成为新的热点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互信的缺失而导致对形势的误判,进而造成行动的升级。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人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企图干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增进政治互信最有效的途径,是保持高层交往的势头,同时加强议会、政党、防务交流与对话,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和分歧。

第二,推进务实合作,夯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经济基础。有些舆论关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并进行种种推测和评论。我看到中日双方对此都宜保持平静。因为中国即使 GDP 总量赶上或超过日本,人均 GDP 仍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将长时间处于“发展中”阶段,仍需继续借鉴学习日本,深化同日本的合作。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将不断为中日经贸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为日本带来更多的商机。当前,双方要着眼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发挥经济互补的优势,在节能环保、绿色经济、高端制造及高新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打造新的亮点,推动中日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双赢。

第三,改善、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强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社会基础。最近民调显示,两国国民感情一度有所改善之后,最近又大幅下滑。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是双方面临的重要课题,需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持之以恒地开展人文交流,改善并增进两国国民的友好感情。

第四,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拓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空间。面对国际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双方在全球层面,利用好 G20、APEC、气候变化会议等平台,就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推进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气候和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加强沟通与合作。在地区层面,顺应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携手推进中日韩和东亚区域合作,致力于亚洲的振兴。

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庆典 暨第 20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伊东光晴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首先,我对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表示祝贺。

在这 20 年里,有许多日本的研究者访问了这个中心,他们在介绍日本经济情况的同时,也加深了自己对中国的理解。此外,由中心主办的研讨会,每年也吸引了中国各地的日本研究者前来聚会。因此,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规模虽然不大,但确实成为了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基地。

我第一次访问复旦大学,是在 1976 年。当时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将由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会长、副会长的信件递交给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校长。那封信的内容是,为了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希望中国今后能够参加世界性的学会。就在那次去北京的归途中,我访问了复旦大学。

中国第一次参加上述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是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之后,中国经济,还有复旦大学,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在今天,日本研究中心也有了崭新的、漂亮的研究大楼。

我们日本的研究者,对中心成立 20 周年、对新研究大楼的落成,表示衷心的祝贺。

不过,为了盖新楼而拆除了原来的旧楼,我内心不免有些凄凉。不仅是因为我和那所旧楼有些渊源,也因为这意味着,随着新楼的落成,包括为日本研究中心的创建而付出了努力的第一任所长郑励志教授、还有我本人在内,我们老一代人的时代结束了。

但在同时,我们也热切期待,由于新楼的落成,新一代会更加努力地为中心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对筹措了日本研究中心设立基金的三人之一的已故的日本卫材公司内藤佑次前董事长、为中心的建立而殚精竭虑的郑励志先生、对中心持续提供了经济支持(支持的规模超出了当初对我的承诺)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表示我的感谢!

2010 年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 和日美关系、中日关系

林晓光 周 彦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 2010 年日本民主党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及日美关系、中日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以外相前原诚司为代表的部分日本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强硬立场和对抗行为有可能成为日本政府开展周边外交的软肋或障碍,有碍于日本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围绕钓鱼岛撞船事件,本文对中国外交、对日政策和处理中日关系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 民主党 对外政策 日美关系 中日关系

菅直人新内阁成立后,形成了首相、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外相前原诚司、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幸男为决策核心的“党政领导体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许就是任命前原诚司出任外务大臣了。菅直人内阁在外交方面的首要任务,无疑是回复因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而有所恶化的日美同盟关系,推动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等日美间重大问题的进展,推进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与稳固。前原具有国际政治学的专业背景,又在美国留过学,素以在安保问题上的强硬观点而著称,在美国有相当的人脉和人气,因此是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适当外相人选。前原任职后迅速访问美国,也足以说明了其政治偏好与政策重心之所在。但是,前原在安保问题上“同意行使集体自卫权”,坚持“中国威胁论”,在安保问题上对周边国家持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以及遇到问题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化解,而是强硬对抗、毫不妥协的行为模式,则可能成为日本政府开展周边外交的软肋或障碍之一,有碍于日本政府通过外交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一、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日美关系

众所周知,在中日关系的背后,总是有美国的影子在或明或暗地晃动,这一次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较量,背后恐怕也少不了美国的因素。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是两手:一手是战略保证,另一手是战略遏制;近来更有从前者向后者倾斜的迹象。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表现在军事方面:1、加强美日合作,派出 P-3C 巡逻机全面侦察,防止中国舰队接近冲绳列岛东侧;2、美军 F-22 隐形战机进驻冲绳,对中国进行威慑;3、与日本自卫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海域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夺回被占岛屿”的军事演习。^①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冲突以后,美国著名的亲日派人物、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亲自到日本,说中国是在考验日本。^②言下之意是要日本顶住压力,对抗到底。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在“美日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日本对于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地区安全问题以及社会、政治的挑战至关重要。

要。美日关系是美国能够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的关键。因此,必须“通过东京”来确定美中关系。^③在中日两国正在为钓鱼岛而进行角力和博弈的时候,拜登的这番话无疑给了日本政府足够的鼓励和支持。菅直人新内阁上台后,提出“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展开外交”,坚持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评价。^④我们也不妨把这样的表态视为对菅直人新内阁的间接支持。

而菅直人新内阁成立后,首相的首次出访又选定美国,恢复了战后日本历届首相就职后首先朝拜白宫的做法,再一次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菅直人新内阁将把日美同盟关系置于外交的首位,全力以赴修复因普天间基地问题而冷淡的日美关系,继续仰仗美国的安全保护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动,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自民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借船出海”的战略方针。这与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与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显然是不一致的。此后,在冲绳美军基地、东亚峰会、G20 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等一系列问题上,菅直人内阁一直坚定支持美国的政策立场,鲜明地表现出日本外交对美倾斜的政策偏好。2010 年 11 月 13 日,菅直人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美国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上支持日本感到高兴、表示感谢,强调美国和美军的存在愈加重要。日本官方人士就此解读说:“这意味着菅直人首相已从鸠山首相推进的‘对等日美同盟’明确转向‘同盟最优先’战略。”^⑤日美学者也鼓吹通过高呼日美同盟关系来对付中国。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提出:应加强日美关系,以牵制中国。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亚洲部长伊丽莎白·艾科娜米主张:应果敢地面对因对中国让步而带来的危险。^⑥学界的言论对于政府外交而言,既是出谋划策,也是摇旗呐喊,更是互相配合。

作为这一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与合作机制,美日两国政府决定在 2010 年年内启动磋商工作,使日本发生“突发事件”时的防务合作具体化,并可能修订 1997 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以及 2005 年达成的“共同战略目标”。2011 年春季菅直人访美时,两国将发表新的有关深化美日同盟的联合声明。中日撞船事件、中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等,引起奥巴马政府内“对华强硬论”的高涨,俄罗斯总统视察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让美日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深化同盟关系,从而推动了一直停滞不前的有关深化美日同盟的磋商。相关磋商工作将在美日双方的外交和防务部门的局长级官员间进行。此举有可能推动美日同盟关系的深化,并成为《美日安保条约》体系的“转折点”。^⑦菅直人内阁的这一战略调整既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传统回归,也是对鸠山内阁外交失败的反省,更是由于与中、俄两国的关系同时发生危机以后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否已形成相对固定或严谨的战略框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美国政府似乎对此心领神会。2010 年 9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纽约会面。前原诚司主动在会面中提及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希拉里表示,希望中日在事态进一步升级之前能尽快解决撞船事件,中日关系对亚洲地区稳定十分关键。但美国国防部高层却异口同声地表示,美国会履行对盟国日本的防卫责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表示:“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须要提高警戒的迹象;但很显然,我们强烈支持我们在该区域的盟国日本。”国防部长盖茨:“我们将会履行我们做为盟国的义务。”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撞船事件后首次高调重申同盟义务,宣称支持日本;另一方面,直到 10 月 28 日希拉里与前原在夏威夷会谈时,才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涵盖钓鱼岛。说明美国政府仍然沿用既定的模糊政策,保持中日之间以及钓鱼岛问题的有摩擦、但可控的现状。正如国务

院发言人克劳利转述双方会面内容时所说,美国无意为中日斡旋,希望中日经由法律与外交途径化解争端,美方相信中日两国都不愿看到局势恶化至对地区稳定造成长远影响。^⑧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暗中给日本打气。由于前日本首相鸠山曾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所以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政府曾计划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全新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础,但由于受到中日钓鱼岛等事件的影响,日本已经放弃将日中关系作为日本外交一个关键支柱的计划,转而寻求传统盟友美国的支持,并拉拢与日本一样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的其他亚洲国家。报道援引一名日本匿名官员的话称,“现在任何人都已不再考虑重新平衡中日和中美关系了。日本曾经这样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名官员还说,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所产生的危机再次拉近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报道称,日本还将寻求亚洲地区其他同样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国家的援助。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部署重点是为了“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相配合,加强日美同盟的实质内容”。^⑨

因此,钓鱼岛撞船事件很可能使日本更加依靠日美同盟的安全保障,美国在这一双边同盟中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必将会利用这一事件强化驻冲绳美军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心理效应,使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美国亚太战略的实用主义极为明显:在地区战略格局方面,作为优势者保持主导地位;而在地区内双边问题方面,则作为斡旋者相对超脱,保持有利地位。因此,美国政府一直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上采取模糊处理和两面下注的方针。一方面,不时向日本作出支持性表态,以安抚日本,稳定日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文字协议和实行机制方面,又竭力保留“灵活处置”的回旋余地。这种“总体肯定、局部灵活”和“保持介入又相对超脱”的态势,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是最为有利的。尽管,日本政府试图借助日美同盟来应对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增加日本外交的资源 and 筹码。前原外相也力图通过促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放话来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为个人政绩加分。但是,日本政府“挟美自重”的外交,试图通过华盛顿来解决地区问题的政策,不仅因为不符合美国亚太战略的灵活策略而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关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共同防卫”条款不适用于日俄领土争端的表态就是明证。^⑩而且企图利用美国压制亚洲国家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困境。日本同时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最大的邻国发生领土纠纷,证明了菅直人内阁外交缺乏战略远见和宏观视野的局限性,以及轻易采取对抗性姿态,致使矛盾激化、危机升级的政策行为的幼稚性。

据日本共同社 2010 年 11 月 8 日发表的舆论调查表明,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 47.6%,大幅下挫到 32.7%,而不支持率却从上个月的 36.6%,上升为 48.6%。其中 74% 的受访者对菅直人内阁的外交“不予好评”。^⑪显然,外交方面的进退维谷已经成为菅直人内阁目前最大的失误,强硬姿态不仅一无所获,反而令日本经贸损失惨重,而修复对外关系又被国内政治势力攻击。导致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出现逆转,创下执政以来的新低。因此,如何在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社会福利问题难解的同时,处理好外交问题,已经成为对菅直人内阁和民主党政权的新考验,也许将是决定民主党能否继续执政的关键。

二、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民主党于 2009 年 9 月上台执政后,鸠山首相首先访问中国,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地区

一体化构想,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甚至同意就两国 2008 年达成的合作开发东海天然气田的“共识”开始进行有关“双边协议”的谈判,这实际上中方在涉及到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与日方进行协调。同时,民主党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以及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也都得到了中方的好评,从“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建立起来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民主党鸠山内阁时期也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然而,历史问题毕竟是历史认识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与现实利益多少有一些距离;而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的开发等领域主权、海洋权益的问题,则属于核心利益范畴。而且随着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的焦点逐渐淡化,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争反而更加突出,更加容易引发中日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钓鱼岛问题使得中日两国在核心利益方面的碰撞无可避免地提前到来。

1、钓鱼岛撞船事件及前原出任外相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0 年 9 月 7 日,发生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撞击中国渔船并抓捕中国渔民、扣押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后,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是日本政府内主张坚定立场、绝不退让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他不仅扬言要按照日本的国内法律审判中国渔船船长,还亲自到冲绳的石垣岛视察与中国渔船相撞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此举无疑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拉抬了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和紧张程度。对于中国向“春晓”油气田运送器材一事,前原也高调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中方开始钻井作业,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所谓相应措施包括,在临近“春晓”的海域进行勘探,或向国际法院起诉等。^⑩9 月 18 日,日本石垣地方法院决定继续拘留中国渔船船长 10 天。这一导致中日对抗加剧升级的裁决,在前原刚刚出任外相之后就做出,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许多联想。

2010 年 9 月 21 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说,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日方最近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至今不释放中方船长,这是完全非法的、无理的。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日方置若罔闻,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在此,我强烈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进一步采取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方要承担全部责任。温家宝指出,经过多年艰苦努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这一良好势头遭到严重破坏,完全是日方一手造成的。日本政府应该迅速改变错误做法,使中日关系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合作世界潮流。^⑪日方显然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向日方发出的严厉警告的分量。日本媒体指出:这等于是向国际社会、向日本发出了决不让步的宣言。中国发起了最高级别的外交战。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提出“还是尽快解决为好”的建议。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称:要在作出顾全大局的政治判断的同时,依国内法进行处理。虽然还坚持“用处理国内法处理”,但已经不得不首先强调要做出“顾全大局的政治判断”。^⑫9 月 24 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厅决定在“保留处分”的前提下放还其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中国外交部认为日方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的人权,要求日道歉和赔偿。日本首相则予以拒绝。^⑬日方还向中方提出了船只“修理费”的请求。

在表面上坚持对抗的同时,日方也开始寻求修复关系的渠道。9 月 29 日,曾担任民主党副干事长的细野豪志秘密访问中国,与中方总共进行了长达 7 小时的会谈。随后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戴秉国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通了电话。10 月 4 日,出席亚欧会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会面。10 月 11 日,中日两国国防部长会晤。接着,民主党元老江田五月访华,转达了菅直人首相发展中日关系的口信。双方一些暂时停止的双边交流开始恢

复,两国关系逐步走向回暖。^⑩但日方传送出来的混乱信息:首相菅直人直指“中国威胁”,外相前原指责中国“歇斯底里”,恶化了中日之间的气氛,指使中日两国政府首脑不能在东亚峰会正式会晤。

无论是非法抓扣中国船长,还是准备全面对抗中国重开春晓油气田生产,前原的态度一直都十分强硬。实际上,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于钓鱼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并非法抓扣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中,作为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分管海上保安厅,是实际的幕后指挥者。前原的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日本取消与日本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的第二轮谈判,中止了与日本的省部级官员交流,以及其他双边交流计划,从而给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带来毋庸置疑的负面影响。菅直人新内阁上台伊始,中日关系会变得如此之糟糕,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再一次说明了中日关系的敏感脆弱和复杂易变的特性。

前原如今被菅直人任命为外务大臣,成为市民运动起家、不擅长外交的菅直人首相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的最得力、最主要的助手和决策者之一。在他担任外相期间,日本外交、尤其是对中国政策将何去何从?他任外交上表现出来的“亲美抗中”的思想,会不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走向“冷却”?成为国际社会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甚至担心:前原当外相一天,中日关系就会紧张一天。^⑪这一疑虑也许并非杞人忧天。无论如何,听其言、观其行,是必不可少的。

2、中日关系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调整

如果我们放眼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许会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民主党政府、菅直人新内阁选择在这个时候在钓鱼岛问题上出手挑衅,到底是随机的偶发性事件,还是将蓄谋已久的战略安排付诸实施?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撞击中国渔船、抓捕中国渔民、扣押中国船长这一事件本身倒不一定是预先设计好的,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及其发生后日方坚持适用国内法审判中国渔船船长的强硬方式,无疑反映出日本政府外交安全战略的调整苗头和转型方向,这个方向性的转变,也许不会因为日本国内政党的轮替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海军高扬保卫国家海洋权益的旗帜走向太平洋的动向,都使日本政府忧心忡忡,一些右翼势力更是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称之为“威胁”。随着“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政治、安全、财界、媒体、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甚嚣尘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在日本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虽然日本国内也不乏主张与亚洲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有识之士和社会力量,但相当一部分势力甚至可能是政界、政府的主流势力,都试图趁中国羽毛未丰之际,背靠日美同盟,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自民党政府如此,菅直人新内阁看来也是如此。

因此,仅在2010年,日本政府就连续出台了多项防范中国、指向中国的政策措施。如:宣布25个离岛“国有化”,并宣布将在离岛驻军;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西南诸岛方向的安全真空”,表示要加强在西南方面的防卫力量;将驻冲绳的混成团扩编为2100人的第15旅团、再继续扩充为8000人的师团,并在其编成内设立“两栖作战部队”;向冲绳派驻作战半径达2000多公里的F—15战斗机,以取代老旧的F—4战斗机,前者的巡航距离超过后者1000多公里;拟陆上自卫队从15.5万人扩编到16.8万人,因为陆上自卫队幕僚监部认为:由于中国海军在日本新岸海域的活动日益频繁,必须扩充陆上自卫队编制以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拟到2020年将目前2000人的冲绳驻军增加10倍达20000人。拟于12月于美军举行

“夺回被占岛屿”的军事演习,公开以中国为“假想敌”。^⑧钓鱼岛的事情还未完结,就又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挑起争端,2010年补充预算还将为海上保安厅增加2000亿日元的经费。^⑨将于2010年底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也将重点防范中国,“将自卫队部署重点转移到西南群岛”的消息。由于被称为“西南诸岛”的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海军舰队进出太平洋的主航道,因此不排除日本政府此举是“针对中国”。

日本政府的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似乎是想把钓鱼岛问题作为一块试金石:一则测试美国,看美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钓鱼岛”。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历来是一个三段式的表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政府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所有地区,钓鱼岛处于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权之下,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包括钓鱼岛”。但是最近奥巴马政府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不再说第三句话,这就让日本政府心里发毛、脚下发虚,因此说日本政府试图在钓鱼岛制造事端以便逼美国政府明确表态、重复第三句话,似乎并非毫无道理。^⑩但美国政府关于钓鱼岛的表态并没有使日本政府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美国政府发言人克劳利仍然只讲前二句话,看来美国政府并不想陷入日本政府的圈套,仍然坚持。

美国政府在1970年代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政府之际,“故意”将钓鱼岛作为冲绳的附属岛屿也纳入归还之列,造成了中日之间的一个纷争火种,以便于美国利用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从中渔利。与此同时,老谋深算的美国政府又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政府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日本的行政权而削弱了其他要求者的权利。”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移交的冲绳(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既不能增加或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政府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也没有拒绝或消灭其他要求者对上述岛屿的合法权利。众所周知,在甲午战争以前,是中国政府一直有效而不间断地在台湾和钓鱼岛行使着行政管辖权利。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移交的冲绳(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当然也不能涉及或包括钓鱼岛。可日本政府却无视这一明显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坚持把钓鱼岛视为日本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认为冲绳的行政管辖权涵盖钓鱼岛,并一再于政府更换之际要求美国政府明白无误地确认这一点。日本媒体也摇旗呐喊宣称:美国暗示或间接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从未承认过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而是“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主张”,主权之争是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希望有关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纽约时报》指出:我们不承认尖阁群岛(中国的钓鱼岛)主权归日本所有。^⑪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立场的理解,应该比日本媒体更加准确吧。

二是测试中国,看中国的国力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有坚定的意志捍卫领土主权,是否拥有保卫领土主权所必须的政策和手段,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信与技巧与老牌列强在国际舞台上周旋?选择钓鱼岛发难,说明日本政府已经从对钓鱼岛的低调实际控制转向法理法权拥有,并试图通过控制钓鱼岛来扩大海洋版图,控制相关海域的海底资源。扩充陆军人数,准备在西南诸岛驻军,就是为政治、外交、法律的争夺提供军事力量的后盾和依托。借助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政府通过抓捕中方人员、扣押中国渔船、对中方人员适用国内法的方式(尽管没有进入实际审判,但由日本法院批准拘留中国渔船船长十几天,实际上已经是经由司法渠道进行了处理),向国际社会证明钓鱼岛在日方控制之下,只有日方才能有效行使管辖权。日方将坚持严格管理,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非本国船只进行拦截、驱逐和扣押,迫使中国的

渔船和公务船等知难而退,不再试图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

另外,很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就是在中国全力以赴进行和平发展的时候,故意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权、领土问题上进行挑衅,诱使中国在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就过早地陷入与他国的权益之争,造成中国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假象,拉拢国际社会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同时,以此作为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实,在日本国内推高“中国威胁论”的调门,为针对中国的扩充军备、修改宪法、转变安全战略方针、调整防卫力量布局而制造社会舆论环境和引导“民意”支持。这实际上反映出,尽管中日之间已经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但日本对中国还缺乏最起码的战略互信,也不在乎在出现利益纠纷时,无视中国的利益和中国人的感情进行强硬对抗而损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国际媒体指出: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力量和意志的公开较量。^②从中方的角度看,能够借力打力,努力使国际社会了解到钓鱼岛不是日本的主权领土,而是一个中国也提出拥有主权的有“争议”的岛屿,使日方暗中实际控制钓鱼岛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今后将继续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单方面行使管辖权,而中方则可以借此机会理直气壮地定期出动公务船,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海上执法,并使之定期化、常态化,从而达到宣示和实现领土主权和行政管辖的目的。

三、关于目前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2010年11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横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内阁首相菅直人,实现了中日两国领导人自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日本政府急于摆脱在中日关系上的困境,外务省亚大局长斋木昭隆多番交涉,直到会谈前的35分钟才最后落实,在傍晚会议的间隙举行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谈。^③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谈虽然只有22分钟,但是达成了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之下深化合作、加强协调的共识,重申了各自对钓鱼岛主权的立场。这一会谈对于改善目前的中日关系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日双方修复彼此关系的难度。^④因此,对于中国外交而言,如何从钓鱼岛撞船事件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对日政策乃至总体外交提供有益的思想性资源,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界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目前的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来看,其对中国政策的整体战略性框架还不够明朗和清晰,恐怕还无法断言日本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因而将全部外交、安保的资源都用于对付中国,为此有预谋、有计划地在国际社会构筑反华包围圈。但其政治外交理念视中国为威胁的因素正在上升,其战略安排、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中国的疑虑和防范,并且利用与中国的纷争煽动国民情绪、进行国内政治动员,进行外交结盟。这一政策行为模式是否将继续和发展,是否会逐步固定化为明确的战略安排和行为模式,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笔者认为:此次钓鱼岛撞船事件也给中国外交、对日政策和处理中日关系,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1、类似钓鱼岛问题这样涉及核心利益的中日较量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后恐怕还会有更多、更为激烈的较量和博弈。我们下一步也许可以考虑,如何迫使日方承认钓鱼岛是有“争议”的议题,同意与中方进行谈判对话,以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预防外交机制,并逐步纳入与海洋权益相关的课题,渐次扩大到有关岛屿归属的主权谈判。日方很可能

会一口回绝。对此,我们不必非要毕其功于一役,应该以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详尽的政策设计以及对策预案,与其周旋,争取通过外交谈判在国际社会重新确认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调整“事后对策”的滞后反应模式,同时加强对于祖国海疆的海上执法行动,以免将来有一天因为措手不及或料想不到而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2、中国即使在这样的博弈和较量中赢得胜利,也不会没有成本和代价。代价之一就是几年来努力推进的中日友好睦邻关系受到影响,两国国民感情再度恶化;日本政府听任国内反华情绪升高,并渲染“中国威胁论”,30多年来首次增加兵力和潜艇数量,推出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与美军联合举行“夺回被占岛屿”的军事演习,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强调驻冲绳美军的地区威慑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美日咄咄逼人就偃旗息鼓、不敢放手较量,但也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减少负面影响,尽量以小的代价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尤其要掌握好博弈的力度与节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避免得不偿失的情绪性、非理智性的决策冲动。

3、注意在外交斗争中协调好政治斗争与舆论宣传的关系。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本质在于钓鱼岛主权争议,日方在有争议的地区单方面执法,并试图运用国内法审判中国渔民,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自圆其说,是导致事件升级的主要方面。但我们的对外宣传是否及时、全面、准确、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解释和说明了这个问题呢?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一场外交博弈中赢得胜利,更关系到能否在得分的同时,也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确立、巩固而不是损害中国作为建设性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

4、加强战略思考与政策设计。中国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把握好20—30年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针,同时谨慎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同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树立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国际形象,需要我们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

5、如何与民主党打交道,努力做好对民主党的工作,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可以分几个层次开展工作:一是民主党高层,即现在掌握党政大权的人物。二是民主党内各个部会的负责人,将来有望走上前台的年轻议员。三是新当选议员的“一年生”“二年生”,应在其政治理念、对华印象尚未完全形成之即,及时对其开展工作,帮助其建立正面的对华印象。四是民主党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经常的交往,建立感情,在国会议员身边创造对华友好的氛围与环境。

注 释:

①《每日新闻》,2010年9月17日。

②共同通信东京2010年9月15日电。

③法新社华盛顿2010年9月20日电。

④《美中韩对菅直人连任的反应》,《产经新闻》,2010年9月15日。

⑤《日本转向日美最优先战略》,《读卖新闻》,2010年11月14日。

⑥《周刊东洋经济》2010年11月6日。

⑦共同社东京2010年11月16日电。

⑧《纽约时报》,2010年10月28日。

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0年11月17日。

- ⑩共同社华盛顿 2010 年 11 月 2 日电。
- ⑪共同社东京 2010 年 11 月 8 日电。
- ⑫《前原明确表示如中国开始开采就采取对抗措施》,《产经新闻》,2010 年 9 月 18 日。
- ⑬中新网纽约 2010 年 9 月 21 日电。
- ⑭《读卖新闻》,2010 年 9 月 23 日。
- ⑮共同通信那霸 2010 年 9 月 24 日电。
- ⑯《日中官民交流正式恢复》,《朝日新闻》,2010 年 10 月 11 日。
- ⑰《中日关系为何变得如此糟糕》,日本新闻网,2010 年 9 月 21 日。
- ⑱《产经新闻》,2010 年 11 月 17 日。
- ⑲《每日新闻》,2010 年 10 月 6 日。
- ⑳法新社东京 2010 年 9 月 19 日电。
- ㉑《纽约时报》网站,2010 年 9 月 16 日。
- ㉒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010 年 9 月 22 日。
- ㉓《日本试图与中国修复关系》,《华盛顿邮报》,2010 年 11 月 13 日。
- ㉔《简短会谈显示修复关系的难度》,《纽约时报》,2010 年 11 月 13 日。

(林晓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周彦:齐齐哈尔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 19 页)

注 释:

- ①李明博:《在当选总统后举行的第 1 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韩国《朝鲜日报》,2007 年 12 月 21 日。
- ②朴振:《谈新政府的对外政策》,韩国《联合新闻网》,2007 年 12 月 30 日。
- ③柳宗夏:《重新建立信赖的关系》,韩国《联合新闻网》,2007 年 12 月 21 日。
- ④尹正浩:《韩美军方未就美军南撤达成协议》,韩国《朝鲜日报》网络中文版,2004 年 6 月 9 日。
- ⑤社论:《韩美关系恢复加强如前就会万事亨通吗?》,韩国《朝鲜日报》,2007 年 12 月 24 日。
- ⑥《李明博访美前同记者的谈话》,韩国《朝鲜日报》,2008 年 4 月 14 日。
- ⑦韩国《朝鲜日报》,2008 年 5 月 2 日。
- ⑧韩国《朝鲜日报》,2008 年 5 月 8 日。
- ⑨韩国《朝鲜日报》,2008 年 5 月 23 日。
- ⑩韩国《朝鲜日报》,2008 年 6 月 29 日。
- ⑪中国评论月刊网(chinareviewnewb.com),2010 年 7 月 24 日。
- ⑫韩国《朝鲜日报》,2010 年 6 月 3 日。

(刘永辉:天津东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胡令远)

“天安舰”事件与“韩美同盟”

——兼论对日本的影响

刘永辉

内容提要 李明博政府执政后,韩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作了较大的调整,恢复和加强“韩美同盟”成为其重要的施政目标。2010年3月26日爆发的“天安舰”事件成为韩国恢复和加强“韩美军事同盟”的良机。需要看到的是,李明博政府在借助“天安舰”事件执政地位的同时也失去部分选民的信任,并且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伤害了韩国同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

关键词 “天安舰”事件 韩美同盟 李明博政府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2010年3月26日21时45分许(当地时间),排水量1200吨的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黄海朝韩两国争议海域发生爆炸沉没,造成46名船员遇难,58名船员获救。韩国《朝鲜日报》称,“天安舰”爆炸沉没是韩国海军史上最大惨案。在韩国海军历史上,巡逻舰级以上大型战斗舰因爆炸而沉没这还是第一次。

“天安舰”爆炸沉没事件发生后,立即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事发当晚,李明博总统紧急召集国防部长官、国家情报院长、外交通商部长官等相关人员举行紧急安保会议。韩国警察厅于事发当天命令首尔市、京畿道、仁川市和江原道各地警察厅进入“2级紧急状态”。翌日晨,在青瓦台的地下掩体内,李明博再次召开紧急安保会议,要求“在考虑到所有可能性的情况下,实施迅速且彻底的调查”,并命令军方尽全力搜救。随后,韩国政府下令全体公务员进入“非常待命”状态。这是韩国自2004年卢武铉总统遭弹劾事件以来,首次启动全体公务员“非常待命”机制。

经过近2个月的调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于2010年5月19日宣布,已查明导致“天安”号警戒舰沉没事件的原因是鱼雷爆炸,并且“确信”是朝鲜击沉了该舰。韩国于20日正式公布“天安舰”事件调查报告,并与美国积极磋商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美国由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支持韩国,并逐渐强化韩美军事同盟。

一、恢复和加强“韩美同盟”是李明博政府的施政目标

李明博政府执政后,韩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在对外政策方面,一改卢武铉政府时期的疏远美国的做法,公开宣称:“将推行超越进步和保守的实用主义外交”,通过“积极的亚洲外交”、“以信赖为基础的韩美同盟”等政策使外交关系多元化,从而在国际社会提升韩国的地位。^①总统权力交接委员会外交统一安保委员会干事、大国家党议员朴振就李明博政府具体的外交基调表示:“将加强韩美关系,推进与日本建立实用性合作关系,进一

步提升韩中关系,并与俄罗斯启动能源资源互访外交。”^②这充分表明,李明博政府将推行以“四强”为中心的积极的外交政策,在推行“四强外交”方面,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的,是将恢复和加强“韩美同盟”关系放在了第一位的。李明博在当选总统的翌日就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表示:“将尊重传统的韩美关系,新一届政府将进一步加强韩美关系。”曾担任李明博竞选班子外交领域共同选举对策委员长的前外务部长官柳宗夏对此评论说:“此番言论的主旨是,摆脱前一段时间同美国之间的尴尬关系,恢复传统的血盟关系,对于日本也摆脱被害意识,建立实用关系。”^③

为什么李明博在总统竞选期间和执政后总把恢复和加强韩美同盟关系放在口头上,成为其主要的施政目标呢?这是因为韩美同盟关系出了问题。

二、李明博力图修补韩美关系中的裂痕

自二战结束后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韩美同盟关系已经渗透到韩美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于韩国来说,这种同盟关系几乎成为韩国须臾不可缺少的屏障和后盾。基于这种原因,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韩国十分看重并竭力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此期间,韩国虽然也不断地有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等抨击韩美同盟关系或抗议驻韩美军劣行等事件发生。但那毕竟是少数的、个别的现象,无伤大局。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紧密的、稳定的。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韩美同盟关系却出现了明显裂痕。

2002 年 6 月,驻韩美军装甲车在军事演习中轧死两名 14 岁的韩国女中学生。事件发生后,韩国各地要求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SOFA)的示威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迫使美国不得不就修改协定事同韩国进行谈判。正是在这种空前的反美形势下,主张实行对美自主外交的卢武铉于 2002 年 12 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当选为韩国第 16 届总统。韩国民众铺天盖地而来的反美浪潮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韩国民众的反美行动,使美国社会也出现了反韩情绪。美国人认为“韩美关系进入最坏阶段”。鉴于韩国卢武铉政府和民众的反美情绪,美国政府突然决定将驻扎在三八军事分界线和首尔龙山区的美军向朝鲜半岛南方迁移,并裁减和撤走部分驻韩美军。尽管美方强调裁减驻韩美军是根据《重新部署驻海外美军计划》进行的,并表示不会影响到韩美同盟关系。但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此举是美国对于韩国反美立场的一种反击,是发泄不满的一种手段。于是,不仅在驻韩美军南撤的时间上,而且在新基地使用面积上,韩美双方出现了严重分歧,双方互不让步。以至于代表美方谈判的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帮办理查德·劳利斯哀叹:“我觉得相当困扰和伤心,结盟 50 年的韩美关系因为 30 万坪土地这点分歧争论不休,令人很失望。”^④

虽然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美方同意将分阶段撤军的最后期限推迟到 2008 年,但在撤军规模上始终未作出让步。裁减驻韩美军进一步加深了韩美同盟关系中的裂痕。其后,韩美之间围绕朝鲜核问题、朝鲜人权问题、驻韩美军的作用问题、建立导弹防御体系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以及卢武铉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均衡者论”等问题不断地出现分歧和磨擦。美国方面对于韩国的一系列反美亲朝的看法和做法公开表示不满,甚至有人哀叹韩美同盟关系快到“离婚”的地步了。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李明博反复表示要“尊重传统的韩美关系”,并于正式就任总统之前向美国派去以郑梦准为团长的特使团,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面交了李明博的亲笔信,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以至于被评价称:“恢复了失去十

年的韩美同盟”。美方甚至有人提出：“现在应该将韩美同盟的水平提高到美英同盟、美澳同盟的水平。”^⑤

如同历届韩国总统上任后要首先访问美国一样，口口声声强调“要恢复被损害的韩美同盟”、“要扩大韩美同盟”的李明博，在其就任总统后不到 2 个月的 4 月 15 日至 20 日访问了美国。李明博访美前就一再表示：“核问题等与北韩有关的政策，将通过进一步加强同美国的传统同盟关系予以解决。”“将解决韩美自由贸易协议案，促使美国国会早日批准。”^⑥

同样，对于李明博此次访美美国方面的期待更多。诸如，美国方面希望通过李明博此次访美，韩国能为稳定阿富汗局势向阿派遣教官以训练当地的军人和警察、参加对伊朗的制裁、开放美国牛肉的进口、参加由美国主导下的导弹防御体系(MD)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构想(PSI)、增加对于驻韩美军防卫费的承担额等。决心改善和提升韩美同盟关系的李明博在韩美首脑会谈中同美方达成协议：将双方的同盟关系提升到“21 世纪战略同盟”。

三、建立“21 世纪韩美战略同盟”愿望受挫

2008 年 4 月 19 日是李明博与布什在戴维营举行韩美首脑会谈的日子，此前的 4 月 18 日，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官员同美国方面签署了韩国无条件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向美国开放牛肉进口市场的协议。此举不仅扫除了美方批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障碍，更主要的是为翌日的韩美首脑会谈营造了良好气氛，等于是李明博送给布什总统的大礼包。果然，在 4 月 19 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中，气氛十分融洽，双方推心置腹，全面地恢复并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双边关系，建立起“21 世纪战略同盟”。但让李明博始料未及的是，事前未向国内民众予以说明、解释，由他武断决定向美国开放牛肉进口市场一举随后在韩国掀起一场激烈风暴，几乎将刚刚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吞没。

韩美达成向美国开放牛肉进口市场的协议消息传到韩国，立即引起部分韩国人的不满和抗议，但尚未形成规模。4 月 29 日，韩国文化广播电台在“PD 手册”时事节目中介绍了一位美国妇女因食用疯牛肉而死的消息。并称：“若开放进口美国牛肉，则患疯牛病风险会增大。”而且“90% 以上的韩国人具有患疯牛病的基因，韩国人要比美国人和欧洲人易于患疯牛病。”^⑦此报道一出，关于疯牛病的说法纷纷出笼，有的还耸人听闻。于是，韩国民心浮动，人人感到自危，反对向美国开放牛肉进口市场的声势越来越大，并出现了人们走上街头、举行烛光示威游行的情况。在此种形势下，内阁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郑云天和保健福利家庭部长官金成二于 5 月 2 日联名发表谈话称：“达成进口美国产牛肉的条件是依据国际标准和科学标准的，部分人提出的安全性问题是毫无根据的，不可听信。”但并没有平息人们对于进口美国产牛肉的疑虑和反对情绪，当天爆发了第 1 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烛光示威，参加人数达 1 万人。而且群众示威一发即不可收拾，5 月 6 日，示威群众成立了“疯牛病国民对策会议”。号召展开 1000 万人签名运动，弹劾李明博。而且示威规模不断扩大。5 月 8 日，国务总理韩升洙表示要“严肃处理非法示威者”。而李明博总统同一天则表示：“如果出现因开放牛肉进口而威胁国民健康的事情，就立即中止进口。”^⑧这种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做法对于群众示威并未能产生作用，示威规模越来越大，很快发展到 10 万人，而且范围由首尔迅速扩及到其他地方。5 月 22 日，李明博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进口美国产牛肉事件“向国民道歉”，并表示：“政府未能充分听取和理解公众意见，我对此表示遗憾，我虚心接受疏于考虑国民心情的批评。”

⑨然而,事情并未因李明博总统的道歉而转变。群众示威在继续扩大,开始占领道路,堵绝交通,并欲冲击青瓦台,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呈愈演愈烈之势。6月10日,群众示威达到高潮。据警方估计,当日示威者达8万人以上,而示威主持者称达40万人以上。再加上全国80多个市、郡的参加示威活动者,总人数在100万人以上,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运动以来韩国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示威群众喊出“审判李明博”、“李明博政府下台”的口号。韩国国家警察厅宣布进入A级警戒状态,动员了全部警力,在首尔世宗路十字路口光化门方面等通往青瓦台的3个路口用60个集装箱设置路障,警民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均出现受伤者。烛光示威彻夜不停,首尔市中心一带交通完全瘫痪。当天,国务总理韩升洙代表内阁向李明博总统递交集体辞呈,以承担政府在4月无条件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而导致严重政治危机的责任。此前,总统府秘书室长柳佑益及8位首席秘书等整个秘书班子也已提出集体辞职。政府不得不派出政府及执政党国会议员等多名官员赴美,重新磋商进口牛肉问题。6月19日,李明博总统再次发表向国民道歉谈话称:“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我和我的政府应该更关注民众所想,但我们却没有这样做,工作不力带来的恶果已经呈现,我本人和政府正在进行深刻反省。”^⑩6月20日,李明博总统接受了总统府秘书室长柳佑益及除了新闻首席秘书李东官之外的7名首席秘书辞呈。与此同时,韩美就进口美国牛肉问题的额外条款达成了“临时协议”,主要内容是美国向韩国出口的牛肉须是月龄30个月以下,而韩国政府可以退回无该认证体系标记的美国进口牛肉。

必须看到,这场李明博政府刚刚上任3个月就爆发的“百日施政危机”,对于李明博政府的打击是巨大的,等于给李明博恢复和加强韩美同盟关系的做法投了反对票。

四、“天安舰”事件成为恢复和加强“韩美军事同盟”的良机

2010年7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关于韩国“天安舰遇袭事件”的“主席声明”,在“无法确定罪魁祸首”的情况下,既“谴责袭击行为”,又对韩国指控朝鲜“制造”了“天安舰遇袭事件”的所谓“联合调查结果”表示“关注”,同时也“注意”到了朝鲜否认与“天安舰遇袭事件”有关系的主张。联合国安理会这种既不反对韩国“联合调查结果”又不反对朝鲜“否认与此有关”的“模糊式”主席声明,只能说明“天安舰遇袭事件”最终会变成世纪悬案。这种照顾到各方立场的处理方式令各方都不大满意,但又都能接受。

虽然对于“天安舰事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方看法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天安舰事件”恰到好处地适应了李明博政府和美国的需要。如前所述,李明博政府一心想改善和提升韩美同盟关系,要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到“21世纪战略同盟”。但遭到韩国民众的激烈反对,牛肉风波就是例证。李明博心有不甘,决心改变前总统金大中、卢武铉时期对朝友好、对美国保持距离的政策,甘愿做美国羽翼保护下的小角色。对即将到来的2012年美军交出战时指挥权和撤出韩国,李明博忧心忡忡。现在发生了“天安舰事件”,真是天假其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实现强化韩美军事同盟的目标了。而李明博的这种愿望正与美国的需要一致,所以立即得到美国的呼应。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面临关门之虑,按此前韩国总统与美方达成的协议,美军2012年必须把在韩国的驻军指挥权交还给韩国,基地也将逐步迁出韩国。第二,美国在日本面临日本人民日益强烈地要求美军撤出冲绳的压力,如果日本民主党政府和民间形成合力,把美国人从冲绳赶出去,很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美国在

日本的驻军前景很不妙。

现在发生了“天安舰事件”，美国和李明博政府一口咬定“天安舰”是朝鲜击沉的，是朝鲜在威胁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安全。这样一来，美军留在韩国和日本是再合理不过了。人们看到，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强迫日本政府顶住了民众的压力，改变美军军事基地从冲绳撤走的决定，迫使鸠山首相在日本民众的谴责声中不得不含泪辞职下台。

美国和韩国从7月25日起在日本海举行了为期4天的“不屈意志”联合军演，美韩两军派出大约8000人参加，并且包括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在内的两国约20艘舰船，以及最尖端的隐形战斗机“F-22”等约200架飞机。这是自1976年以来，美韩军队进行的最大规模军演。紧接着，为期11天的美韩“乙支自由卫士”年度例行演习又于8月16日开始，韩美两国8千多名陆、海、空军以及陆战队官兵参加此次演习。此外，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和亚洲最大登陆舰“独岛”舰等20艘舰艇、“F-22”战斗机等200多架战机被投入到了此次军演。这次演习韩国动员40万人参加，其中包括5.6万多韩国军人，美方则出动3万余名军人，美军数量比往年增加了两倍。

李明博借着“天安舰事件”，将韩国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竟然决定年内每个月同美国进行1次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将军事演习的地点前移到中国的黄海，直接威胁到中国周边和贸易黄金通道的安全。

五、加强韩美同盟关系的得失分析

应该说，“天安舰事件”确实使韩美同盟关系得到恢复甚至发展，而且动作频频，不断向世界展示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那么这种紧密的韩美同盟关系对于韩国和东北亚地区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1、既巩固了李明博的统治地位也失去部分人的信任

对于韩国来说，韩美关系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对外关系，韩美同盟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韩国历届政府都把韩美同盟看作是执政的基础，虽然有的时候也有不满，但没有哪届政府敢轻视韩美同盟。坦率地说，如同《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所体现出来的那样，韩美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称的、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援助者与被援助者的关系。说到底，韩美同盟对于韩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而对于美国则虽属重要却并非离不开的。亦即较之美国，韩国更需要这种同盟关系。在韩国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尚处于弱小时期，对于这种非对称的同盟关系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合理或不应该之处。即使有不合理之处，也是可以接受的。伴随着韩国政治上、经济上的不断强大，对于韩美同盟关系才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卢武铉政府时期韩美同盟中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以致韩国民众表现出明显的反美情绪，但卢武铉政府从来未否定韩美同盟对于韩国的巨大作用和价值。李明博当政后，不断地加强韩美同盟，主要意图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韩国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清楚：由于朝鲜半岛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周边有美、日、俄、中4个大国，使其始终成为交织着多种矛盾和利益的热点地区。特别是在朝鲜半岛上存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韩国如不与大国结盟，仅凭本国之力想维护国家政治上的安全、稳定是很困难的。而在选择结盟伙伴方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美国当然是最佳的。对此看得一清二楚的李明博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充分地利用了“天安舰事件”。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韩国国内对于李明博在“天安舰事件”中的做法也不乏微词。主要是一些人不认可李明博政府一面倒地倾向美国,将击沉“天安舰”的责任加在朝鲜身上。根据韩国民意调查机构“韩国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称,虽有近 70% 的韩国民众相信政府和军方关于“天安舰事件”的解释,却同时仍有 21% 的人持保留态度。其中 48% 还是 20 至 40 岁的年轻人,而且 33% 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①这说明,李明博政府利用“天安舰事件”加强了韩美同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大批人的信任,尤其是年轻人。2010 年 6 月 3 日,韩国中期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在 16 个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大国家党仅在 6 个地方当选,而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却在 7 个地方当选,其余 3 个地区由其他在野党和无党派人士胜选。在 228 个市、郡、区地方官选举中,大国家党仅赢得 82 个选区,而民主党则赢得 92 个。^②这次中期选举正好在“天安舰事件”之后,可以看作是韩国民众对于李明博政府处理“天安舰事件”的评价,看来韩国民众并不看好李明博政府的做法。

2、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天安舰事件”发生后,韩、美两国,有时还加上日本,连续进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给人以一种又回到冷战时期的感觉,极大地加剧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朝中社 8 月 16 日发表评论称,韩美联合军演是向希望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国际社会发起的“挑战”,“乙支自由卫士”军演根本不是其标榜的“防御性的年度演习”,而是把朝鲜作为靶子的“侵略性的战争行为”。评论认为,韩美举行的联合军演具有极大的“冒险性”,正把朝鲜半岛局势引向“爆炸临界线”。韩美将为其军事挑衅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8 月 15 日称,韩美举行的联合军演是针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演习”和“核战争演习”,朝鲜军民将采取“最严厉的军事对应措施”。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日本也有自身的目的,极力鼓吹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场“天安舰事件”的不慎重处理,使金大中、卢武铉两届政府 10 年来创出的朝鲜半岛南北缓和局面荡然无存了。致使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加剧,武力冲突也有一触即发之势,东北亚地区仿佛进入“新冷战时代”。

3、伤害了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

李明博政府想利用“天安舰事件”加强韩美同盟关系,向朝鲜施加压力,得到了美国、日本的积极配合,甚至这两个大国还有火上加油之势。他们真的完全是为了给李明博政府撑腰打气、支持韩国吗?显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实际上,李明博政府利用“天安舰事件”作文章,正中美国、日本的下怀,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近年来,韩国、日本两国均出现了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并因此引起韩美之间、日美之间的矛盾,弄得美国很难办。现在正好借发生“天安舰事件”之机,熄灭韩、日两国的撤军要求,同时让大量兵舰重返东北亚。而日本,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一直寝食难安,正好借“天安舰事件”重振韩美日三角军事同盟,牵制新崛起的中国。

自 2010 年 7 月以来,美国多次表示将派遣“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参加在中国的大门口——黄海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中国方面先后 9 次敦促有关方面严肃认真地对待中方的关切和立场。显然,这些做法已经引起中美、中日之间的矛盾,伤害了中美、中日关系,进而必然伤害中韩关系。这符合韩国的利益吗?须知目前中国已跃居韩国的第 1 大贸易对象国,韩国同中国的贸易额比韩国同美国、日本两国的贸易额之和都多。在这种情况下,李明博政府利用“天安舰事件”大作文章是否明智就不言而喻了。

(下转第 13 页)

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演变及挑战

——以外务省机构改革为中心

包霞琴 松本久美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和分析了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并以日本外务省机构改革为中心,揭示了公共外交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为了保持和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特别注重“软实力”和“品牌国家”的建设,日本的公共外交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 日本外务省 公共外交 挑战

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提升本国国际形象而展开的直接针对他国公众、争取他国民心的公关活动。美国新闻署 2002 年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是:“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①日本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界定是:公共外交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提高本国的存在感,提升本国形象,加深外界对本国理解、以对象国国民而非政府为对象去做工作的外交活动。^②2005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对公共外交的解释是:近年来人们意识到,除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促使对方改变政策的力量(硬实力)外,利用一个国家的价值或文化等魅力来吸引对方的力量(软实力),有利于改善我国形象,提高外交能力,并确保广义上的国家安全和侨民安全。

一般来说,公共外交有以下两大特点:首先,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或经由政府授权、委托的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也就是说,就行为主体而言,公共外交必须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组织实施的。其次,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

二战后日本由于特殊的“战败国”身份,所以在外交上特别注重国家形象的重新建构。日本外务省的公共外交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展开:文化交流和对外政策传播^③。政策传播期待的是短期效果,而文化交流期待的是长期效果,但它们在具体活动时有时候比较相似。譬如,利用国际电视台既可以传播文化也可以传播政策;举办演讲会可以介绍本国文化,也可以介绍本国政策,有时候还会介绍本国文化政策。在日本外务省的机构改革过程中,对外政策传播部门有些时候与外务报道官组织并在一起,有时候与文化交流部门并在一起。这是由于对外政策传播在性质上比较接近新闻部门,但它具体活动内容又比较接近文化部门。

一、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演变与外务省机构改革

1、战后初期外务省机构改革与公共外交的起步

二战后,日本在盟国的占领下,外交空间极其有限。当时日本外务省机构除了大臣官房(总务部门)以外只有 5 个局,而文化交流和对外政策传播工作是政务局第一课所分管的众多工作之一。

1946 年,外务省进行了机构改革, 废除政务局,创立“信息部”(日语为“情报部”),并在其属下设立“涉外课”和“报道课”,专管收集信息、媒体报道和国际文化交流。1951 年 12 月,日本即将结束被占领、恢复国家主权的时候,重新制定了《外务省设置法》,并将“信息部”提升为“信息文化局”(日语为“情报文化局”),属下设立第一到第四课,分管国内媒体、外国媒体、文化交流、国际文化机构。可以说,日本外务省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奠定了公共外交的基础(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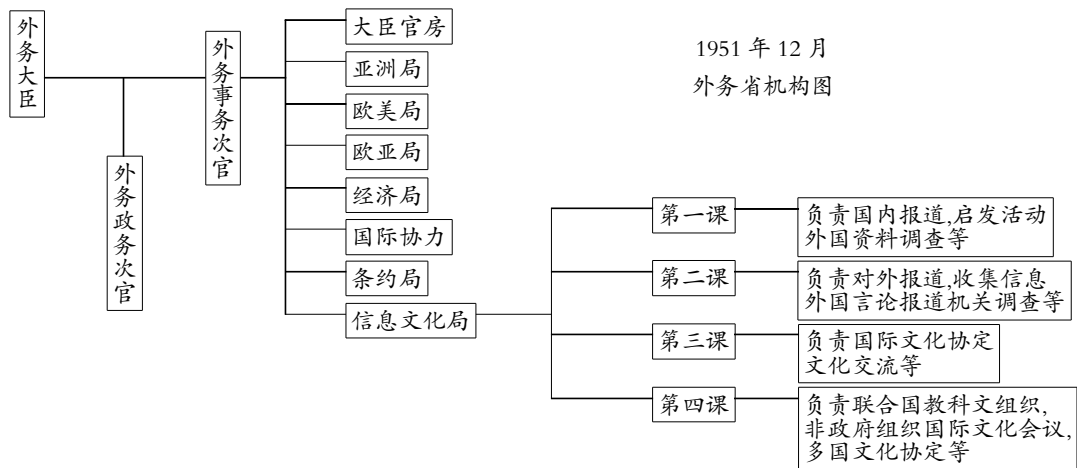


图 1 1951 年 12 月的外务省机构图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外务省的公共外交主要采用播放电影、展示照片等方式,给外国国民介绍日本文化和提供基本社会信息。但由于战后初期日本主要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以除了在美国举行的日本传统文化活动外,当时文化交流活动极为有限。

到了 60 年代,围绕着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美斗争。日美两国政府为了改善双边关系,在 1962 年设立了“关于文化及教育交流的日美共同会议”,形成了探讨两国扩大文化、教育交流的平台。1964 年,外务省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活动,把信息文化局属下从事文化事业的部门提升为独立的“文化事业部”,并下设文化第一课和文化第二课(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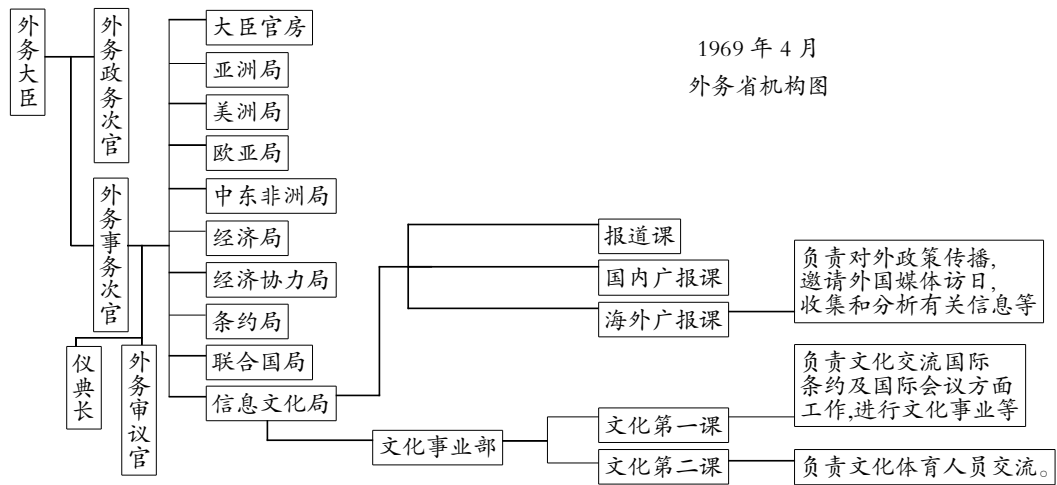


图 2 1969 年 4 月的外务省机构图

2、70 年代外务省机构改革与“富裕、和平国家”形象的建构

经过 60 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到 70 年代后,日本基本上确立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经济成功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日本政治、社会、文化的关注也提高了,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甚至出现了反日游行示威,批评日本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同时,日本如何应对资源、能源问题和国际金融、贸易问题等全球化课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2 年 5 月,日本政府出资 50 亿日元创建了国际交流基金^④。除了当初 50 亿日元的利息收入以外,国际交流基金每年还收到 6 亿日元的政府补贴。国际交流基金的主要工作是促进国际交流、增强海外日语教育、日本研究及文化交流,其主旨是“通过有效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加深各国人民对日本的了解,增进国际社会间的相互理解,在文化和其他领域对世界做出贡献,维持和发展良好和谐的国际关系”。^⑤国际交流基金的活动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文化第一课专门负责。直至今日,国际交流基金依然是日本公共外交的最主要执行机构之一^⑥。

70 年代日本政府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各国。由于 60 年代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展,大量日本企业进驻东南亚,给东南亚当地企业造成强大冲击,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1974 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时,在泰国和印尼都发生了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这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1977 年,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时发表演说,表示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日本要以合作者的身份支援东南亚,这就是著名的“福田主义”三原则。因此,70 年代日本采取的公共外交措施中,很多项目是针对东南亚国家的。1975 年外务省开始对东南亚实行文化无偿合作,1978 年日本政府又出资 50 亿日元创设东盟文化基金,1980 年开始实行以东盟青少年为对象的奖学金制度。

70 年代日本公共外交的另外一个重点对象是美国。1965 年日本对美贸易出现黑字,围绕着纤维出口限制和贸易不平衡等经济问题,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压力日增。1969 年 1 月,尼克松总统发表讲话,要求日本对毛织品、化纤产品的对美出口实行自主规制,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为了缓和摩擦、消除误解,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美公共外交。例如,外务省举办论坛会及演讲会,邀请美国有识之士参加;邀请美国人考察日本经济合作项目现场;给美国电视台提供短片电影;在美国报纸上刊登启发性文章;出版英文传播资料并发给有识之士^⑦;邀请美国各界领袖访问日本等。

1973 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美国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向美国十所重点高校各捐 100 万美元,资助其进行日本研究。1979 年,大平正芳首相在施政演说指出,“在以欧美为榜样的百年近代化历史上,在追求经济富裕的战后 30 年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脱轨’,在物质文明被认为达到极限的今天,时代从经济中心在向文化中心转移”。^⑧1980 年大平政策研究会发表了《文化的时代》政策报告书。该报告书提议,日本已经走出追赶西方国家的时代,市场社会已经十分成熟,现在日本人需要进入文化时代。

3、80 年代日本的“国际化”目标与公共外交

到了 80 年代,国际舆论要求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应该为国际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的呼声越来越高。1983 年 3 月,日本政府临时行政调查会报告书指出,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相对落后。为了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外务省强化并提升了发言人的作用。1984 年,外务省解散了信息文化局,创立了文化交流部和外务报道官组织,在大臣官房新设了“外务报道官”,并将外国

新闻报道室改为国际报道课。对外宣传和国际文化交流在组织上的分工取得了进展(图3)。

1980年代后,学习日语的人口在世界各国不断发展。1980年,国际交流基金在北京外语学院共同创设日语研修中心(俗称“大平学校”),为日语教师指导教学方法。1984年,国际交流基金和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合作,首次实行了日语能力考试,此后参加该考试项目的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不断增多。

1987年,日本地方政府与外务省、总务省、文部省合作,创立了邀请访日项目即“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简称JET。JET邀请外国青年到日本来,请他们在日本各地中小学教外语,或在地方政府从事国际交流工作。这一项目既有利于接受单位,也有利于外国青年,可以说是双赢项目。因此JET一直持续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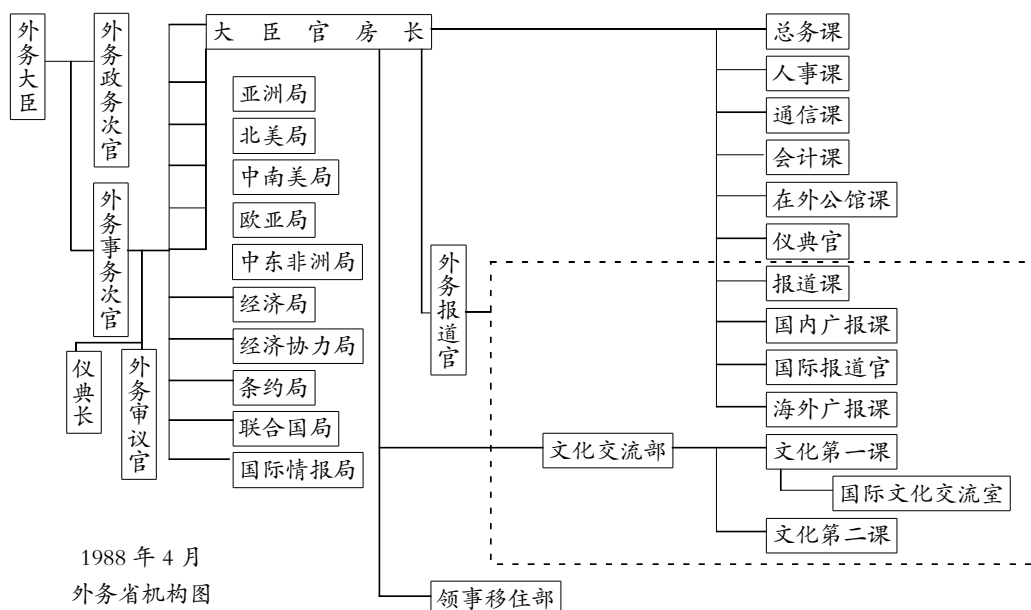


图3 1988年4月的外务省机构图

1987年上台的竹下登首相是倡导国际文化交流的先锋。1988年竹下首相访问欧洲时发表了题为“日本为世界做贡献”的演说,并提出了“国际合作构想”的三原则:为世界和平而加强合作、扩大政府开发援助、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其中“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包括:支援外国人学习日语,积极应对外国对日本的关注;扩大人员交流;在世界文化遗迹的保存方面提供合作;增设从事文化交流的海外据点,强化实施文化交流的体制;强化传播日本真实面貌的宣传功能。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大得到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得到改善。

二、90 年代后日本的公共外交与机构改革

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停滞缓慢发展阶段,国际竞争力也有所下降。但是,日本文化等软实力却不断上升。2002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克格雷(Douglas McGray)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国民酷总值》一文,高度评价了动漫、流行音乐、电玩、家电产品、时装、美食等日本流行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认为“国民酷总值”也是软实

力的一种形态,可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作衡量国家实力的一项指标。^⑨2004年6月,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日本《外交论坛》发表了题为《日本的软实力:局限与可能性》的文章,提出“日本虽然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萧条,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在不断地以文化为基础增强软实力”。^⑩确实,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形势下,日本为了保持和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力开展公共外交,特别注重“软实力”和“品牌国家”的建设。

2004年12月,小泉首相创立了“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机构,强调文化外交的重要性。2006年,麻生太郎外务大臣提出《文化外交的新设想》,提议日本要大力推出动漫等流行文化,并提议日本应该考虑创设漫画的诺贝尔奖。为此,日本外务省又进行机构调整,于2004年8月创立了“广报文化交流部”(Public Diplomacy Department),把“外务报道官组织”属下的“海外广报课”(负责对外政策传播)改名为“综合计划课”,并将它与文化交流课一起隶属于新设立的“广报文化交流部”(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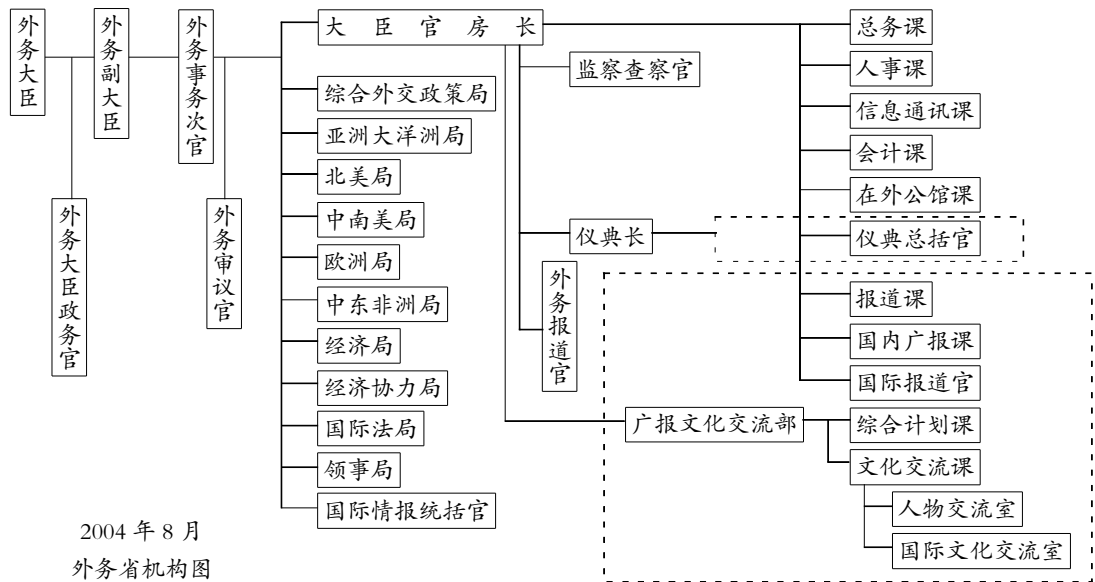


图4 2004年8月的外务省机构图

同时,公共外交IT化也取得很大进展。2005年7月,外务省在外务报道官组织内设立了IT广报室,全面改革外务省网站和海外使领馆网站,加强了利用因特网的对外传播活动^⑪。此外,外务省还委托非政府组织的网站“WEB JAPAN”^⑫,加强对外宣传日本。2009年7月14日,外务省在视频浏览网站“You Tube”上开设外务省动画频道^⑬,上传外务大臣记者招待会等动画。

2008年2月,外务大臣咨询机构“海外交流审议会”^⑭向高村正彦外相提交了题为《关于提高日本对外传播力度的措施与体制》的咨询报告^⑮。该报告提出了五项改进措施。

第一,强化电视对外传播。报告提议日本NHK设立子公司运营国际频道“NHK World”,并与商业电视台进行合作,制作更加具有魅力的电视节目,要把NHK World的普及率提高到英国BBC的规模^⑯。

第二,扩大日语教育。报告提议在3年内,将国际交流基金的海外日语教育中心从2008年的10所增加到100所。报告指出,近年来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明显增加,全球学习日语人口

从 2003 年的 236 万增加到 2006 年的 298 万,3 年增加率 26%,其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动漫、漫画等流行文化在世界各国年轻人中受到欢迎,促使他们对日语产生兴趣。如果日本政府对这种日语热情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的话,日语初学者很可能迟早放弃学习日语,日本就失去增加知日派的机会。

第三,有效开展流行文化等日本现代文化的传播。报告指出,日本流行文化以动漫和漫画为中心,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政府应该加大传播力度。

第四,通过日本各领域的有识之士,加大对外政策传播。报告提议,日本应该派遣更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到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外国著名智囊。日本外务省还应该从世界各地邀请有识之士访问日本,让他们对日本有更深入的理解。

第五,有效进行针对重点地区的对外传播工作。报告指出,针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之一。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社会特点,制定有效传播计划。报告提议加强与中国、韩国、东南亚等近邻国家的市民交流。

为了贯彻上述建议,日本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改革与调整:

1、国际电视传播

2008 年 4 月,NHK 设立子公司株式会社日本国际放送 (Japa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c)。2008 年 12 月开始实现了电视节目全面英语化。到 2009 年 7 月为止,能收视 NHK World 频道的国家增加到 66 个国家,普及到 1 亿 1000 万户家庭^⑦。

2、扩大日语教育

到 2009 年 12 月为止,国际交流基金已在世界各国设立了 69 个中心^⑧。为了将世界各地的日语教育中心有效合作,国际交流基金组织了名为“樱花网”的合作网。

3、有效开展流行文化等日本现代文化的传播

日本外务省于 2007 年设立了“日本漫画大奖”(International MANGA Award),并任命哆啦 A 梦为“动漫文化大使”。2009 年 4 月,外务省广报文化交流部部长又任命 3 名年轻女性为“日本流行文化大使”(俗称“可爱大使”)。日本的流行文化在各国广泛流传。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作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 1992 至 2002 年间增加了 300%,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

4、通过有识之士进行对外政策传播

日本外务省在积极邀请外国学术界名流、产业界领袖、新一代精英及媒体人士访问日本。广报文化交流和外务报道官组织从世界各国每年共邀请约 500 人^⑨。除此之外,各地区部门如亚洲大洋洲局有它们各自的针对该地区的邀请外国人访日项目。

外务省派遣有识之士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日本政府还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与各国日本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综合性支援;扩充当地图书馆;资助学术会议等。该项目对象目前有 34 个国家 64 所研究机构^⑩。

5、有效进行针对重点地区的对外传播工作

海外交流审议会报告指出,日本需要特别重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韩国、东南亚等近邻国家。在 2007 年 1 月举行的第二次东亚首脑峰会上,安倍晋三首相提出“21 世纪东亚青少年交流计划”,力图到 2012 年每年邀请 6000 名青少年赴日访问。

战后以来日本大力推进公共外交确实取得丰硕成果。据美国《时代》周刊 2009 年公布的调查显示:日本国际形象从 2007 年起连续位居世界第一。^⑪《软实力大国》的作者渡边康认

为,日本政府通过娱乐和语言输出日本文化,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这种传播确实改变着日本的国家形象。

三、日本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公共外交是日本扩展其国家影响力的有力手段,日本外务省也不仅调整相应机构充实力量,而且推出一系列活动,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日本的公共外交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财政预算的问题。近 20 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国家财政赤字严重。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为此,公共外交的预算也受到影响。例如,外务省预算中“广报文化交流及报道对策费”从 2008 年度的 31 亿 2200 万日元削减到 2009 年的 29 亿 3200 万日元,2010 年更是减到 24 亿 5200 万日元,也就是说从 2008 年到 2010 年减少了 30%。

此外,海外交流审议会的第一个提议“强化电视对外传播”也面临着资金上的困难。2009 年 12 月,日本国际放送公司发布,该公司 2009 年会计年度赤字预期 1 亿 6300 万日元,远超过当初预期。但是,政府还打算消减对日本国际放送公司的政府补贴,即 2009 年度政府补贴为 35 亿元,但 2010 年度预算案为 34 亿日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对每个政府部门的经费用途都进行严格审查,外务省公共外交的发展也面临着资金上的限制。

2、政府部门之间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在日本,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除了外务省之外,还有文部科学省文化厅、国土交通省观光厅、总务省通过 NHK 国际电视频道、还有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此外还有大量的民间机构,这些机构和组织如何协调和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但日本现在没有统筹的机构,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日本学者提议创建常设协商组织“公共外交战略会议”,由负责公共外交相关活动的对外宣传、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广播等各机构的局长级人士构成,承担制定统一的“公共外交战略”的任务。^②同时,政府如何利用民间机构开展公共外交也是重要课题之一。

3、日本公共外交具有非常明显的输出价值观的动机,它往往只关注传播本国文化或政策,忽略接受方的重要性。例如,“日本努力将海外对日本动漫、影视、电子游戏和美食等现代日本文化的兴趣转化为政治资本,通过动漫文化促进日本与海外的相互理解与友好,输出日本的国家价值观并实现其文化战略。”^③但是,接受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喜欢和接受这个国家本身,很多中国年轻人喜欢日本动漫、音乐,但当双边关系出现问题和摩擦时,讨厌日本的情绪就会上升。所以,日本推进流行文化外交的时候,一定要谦虚地接受这一事实。在客观评价公共外交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其局限性。

注 释:

①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14 页。

②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 VII 页。

③《外务省设置法》规定外务省的任务有四项:日本安全保障、对外经济关系、经济合作和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国际交流(第四条)。其中,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国家交流的具体内容为:“外国信息的国内传播及其他启发性措

施,日本信息的对外传播及启发外国国民的措施”和“在外国介绍日本文化”(第四条第15项和第16项)。对外政策传播和文化交流在法律上被规定为公共外交的两大事业。

④当初,政府为国际交流基金出资50亿日元,后来几次增资,2009年为止公积金达到近1000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在利用公积金的利息收入的同时,每年接受政府补贴约130亿日元。近几年,国际交流基金创设“日中21世纪基金”,使用其公积金的利息收入进行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⑤《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法》,第三条。

⑥目前广文部预算中,近六成是国际交流基金预算(政府给国际交流基金的补贴)。

⑦1974年,日本外务省与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期刊《Japan Echo》,介绍日本有识之士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及国内外各种问题的看法。

⑧内阁制度百年史编撰委员会《内阁历代总理大臣演说集》,大藏省印刷局,1985年,987页。

⑨吴咏梅:《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日本学刊》,2008年第5期。

⑩约瑟夫·奈:《日本的软实力:局限与可能性》,《外交论坛》,2004年6月。

⑪外务省官方网站于1995年开设。

⑫WEB JAPAN: <http://web-japan.org/plaza/other.html>。

⑬外务省动画频道:<http://www.youtube.com/user/mofachannel>。

⑭“海外交流审议会”是在2002年外务大臣的指导下,为了国际人员交流的重要事宜进行审议而被设立的有识之士会议。当初以领事改革为主题,从2004年开始,以《关于提高日本对外传播力度的措施与体制》为新的主题开始探讨。后半部分的会议委员长张富士夫是丰田汽车株式会社会长,其他委员包括电影公司社长、研究文化政策的大学教授、出版社、唱片公司、电视台、家电公司、石油公司等各界知名人士共17名。

⑮外务省海外交流审议会报告书:《关于提高日本对外传播力度的措施和体制》,2008年2月,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shingikai/koryu/pdfs/toshin_ts.pdf。

⑯审议会提出报告之前,通过日本海外使领馆就各国国际电视频道普及率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的114个国家中,美国CNN在113个国家能收视,普及率接近100%、英国BBC World为111个国家、法国TV5为100、中国CCTV为78、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54,而NHK World仅为20。

⑰Academy Hills报告“株式会社日本国际放送·高岛肇久会长演讲会”,2009年7月1日,<http://www.academyhills.com/note/report/tqe2it000009hi6b.html>。

⑱国际交流基金“樱花网”,<http://www.jpf.go.jp/j/japanese/network/index.html>。

⑲2009年11月行政刷新会议外务省有关邀请外国人访日项目资料,<http://www.cao.go.jp/sasshin/oshirase/pdf/nov25-pm-shiryō/2-53.pdf>。

⑳国际交流基金·日本研究网页,<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support/index.html>。

㉑王锦思:《日本国家形象为什么位居世界第一》,<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391>。

㉒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第208页。

㉓吴咏梅:《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第95页。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松本久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大平正芳政权期的对外政策与日本外交

田 凯

内容提要 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人物。但是对他的外交的研究集中在其外相时期,而对其政权期的对外政策的概括性研究几乎为零。鉴于以上的认识,本稿集中地讨论了大平政权期的对美关系、对华关系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大平把外交重心放在日美协调关系之上,在对美外交的延长线上展开其他外交。这种外交的战略转变影响着整个 80 年代日本外交的展开。

关键词 大平正芳 对外政策 日美关系 经济外交 中日关系

一、导 论

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人物。他分别于池田勇人内阁(1962-64)和田中角荣内阁时期(1972-74)担任外务大臣一职,在日韩关系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大外交决策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平正芳于 1978 年 12 月当选为日本首相。大平政权期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一方面他立足于紧张缓和的国际形势制定其政权构想,而另一方面在执行对外政策时,他又不得不面对新冷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鉴于新冷战的开始,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任期:1976-78)推进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①。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协调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外交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也就是说,大平政权期的外交虽然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展开,但是其本身并不完全追随美国,而是充分地运用其外交理念的灵活性,通过经济外交等手段来扩张日本外交的空间。大平政权期的外交为 80 年代各届日本政府的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深入地探讨大平正芳政权期的对外政策不但能加深我们对 80 年代日本外交史的理解,而且对我们今天认识日本外交路线的对立及展开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

二、大平政权期的政治与外交

1978 年 12 月 7 日,大平正芳在总选举中战胜了现职首相福田赳夫,成立了第一次大平政权。从政权诞生之初,自民党内由大平派与田中(角荣)派组成的主流派系与以福田(赳夫)、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三派为核心的反主流派的对抗成为大平政权期政治的主旋律。1979 年 10 月,在以一般消费税的导入问题为论争点而展开的总选举中,因自民党选举失利,党内的反主流派引爆了大平责任论。由大平选举失利的责任问题直接引发了著名的“四十日抗争”^②。在首相选举中,同属自民党的大平与福田同时参选掀起了此次自民党内部对抗的高潮^③。最终在田中派的帮助下,大平再次当选。虽然如此,党内的对抗仍然没有停止。1980

年5月16日,由于反主流派的缺席而导致社会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通过。同月19日,大平宣布解散众议院开启新一轮的总选举。在进行街头演说时,大平因心肌梗塞而突然晕倒,此后于6月12日在首相任中病逝。日本学者村松岐夫在评价大平政权期政治时,对不惜以选举失利为代价来解决日本财政问题的大平的果敢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如果没有大平的消费税的提案,消费税的导入一定会更晚。大平正芳是财政收支问题的提案人^④。大平正芳在其政权期顶着总选举失利的风险第一次提案导入消费税,此后经过10年的讨论,1989年日本政府正式作出了导入消费税的决定。从这层意义上说,大平正芳政权奠定了贯穿整个80年代的日本财政收支问题讨论的基调。

与国内政治的混乱状况相对应,仅仅维持了1年7个月的大平政权遭遇了中越战争、伊朗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苏联侵略阿富汗等国际突发事件。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更使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对于日本外交极为重要的美日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1979年5月,大平在访问美国时所作的演讲中把美国称为日本的“同盟国”,这被看成是大平试图强化美日关系的举措。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称赞大平把美日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⑤。大平政权期的日美协调外交,为从佐藤(荣作)内阁开始执行的“全方位外交”划上了休止符。以后的历代自民党政权都是在继承了大平正芳所提倡的对美协调的路线基础上发展其外交的^⑥。在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在中国外交方面,大平正芳也显示出要超越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交成就的气概。1979年12月,在中国访问的大平首相约定1979年度提供给中国5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一举措成为到2003年为止总计超过3兆日元借款的开端^⑦。

除了消费税,对美协调外交及对华经济外交之外,由九个研究小组构成的大平总理政策研究会的成立也很值得注意。政策研究会的成果对之后的中曾根康弘政权(1982-87)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⑧。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也正是这九个研究小组之一的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讨论并总结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不仅是亚太地区主义的重要转换点,而且对于期冀通过整个80年代,从单纯的经济大国演变成为对全球的政治外交有领导力的“国际国家”的日本来说,成为一份重要的外交遗产。大平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由铃木善幸政权(1980-82)继承,到了中曾根政权期,“太平洋的时代”成为其政权的宣传口号^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大平政权期的政治与外交为80年代的日本的政治外交的展开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大平政权期对外政策有着极高的开拓性,可全面介绍并评价大平政权期对外政策的研究尚不多见^⑩。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资料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对大平的长线思考型外交的忽视。

三、对美协调外交

1978年12月7日,第一次大平内阁正式成立。12月11日,日本《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大平内阁支持率为42%,这对于在自民党内斗状态下出发的大平政权来说是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局^⑪。可是,就在新内阁上任前一天的12月10日,伊朗革命爆发,而后停止了原油的生产。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阴影下诞生的大平政权在外交上遇到了棘手的课题。此外,如何主办好第一次在日本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成为大平政权之初对外政策的最大悬案。西方七国首脑齐聚东京,会议成功与否不但会对世界政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主办方日本的外交手腕也形成了严峻的考验^⑫。

1979年4月30日,面对诸多外交考验的大平到达华盛顿,开始了他对美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尽管美国是日本历届首相上任之初出访国的首选之地,但是在就任首相之前,大平原本并不打算把最初的出国访问定在美国,而是计划访问其他国家以显示大平外交的特色。但是,自前任福田政权以来,日美经济摩擦再燃,日本的经常性收支黑字问题遭到来自欧美的强烈批判。并且,大平一上台就表示前福田政权约定达成的7%的经济成长难于实现。对此,美国总统卡特发来亲笔信表达了愤慨之意^⑬。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即将在东京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能够顺利召开,与超级大国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5月2日,大平与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会谈,他在会谈中指出美国是日本的同盟国(ally),这是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如此称呼美国。大平还强调日本是美国在亚洲“不沉没的航母”^⑭。“不沉没的航母”这个说法并没有出现在事前准备好的稿子里,而是大平正芳偶然提到的说法^⑮。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之际也同样地提出日本是美国的“不沉没的航母”。虽说中曾根谈话的语境已经与大平正芳不同,但是中曾根希望强化日美关系的外交策略是与大平一致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尽管大平与中曾根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在对美关系上,两个人同样把日美关系的紧密化作为80年代日本外交的根基。会谈结束后两国发表了日美共同声明,声明强调为了构建80年代的日美建设性伙伴关系,两国应保持紧密接触,并应该为了日美经济关系的均等化而共同行动^⑯。在大平访美的整个过程中,他与美国总统卡特演出了“亲密无间”的一幕。

这样的“演出”增加了大平正芳办好东京首脑会议的自信。与此同时为了成功举办此次首脑会议,大平谨慎地开展准备工作,与外务省以及其他关联部门召开的专门讨论会就达5次之多^⑰。1979年6月28-29日,为期两天的第五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东京峰会)在东京召开。在会议前夕,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正式决定大幅度调高石油价格。面对这样的状况,与会七国在讨论稳定各自经济的同时,如何共同抑制石油进口以形成协调体制成为会议讨论的最优先话题。在会议中,法国总统德斯坦突然提议,西方七国的1985年的石油进口额应该抑制在1978年的数值之下。这一提案对于完全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是难于接受的。可是,美国、英国、西德立刻同意了德斯坦的意见,之后意大利和加拿大也相继表示赞成,这样与会的日本就被完全孤立了^⑱。最终,在第四次会议时,各方均做出了让步,日本接受直到1985年的限制石油进口的规定,同时其他国家也同意提高日本的石油消费额的限制范围。最终东京峰会的成果以“东京宣言”的形式发表,虽然讨论的过程波澜起伏,但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这给大平正芳的外交带来了更大的自信。

在内政方面,大平为了改善政府财政状况提出了引入一般消费税的政策提案。可是,面对着舆论的口诛笔伐,在总选举之前大平正芳无奈地选择放弃提案。尽管如此,自民党仍然在众议院选举中败北,并由此点燃了自民党内的激烈斗争,直接引发了前面提到的“四十日抗争”。经历了斗争的洗礼,1979年11月8日,第二次大平内阁成立。与此同时,随着驻伊朗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1979年11月)、苏联的阿富汗侵略(1979年12月)等突发事件的发生,国际政治也进入一个更为剧烈动荡的时期。

关于苏联的阿富汗侵略,大平在第91回国会施政演说中表明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强调:“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是在任何理由下都不能正当化的。阿富汗的国内问题必须交给本国自己解决。我国(日本)要求苏联军队迅速撤退,并完全支持联合国的决议。”^⑲可以看出,在阿富汗问题上大平完全站在自由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立场上,采取了对苏联强硬的态度。在对伊朗问题上,他也与欧洲保持一致,对伊朗采取了禁运措施,支援着美

国的立场与行动。此外,日本还积极地响应美国的号召,决定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在以上行动的基础之上,1980年5月大平访美,他在讲演中再次强调了日本在阿富汗问题、奥运会缺席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⑨。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大平正芳完全放弃了70年代占主旋律的“全方位外交”而转向对美协调外交。对美协调外交在80年代被中曾根康弘政权继承,成为同时代日本外交的基调,而对美协调外交的起点却在大平政权期。大平正芳是从自民党的“宏池会”(池田勇人派)走出来的政治家,因此被看成是吉田茂与池田勇人的“保守本流”路线的忠实继承者。战后一直规定着日本外交的“吉田路线”对大平政权期的对外政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⑩。对美协调外交的展开是大平继承吉田路线的佐证,也意味着大平理解对美协调这一日本外交规定构造的重要性。此外,他还积极开展对华外交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而这两者又都是在重视与自由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协调关系的前提下展开的。

四、大平政权期的对华外交

1978年12月,大平政权成立的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第二年的1月1日,中美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美国的卡特总统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决定在大平政权成立数天后的12月16日传达到了日本政府,中美关系的推进速度完全在日本政府预测的范围之外^⑪。在同一时期的1978年12月下旬,越南军队侵略了中国的友好邻国柬埔寨,这直接引发了1980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在此前的2月7日,邓小平访美归途中停留日本并与大平首相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邀请大平总理早日访问中国,并传达了中国将严惩越南侵略行为的态度。对此,大平指出,日本政府已经对越南政府发出了警告,越南政府如果不采取和平的行动,日本方面就不会在经济领域给予合作^⑫。此时大平的态度与1980年1月末美国总统卡特在接见邓小平时的态度是相同的。事实上大平的态度等同于默许了中国的对越军事行动^⑬。此后大平暂停了1979年度对越的经济援助,客观上支援了中国的军事行动。由此,日本彻底地加入到中美的反苏阵营中,也坚决地放弃了“全方位外交”路线。

在另一方面,与对越自卫反击战同时展开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严重的外汇短缺问题。中国政府为了能快速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大量从国外引进机械设备以弥补中国的不足。1978年开始中国同西方各国签署大批订单,1978年到1979年其订制金额高达70亿美元,这其中与日本的合同就有42.2亿美元^⑭。为了弥补外汇储备的不足,早在1978年末到1979年初,中国与英国、法国、西德等国家缔结了总额约171亿美元的长期或短期的借款协定,而这些协定都是以民间借款的形式签署的^⑮。

可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民间的资本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大平前任的福田纠夫内阁面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重大课题,无暇考虑中国的外汇问题。而且身为亲台湾的福田本人也更重视对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因此并没有在对中国经济援助问题上作太多的考量^⑯。贷款问题未能解决直接引发了1979年2月末中国单方面终止机械设备合同的事件。中国通知日本政府将在与日方的22件合同中对价值约27亿美元的货物中止合同,众多的日本企业对此表示吃惊^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平政权开始讨论政府层面的对华贷款问题。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与日本的铃木善幸议员会谈时指出,民间的贷款不能满足

中国的要求,中国政府考虑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希望日本政府能对此认真探讨^②。1979年9月1日,访日的谷牧副总理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请了政府贷款。9月3日,大平在会见谷牧时约定在他访问中国之前会做出最后的决断^③。

在1979年12月3日的众议员预算委员会上,大平强调:中国保持与日本及西方各国的开放关系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使日本和亚洲受益,也是全世界所共同希望的前进方向^④。从以上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平正芳对中国援助的决心的同时,也能理解大平援助中国的意图是与西方各国的目标一致的。1979年12月,大平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大平答应针对港湾、铁路、水力发电等6个基础建设项目,在1979年度为中国提供500亿日元的资金援助。

1979年12月7日,大平在政协礼堂的讲演中发表了著名的对华经济援助三原则:第一,不对军事领域提供合作;第二,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东盟各国保持平衡;第三,与欧美各国维持协调关系^⑤。特别是第三点尤其重要,大平为了消除西方各国对日本独占中国市场的忧虑而特别强调与西方各国的协调关系。因此,大平正芳不顾众多的反对,尊重了大来佐武郎外相的建议,对华经济援助采用了“非约束性”贷款的方式进行。

如果我们对以上的内容作一次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政府的外汇准备的紧缺是大平决定对华日元贷款的最直接的理由。大平利用这次机会把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本次政府贷款决定性的背景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以对美协调外交为自己的根本的大平来说,对华经济援助是与美国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同步进行的,也是间接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援。

五、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的展开

在上一节里,本稿着重介绍了第二次大平正芳内阁展开对华经济外交的过程与理由。与中国外交同时展开的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关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和理念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不作累述^⑥。在此,本稿在介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过程的基础之上,尝试着给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定位。

1980年1月15日,大平在夫人及大来佐武郎外相的陪同下启程前往澳洲,开始了他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之旅。大平在澳大利亚与弗雷泽澳首相在16日进行了2次会谈。针对大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弗雷泽首相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两人就此问题,共同表明要在今后广泛的地区协商的基础之上,对构想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⑦。就有关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问题,日澳政府在发表的共同新闻声明中表示:两国政府共同关注由太平洋地区的学术研究机构等组织民间的研讨会继续探讨并发展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澳大利亚政府同意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第一次研讨会^⑧。尽管日澳两国在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这并不能掩盖两国政府对环太平洋理念的理解差异。例如,大平首相强调不会排除中国与苏联的加盟,而因反苏而闻名的弗雷泽首相则明确反对苏联的参加^⑨。也就是说,大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型思考的制约,强调开放性地区的理念。与此相对照,澳大利亚方面深刻留意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国际政治的激变,以新冷战的思维来考虑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问题。虽然两者存在“同床异梦”的关系,可两国政府都会根据自国的需要来解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这也成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能够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⑩。在关于中国问题

上,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反对中国的加盟,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留意。在结束首脑会谈之后,大平于17日上午在墨尔本进行了题为《太平洋时代的创造性合作关系》的演讲。大平在演说中强调:广大且多样的太平洋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成为一个地区社会的条件。因此,创造新的合作关系与新的文明是有其必要性的^③。

1980年6月大平正芳的突然去世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推动留下了一层阴影。即使是这样,在大来佐武郎日本前外相和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等人的推动下,日澳政府共同约定的第一次的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堪培拉研讨会)按照原定计划于1980年9月顺利地召开了。来自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东盟5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学界、商界及政府官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会议。作为民间会议,堪培拉研讨会采用了很少见的非公开的方式进行^④。并且最终在克劳福德强有力的领导之下通过了最终报告书^⑤。报告书提出了建立一个由来自亚太地区自由经济体制各国学界、商界和政府的代表所组成的太平洋合作委员会(PCC)的建议^⑥。可是对于这个建议东盟各国反应十分冷淡。鉴于这样的情况,堪培拉研讨会之后,大来佐武郎、克劳福德分别在日澳政府的支持下,展开了对东盟各国的说服外交,经过日澳政府的努力第2次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最终在泰国的曼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研讨会被正式定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由此太平洋的经济合作走上了制度化之路。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来自于大平正芳在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所作的努力。

在对亚洲的地区主义外交方面,前政权的福田纠夫也曾作过很大的努力。1977年8月18日,福田在菲律宾马尼拉发表了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讲演,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对东南亚的政策,并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三原则”。^⑦“福田三原则”是日本想趁着越战后的时机,在重新构筑印度支那地区秩序之时发挥日本外交之力^⑧。可是,随着中越战争的爆发,印度支那再次被卷入大国间权力斗争的漩涡,“福田三原则”在严酷的国际环境变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福田三原则”最为强调的东盟各国与印度支那各国的协调关系的达成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平正芳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加大了对其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援助的力度,这也就表明日本政府在激烈动荡的国际政治中背弃了没有大国主导的“福田三原则”外交。从“福田三原则”外交的失败可以看出,在摸索亚洲地区秩序的时候,尽管要以东盟为中心展开,但是只注重协调与东盟的关系是不可行的^⑨。在这里,大平正芳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作用。大平正芳鉴于福田外交的失败,希望能在与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合作的基础之上,发展与以东盟为中心的亚洲各国的关系。这样的想法最终成就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六、结语:大平政权期的对外政策与日本外交

不难发现,对美协调外交是大平政权期对外政策的根基,而对华与环太平洋外交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并推进的。本稿在最后的的部分里将从战后日本外交史的“大视角”出发尝试着给大平政权期的对外政策作一定位。

战后日本外交是从对美关系开始的,此后其外交逐渐扩张到亚洲外交领域并在对亚洲外交不断的进取与彷徨中逐步展开。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何来定义,或者说我们应该从怎样的角度来评价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呢?笔者很同意日本学者宫城大藏的观点。他认为,战

后日本的亚洲外交是从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开始,逐渐向韩国、中国所在的东北亚扩展,在亚洲寻求“非政治化”的目标是日本历届政府的一贯姿态^⑤。但是,战后的亚洲冷战与“非同盟主义”、脱殖民地化与民族主义的交错使得亚洲地区国际政治状况异常复杂,而复杂的亚洲政治也一直困扰着战后日本外交。这样的国际环境大大地制约了日本实现外交理念的可能性,更磨灭着日本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殷切愿望。

70年代,紧张缓和的到来为日本外交带来了转机。在经历了60年代的“经济大国化”之后,70年代的各政权试图利用紧张缓和的契机尝试摸索独立自主的外交。前面提到的“福田三原则”正式这些尝试的高潮。虽然说福田外交也是以经济为主要手段,继承了“非政治化”的战后日本外交的传统,但是他的外交理念与过去的战争赔偿以及经济开发有着不同的逻辑出发点,可以说是日本外交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新冷战以及印度支那纷争的爆发直接暴露了福田外交的脆弱性。正是这时,大平正芳当选为日本首相,他在继承了“非政治化”的战后日本外交的传统的同时,特别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积极的支持,并在中美蜜月期的背景下,决定对华施行日元贷款,这为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由此,在冷战环境中一直困扰中日关系的“政经分离”的手法逐渐消失。在对美关系与对华外交都顺利推进的同时,大平还提出了环太平洋构想这样的新的地区主义构想,试图把对美、对华、对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一个更大的多国合作的地区框架之内来重新思考。由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发展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最终成为涵盖中美日世界三大经济实体的地区性合作组织。

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提出了日本外交的三原则,其内容是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作为亚洲的一员。可是在面对亚洲的复杂状况之时,日本外交一直在“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与“亚洲的一员”之间摇摆不定,并一直苦虑如何调和两者的关系。整个大平外交战略的展开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解消了两种理念之间的矛盾。不完全依靠美国,也不搞独立自主。认清日本外交的限界,在与美国协调的同时大力发展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通过这些外交来增大日本对美的发言力度。这种“保守主义”的心态正是大平外交艺术的根本。

对美、对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成为大平政权外交的三根重要支柱。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大幅增加了日本外交的柔韧性。而反观21世纪的日本外交则是另一番景象。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政权紧紧地抓住日美同盟这一救命稻草,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激烈对抗。而改朝换代的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政权虽然强调重视对华外交,并主张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却忽视了日美同盟这一战后日本外交的基础构造。使得他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左右为难最终宣布辞职。与以上两个政权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大平政权的外交认真地调整了对美、对华、对亚太各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三者进行了整合性思考,才使得他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之上,很大程度地拓展了日本外交的地平线,对日本国际地位的上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 释:

①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变容期的日本和亚洲》,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年,第247-322页。

②1979年总选举的失败加深了自民党内部主流与非主流势力的对立。两派的竞争虽然在众议院议员的人数上比较接近,但是在参众两院议员总数上反主流派有着明显的劣势。因此,反主流派把这种对立直接带到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他们推举福田作为首相候选人,形成了一党二候补的局面。从选举结果上来看,大平正

芳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此后围绕着干事长及内阁的人事问题,直到总选举 40 天之后对抗才平静下来。参见石川真澄:《数据战后政治史》,岩波书店,1984 年,第 105-106 页。

③佐道明广、小宫一夫、服部龙二:《从人物来读现代日本外交史:从近卫文磨到小泉纯一郎》,吉川弘文馆,2008 年,第 266 页。

④村松岐夫:《大平正芳:岁岁出政治问题的提起者》,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宰相们》,中央公论社,1995 年,第 198 页。

⑤吉米·卡特:《把日美关系带上高层次的总理》,《大平正芳政治的遗产》大平正芳纪念财团,1994 年,第 361-375 页。

⑥《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变容期的日本和亚洲》,第 334 页。

⑦毛里和子:《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岩波书店,2006 年,第 108 页。

⑧森田一:《心的一灯:回想大平正芳其人与外交》,第一法规株式会社,2010 年,第 226 页。

⑨卫藤沈吉、山本吉宣:《综合安保和未来的选择》,讲谈社,1991 年,第 284 页。

⑩关于大平正芳外交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外相时代,对其政权期外交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从总体上概观及评价大平政权期外交的研究在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中还不存在,因此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关于大平正芳政权期的外交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有两篇优秀的论文给了笔者很大的启示。倪志敏:《大平内阁的第一次对中政府贷款》,《龙谷大学经济学论集 42(5)》,2003 年,第 35-58 页;徐承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平内阁经济外交的始动》,《日本的经济外交和中国》,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 年,第 51-113 页。

⑪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编:《大平正芳回想录资料篇》,鹿岛出版会,1982 年,第 461 页。

⑫《大平正芳回想录传记篇》,第 506 页。

⑬《大平正芳回想录传记篇》,第 507 页。

⑭丰田 基子:《“共犯”的同盟史:日美密约与自民党政权》,岩波书店,2009 年,第 227 页。

⑮《心的一灯:回想大平正芳其人与外交》,第 181 页。

⑯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编:《永远的今》,鹿岛出版会,1980 年,第 270-271 页。

⑰《大平正芳回想录传记篇》,第 514 页。

⑱福永文末:《大平正芳:什么是“保守政治”》,中公新书,2008 年,第 245-246 页。

⑲《永远的今》,第 50 页。

⑳《永远的今》,第 309 页。

㉑吉田路线是指,以战后日本国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通过宪法 9 条对自身的主体性施以根本的制约,并通过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的对美依存制度化。其基本方针是“轻武装、经济中心、日美安保”。添谷芳秀:《吉田路线与吉田主义:序》,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吉田路线的再検証(国际政治第 151 号)》,2008 年,第 1-17 页;添谷芳秀:《战后日本外交史:围绕着自立的纠结》,李鍾元、田中孝彦、细谷雄一编:《日本国际政治学 4:历史中的国际政治》,有斐阁,2009 年,第 209-226 页。

㉒《大平内阁的第一次对中政府贷款》,第 46 页。

㉓《邓小平总理的访问(会谈录等)》,依据情报公开法解密的外交资料,第 14 页。

㉔《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冷战变容期的日本和亚洲》,第 255 页。

㉕中国研究所编:《中国年鉴 1992 年(别册)》,大修馆书店,1992 年,第 76 页。

㉖《日本的经济外交和中国》,第 55 页。

㉗《日本的经济外交和中国》,第 57-58 页。

㉘田中明彦:《日中关系 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第 109 页。

㉙《朝日新闻》,1979 年 6 月 19 日。

㉚《朝日新闻(夕刊)》,1979 年 9 月 3 日。

㉛《大平内阁的第一次对中政府贷款》,第 49 页。

⑫《大平正芳回想录资料篇》，第 317 页。

⑬田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过程和理念：亚太地区脱离冷战秩序的摸索》，《日本研究集林》，2009 年下半年刊，2009 年 12 月，第 12-21 页。

⑭《关于大平总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1980 年 1 月 22 日，阁议与外务大臣的发言概要）》，依据情报公开法解密的外交资料。

⑮内田胜久（外务省调查企画部课长）：《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的召开：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具体化》，《国际协力特别情报》，1980 年 11 月 15 日，依据情报公开法解密的外交资料，第 2 页。

⑯《日本经济新闻》1980 年 1 月 19 日。

⑰大庭三枝：《迈向亚太地区形成的道路：境界国家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认同摸索与地区主义》，Minerva 书房，2004 年，第 17-18 页。

⑱《大平正芳回想录资料篇》，第 320-324 页。

⑲《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的召开：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具体化》，第 4 页。

⑳《开始行动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世界经济标度报告 No.226》，1980 年，依据情报公开法解密的外交资料，第 23 页。

㉑《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的召开：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具体化》，第 7 页。

㉒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从福田纠夫到福田康夫》，青岛出版社，2008 年，第 45 页。

㉓若月秀和：《福田主义：后冷战外交的预备演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 125 号，2000 年，第 199-201 页。

㉔井上寿一：《危机中的经济外交》，《外交论坛》，2005 年 3 月，第 83 页。

㉕宫城大藏：《“海洋国家”日本的战后史》，筑摩新书，2008 年，216 页。

（田凯：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责任编辑：郭定平）

（上接第 41 页）

⑦王公龙：《金大中上台后的韩国对日政策》，《当代亚太》，1999 年第 3 期，第 22 页。

⑧姜锡胜：《韩国对北包容政策的推进过程及其评价》，《和平、和解、合作——韩国金大中总统的对北包容政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所，第 173 页。

⑨刘昌黎：《日韩自由贸易取得实质性进展与谈判旷日持久的迹象》，《东北亚论坛》，2005 年第 9 期，第 5 页。

⑩金熙德：《韩日关系的定位、调整和近期走向》，《当代韩国》，2001 年秋季号，第 24 页。

⑪金大中和平中心：《为了走向统一指向的和平》，HANKYOREH 出版社，2007 年版。

⑫刘红艳：《冷战后韩国对日政策及韩日关系》，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8 页。

⑬汪伟民：《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21 页。

（金敬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金大中政府对日外交政策评析

金敬珍

内容提要 韩日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冷战体制瓦解,韩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威望,适应变化的国际环境,并逐渐调整其对日外交政策。尤其是金大中的国民政府时期,韩国对日关系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应该看到国家利益是韩国推行对外外交政策转变的根源,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国民政府 日本 外交政策

一、绪 论

韩国和日本彼此相邻,两国关系历史上就密不可分,无论是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安全保障方面,韩日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两国于 1956 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此之后双边关系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整体而言,尽管两国在历史认知、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仍不时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双边关系的总体发展态势是积极的。冷战结束之后,韩国对日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

冷战结束伊始,韩国和日本的国家首脑就实现了互访,卢泰愚、金泳三总统相继访问日本,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等日本首相也实现了回访,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更为密切的时期。1998 年金大中上台以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双方包括党、政、军在内的高层接触逐渐增多。1998 年 10 月,金大中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要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日方首次以共同宣言形式就历史问题向韩方表示了反省和道歉。^①两国领导人声称韩日之间已“消除分歧”,并希望通过加强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流来继续加深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在战后韩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两国关系由此真正进入了理解与合作的新时代,并给亚太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调整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二、金大中对日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研究金大中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有必要首先考察当时韩国的基本情况。金大中政权上台以后,面临着严峻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金大中政权的基础相对薄弱,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巩固政治地位、保持政局稳定成为其首要的政治任务。“在 1997 年 12 月的选举中,金大中得票为 40.3%,而其主要竞选对手李会昌得票率高达 38.7%,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到 2 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金大中的选民基础并不牢固。因此,他许诺在前半个任期内维持总统制,而在后半个任期内则实施

内阁制,这也使金大中实际上成为一名并无多少实权的总统。此外他还需要解决地区感情对立、阶层所得不均、社会风气日下、腐败严重等重大的社会问题,并努力平衡联合执政两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协调同在野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化解国民日益高涨的反美和反日情绪。”^②这些困难一方面给金大中政府的执政带来了极大的牵制,另一方面也促使金大中力图在短期内通过若干重大政策变化树立权威,改善政府形象,从而切实提高政权的支持度。

其次在经济上,当时的韩国仍未走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形势。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起源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却波及韩国并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当时韩国是世界第 11 大经济体和第 12 大贸易国,也是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之一,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发展经历仍为人称道。然而,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却是始料未及的,韩国国内大量企业破产,由此引发金融恐慌,迅速形成了对股市和汇市的连锁反应。严重的金融和财政危机迫使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并不得不接受后者苛刻的贷款条件。面对这种困境,1998 年 3 月 1 日,金大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敦促大企业加速改革。^③作为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国家,韩国想要克服经济危机,亟需别国的支持,尤其是与韩国有密切联系的日本的协助。早在上台之初,金大中就一直强调新政府将把重点放在克服金融危机、维持半岛稳定、推进和平统一的方面。为实现上述目标,金大中提出,除了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机构合作之外,韩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美日等国的帮助。这也成为韩国力图改善对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此外,在社会思想领域,这一时期的韩国对日观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金大中之前的数届政府对日态度较为冷淡和疏远,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则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然而,韩日关系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对此韩国国民和部分学者也逐渐开始反思。1997 年底,韩国国内要求反省过去对日外交的呼声渐高,甚至有观点认为“金泳三政权在历史认识和领土等问题上过分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④学者卜钜一在一篇题为《不要煽动民族情绪断送外交》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韩国推行强调民族感情的对日外交损害了韩国的国家利益。”^⑤韩国的各大报纸也呼吁恢复已荒废了 5 年之久的韩日关系。

三、金大中政府对日外交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金大中政权时期,由于韩国实施了积极的对日政策,两国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就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一些矛盾和障碍有所化解,双边战略合作的意愿和力度不断加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政治上,不断加深沟通,努力构筑战略互信

在竞选之前金大中就曾表示:“如果我执政,韩日关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只要开诚布公进行对话,就能够解决。”金大中还希望在他的任期内实现日本天皇访问韩国的历史性突破。1998 年 3 月,时任日本外相的小渊惠三访问韩国,金大中的与小渊会谈时“明确发出了要与日本发展关系的信号”,对改善韩日关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积极姿态。^⑥为了加深与日本的关系,金大中的在 1998 年 10 月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与日本签署了关于构筑《21 世纪韩日新型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及《行动计划》,在宣言中双方决定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等诸多领域加强合作,并在以往很少涉及的军事领域建立和扩展合作项目,双方约定两国国防部长每年互访一次,每年 6 月举行“韩日安保政策协

商会”，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此次会面中，金大中出于缓和两国关系的考虑，刻意绕开或淡化了历史、领土等敏感问题，并不惜作出重大调整和让步，从而打破了对日关系的僵局。

2000年9月金大中总统的访日进一步加强了双边关系。访问期间，金大中小渊首相就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谈后，双方签署了《韩日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日方就过去的殖民统治向韩国做出书面道歉，从而使两国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解决了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也为韩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联合声明的附件《行动计划》中，“两国商定今后将在安全保障、经济合作和全球课题等5个领域进行合作，具体包括：每年举行首脑会谈；召开内阁成员恳谈会；扩大防卫交流；实施日本对韩国提供的3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为成功举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互相合作；扩大青少年、学术和文化交流，向日本开放韩国文化市场等。”^⑦

从上述进程不难看出，金大中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是在兼顾现实与长远利益基础上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定。它既反映出韩国新政府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重处理韩日关系的灵活务实的精神，也表达了金大中努力化解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中的历史矛盾，真正使双边关系走出历史的阴影，在未来构筑友好合作关系的希望。

韩日关系的改善还与朝鲜因素以及金大中上台后提出的阳光政策息息相关。韩国学者姜锡胜曾指出，金大中总统以“在牢固的安保中，促进对北包容政策之坚定的统一哲学为基础，表明要将和平稳定意志和面向未来的实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⑧金大中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实现南北和解政策的一种策略。1998年8月，朝鲜曾发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卫星，此事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报复日本决定停止供应旨在帮助朝鲜建立两座轻水反应堆的巨额费用。在此情况下，如果日本断然退出朝核问题和平解决机制，可能再度加深半岛危机，并直接导致韩国阳光政策的破产。为了顺利推行对朝外交，韩国必须重视发挥日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开展对日协调外交争取其对阳光政策的支持。

2、经济上加强双边往来，促进互利合作

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赖性极强，对日经济关系尤为密切。日本则是韩国主要的资本与技术来源。从两国的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日本最大的投资对象国，日本是韩国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且日本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在投资企业数和投资总额方面均远远高于韩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2000年日本对韩国直接投资为2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投资的45亿美元，占韩国对内直接投资总额的15.40%。^⑨

从两国的技术合作方面来看，日本在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一直是学习借鉴的榜样。日本对韩国进行了大量的技术转让，使日本成为韩国第一大技术转让来源国。韩国迅速崛起的电子、汽车等高科技产业，相当一部分都是依靠日本技术发展起来的，至今韩国用于出口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主要零部件仍严重依赖日本。但出于国家利益和企业竞争的考虑，日本对向韩国出口某些高精尖技术仍有所保留。因此，韩国希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促使日本放松对韩国的技术限制，使韩日之间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更上一个台阶。

3、军事上建立并发展直接合作的渠道

随着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两国的军事合作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历史原因，战后韩日两国在军事上的直接交流很少。但两国又都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盟国，面对朝鲜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衡半岛战略格局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90年代之后,日本加快了建设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步伐,日本日益重视并积极开展同韩国的军事外交活动。“1994年4月,韩国国防部长官李炳台访日,提议加强韩日军事交流。同年12月,韩国海军练习舰队首次驶入日本港口。日韩间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逐步发展,包括互派校官留学、训练艇互访、军界高层会谈等内容。”^⑩1998年10月,金大中对日访问期间,两国决定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安保体制,共同应对朝鲜导弹开发,同时决定在每年的6月份举行安保的会议以加强军事合作。

如果从东北亚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和对抗状态,大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半岛局势的未来走向。韩国难以凭借一己之力与任何一个大国相抗衡。因此,韩国力图通过建立东北亚地区安保体制,使相关的四个大国相互牵制,由此构建稳定的东北亚战略格局,增强自身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当然,与经济领域的合作相比,两国对军事合作的态度仍较为保守和谨慎。对于大多数韩国学者和政府官员来说,日本军事的强大将对韩国产生最大的威胁,担心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以后危及到韩国的安全。因而,韩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更多地是出于遏制朝鲜核试验与制衡朝鲜半岛力量分布的目的。

四、对金大中对日外交政策的思考

金大中对日外交政策的实施可以说使韩日关系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韩日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飞速增长,经济、文化、体育、旅游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也有大幅增加。^⑪如果分析背后的根源,大致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是国际社会主权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国际事件等的具体原则,它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和目的。一般地说,一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在对国际国内环境的认知基础上,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维护本国的最高利益。1992-1993年版的韩国《国防白皮书》指出,“鉴于日本在亚太地区地位不断增强,以及发展以美国为支柱的安全互助关系的需要,并考虑到可能对地区稳定和朝鲜半岛和平统一作出贡献的合作方法,应积极加强和日本的实质性的军事交流和合作。”^⑫在冷战时期韩日两国主要的国家利益在安全领域,而冷战结束之后,韩国在日本的具体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则更为多元。

在安全方面,韩国与日本同为美国的同盟国,所以韩国认为韩日接近有利于其自身安全。韩日两国都处在东亚政治、文化大国中国的周边,韩日两国均感受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经济上面临中国竞争的巨大压力;双方都面临朝核威胁,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实现半岛和平也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在经济上,韩国工业发展走的是日本模式,韩国经济的一大特点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同时,日本是韩国主要资金和商品来源地,是韩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伙伴,也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全面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有利于韩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政治上,韩国越来越致力于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宜的政治、外交上的多样化与独立性。同日本建立起新型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将是关键性的一步。基于以上的各种利益以及韩国当时的社会背景,金大中政府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也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美国因素在韩国调整对日政策中的作用也不应忽视。这里不妨借用“准联盟”(quasi alliance)的概念。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维克托·车提出了准联盟的概念与理论,用于分析美日韩三角关系。“准联盟是指一种两个国家之间互不结盟却同时与另一个国家结盟的关

系。”^③尽管韩日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同盟关系,但是美国出于在东北亚确立霸权秩序的战略意图,积极推动韩日安全与军事交流,这样就客观上形成了美日、美韩的双边同盟联合起来的美日韩同盟。尽管韩国与日本对美结盟的目的不尽相同,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和强化,韩日关系的准联盟性质正在不断加深。这一关系也是金大中政府对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基础和国际背景。

当然,金大中执政时期韩日关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2001年因教科书问题,韩国政府宣布暂停与日本的军事交流,国防部也宣布无限期推迟在济州岛举行的韩日联合军事演习。同年7月12日,韩国政府公布了停止开放日本大众文化的对抗措施,并召回了驻日大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与此同时,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从而把韩日关系进一步推向了针对历史问题不断摩擦的深渊。从总体上来看,金大中政府为了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做出了很多的让步或妥协,日本政府尽管也采取了一定的回应,但两国政府政策调整的力度和广度并不一致,这一不平衡性也是韩日关系仍面临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韩国的对日外交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无奈当中寻求平衡的策略。韩国只有通过周边大国保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同大国的关系中寻找平衡点,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周边环境,维护自身的安全,找到较大的外交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换言之,韩国只有先处理好与日本等周边大国的关系,才能谈得上如何生存和发展。不断增强国力固然是内因和根本,但在对外交往中仍需要讲究策略和轻重缓急,首先发展与日本等周边大国相对平衡、友好的关系因而显得尤为紧迫。

五、结 论

长期以来,韩日关系的发展大致处于一种时近时远、若即若离的状态。尽管如此,金大中政府时期的韩日关系还是出现了诸多亮点。通过积极调整对日政策,金大中政府将韩日双边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反映出金大中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重的灵活务实精神,也对今后韩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金大中政权之后,韩日两国关系又出现了若干倒退。虽然不能将其完全归咎于卢武铉、李明博等后几届韩国政府,但现任或今后的韩国政治领导人仍有必要认真反思金大中时期的对日政策,积极借鉴其有益之处,根据韩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作出政策调整,正确处理对日关系,实现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注 释:

- ①金大中:《21世纪与韩民族》,DOLBEGAE出版社,2007年版。
- ②王升:《金大中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及外交课题》,《东北亚论坛》,1998年第3期,第17页。
- ③同上。
- ④《产经新闻》,1997年12月30日。
- ⑤同上。
- ⑥新华社东京1998年10月10日电。

(下转第36页)

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政策

朴宰范

内容提要 文化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借助软实力的手段,积极促进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与良好关系,输出本国的国家理念,提高国家形象。本文梳理了战后各个时期日本文化外交的主要特征与政策方向,简要介绍了日本文化外交的机构设置和重点活动领域,并分析了现阶段日本文化外交的若干政策事业。

关键词 日本 文化外交 政策战略 政策事业

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主要特征与政策方向

从 1945 年日本战败到 1951 年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一直积极努力回归国际社会。新宪法制定之后出任第一任首相的片山哲(1947-48)为了获得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提出将“文化国家建设”作为日本的国家目标。在他的任期内,文化与和平理念相结合,成为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①

吉田茂首相(1946-47,1948-54)时期日本将举国之力投入经济重建,文化在对外政策框架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特点是和平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②一方面,日本积极追求对美依赖型的外交安保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努力开拓经济发展之路,重点搞好与欧美等国的经贸关系。因此,文化外交在国家的主要目标中暂时退居二线。尽管如此,1953 年日本仍与法国签署了《文化协定》,这在战后日本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化外交仅限于介绍日本传统表演、发行与日本文化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等,手段较为单一。

进入 50 年代以后,随着东京奥林匹克盛会的开幕以及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日本政府开始重新重视文化外交政策。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对外关系的活跃和拓展,文化外交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认识。1962 年,日本设立了文化教育交流会议。整个 60 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10%。1968 年,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随着日本商品大规模涌入国际市场,国际社会将日本视为“经济动物”的批评声不绝于耳。因此,日本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一些与个别国家强化文化关系的议论。整体而言,当时的日本决策者们仅仅希望文化能够成为缓和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所引发的负面问题的有效手段。设立奖学金制度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受到美国国家奖学金制度和对美文化交流项目的触动,日本开始积极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经验。同时,一些曾访问欧美的日本学者先后回到日本国内,成为政界、财界和学界的主流和精英。他们呼吁日本政府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建立一个规范的国家奖学金制度,不断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到日本留学、研究或访问,通过他们向全世界介绍和推广日本的文化,同时在外国人中普及和加深对

日本的认识和了解。

70年代,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摩擦开始增多。196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对美国出口逐渐超过了自美进口,之后美日贸易一直朝着对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日本也不再是一个弱小的、从属性的同盟国家。这一时期对日本文化外交产生重要刺激的事件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1971年美元贬值,1972年美国开展“越顶外交”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3年美元汇率急剧变动,这一系列事件都使得日本有一种被美国抛弃的感觉,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主导下的冷战二元结构。为此,日本外交官员一方面强调要加强与美国的文化交流,增强双边的互动和互信,另一方面又加紧了文化外交多元化的步伐,不断开拓和强化与英国、西德、法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交流。1972年,日本建立了日本国际交流资金(Japan Foundation),这成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从日本政府处募集了50亿日元的巨大资金,开展日语学习、日本研究等各项活动,大力促进外国人对于日本的认知。

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的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形象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阵营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1988年5月,竹下登首相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题为“日欧新时代的开幕”的演说,这一演说使日本的“国际合作构想”更为明朗化,成为日本政府推进文化外交战略的标志性宣言。竹下登表示,日本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员,为确保世界和平与繁荣,积极地发挥与国力相应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为世界做贡献”的三大支柱之一,在“为世界和平强化合作”、“扩充ODA”的同时,日本第一次举起了“强化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旗。^③为此,日本专门设立了以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为首的“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并于同年9月发布了《国际文化交流行动计划》报告书。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这一事件不仅宣告了一段日本历史的结束,也为日本的文化外交提供了一个契机。裕仁天皇逝世当天,当时正好在巴黎参加禁止化学兵器国际会议的148个国家的代表全部都表示吊唁。在2月24日举行的国葬上,164个国家、欧共体以及27个国际机构的代表和最高领导人亲临参加,世界各国的媒体都以较大的篇幅争相报道日本的消息,客观上提高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90年代开始,日本加大了对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长期派遣、招聘事业的力度,开展培养文化推广人才等合作事业,同时着手加强各个国际文化交流机构的机制化建设。1990年,日本总务厅行政监察局对国际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及事业运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文部省、外务省、总务省等相关部门联合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1996年7月,日本文化厅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④,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往,在文化上积极作出国际贡献,并着力传播日本文化。冷战结束以后,东盟的全面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地区一体化步伐也大大加快,东盟成为日本开展文化外交的一个重点区域。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访问东南亚五国时在新加坡发表了被称为“桥本主义”的政策演说。他特别强调要“建立丰富多彩的文化合作和交流关系,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培养亚太地区共同体意识”。^⑤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经济、科技、文化等所谓的“软实力”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其深远影响甚至超过了前者。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日本试图培养更为多元化的影响力来不断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和存在感。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外交以“发信”、

“受容”、“共生”为行动指南,试图探索活动项目、运作机制、传播方式的新机制,^⑥一个突出特点是借助动漫、影视等传媒手段,以“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为战略理念,积极在年轻人中输出价值观,提高日本的国家形象。^⑦

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不断加大文化软实力投入的同时,日本政府加强了与民间部门的合作,与多个国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事业。例如,2001年在英国开展了历时一年的日本主题文化交流活动。日本政府还出资13亿日元,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信托基金,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开展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2002年,日本与韩国成功地合作举办了世界杯。在中日建交30周年和日印度建交50周年之时,日本还与中国、印度等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⑧类似的重大活动还包括设立日本-东盟交流年、日美交流150周年纪念活动、日韩友好年等,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另外,中东地区成为日本开展文化外交的一个热点。从2003年开始,每年开展日本-中东文化交流和对话活动,并在伊拉克电视台播放日本的著名漫画节目。

二、日本文化外交的机构设置和活动领域

日本的文化外交政策主要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管辖。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下属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根据外务省的指导、监督具体执行文化外交的各项事业。此外,总理府本部、总务省等政府部门和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学术会议、国际观光振兴会、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等相关法人也涉及一定的文化外交事业,数量众多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对文化外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⑨

1、政府内相关部门间的职能形态

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于1984年由信息文化局内部改造2个课后成立。此后,在国际文化交流气氛高涨的1989年和1994年,经过两次总理恳谈会的决议,不断扩大预算和多元化业务的涉及范围。文化事业部的政策课负责定期召集文化外交的相关部门机关的负责人召开会议,起到信息交流、传播和业务调整的角色。文化事业部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文化交流政策的企划、立案和调整;文化的相互介绍;文化合作;人力资源交流四大领域。其中,文化第一课负责文化交流事务的综合调整和企划、国际交流基金的演出、展示、图书馈赠、出版援助、指导和监督残疾人事业、外国文化团体机关的资金援助和合作、文化交流资料的收集和调查等业务。此外,还负责文化协议的签署、文化协议的实施、文化无偿协作的实施、国际机关的协作、在外公馆文化事业等业务。文化第二课则主要通过国际交流基金或者直接实施学者、文化人、艺术家、专家、教员等的派遣、邀请工作。此外,还为国内外学者、教员、文化人的交流提供各种便利;也掌管留学生、青少年派遣和邀请等人员交流事业和日本语普及合、体育交流等事业。

文部科学省下属的文化厅(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也有一部分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主要业务包括举办文艺联谊会、邀请海外优秀艺术家赴日、推进舞台艺术国际交流、促进电影的国际交流、推进草根文化的国际交流、文化财产的保存和维护合作、文化财产的交流、文化交流团体的支援等。^⑩

2、政府下属机构的构成和作用

日本政府于1972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设立国际交流基金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化外国对

日本的理解、增进国际相互理解、促进国际友好关系、有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国际交流基金法第1条)。在此之前,30年代设立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一直担当日本文化宣传的中心角色。国际交流基金的初始资金为50亿日元,之后日本政府每年都有新的预算编入,到1997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日元。国际交流基金的业务费用主要包含私人部门的捐赠和援助、基金的运营盈利、政府开发援助(ODA)等,业务重点在于日本文化的海外宣传,也包含了向本国国民介绍外国文化和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文化振兴合作等内容。^⑩

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担

日本外务省注重文化外交实施主体的多层次化和多元化,积极诱导并协助地方自治团体开展国际文化交流。1986年,国内宣传科设置了国际化商谈中心,负责地方的国际化和国际交流事宜。同时,日本政府还在地方开展了“一日外务省(大臣出席的日本外交开发事业)”,“迷你外务省(大臣以外的外务省干部出席的开发事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友好城市的活动也方兴未艾。1988年日本已建立了780对友好城市,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62对,其中美国435对,排名第一,其次分别为中国(333对)、韩国(127对)和东南亚国家。^⑪相比中央政府的活动,日本地方自治团体开展的各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为普通日本民众提供了数量更多、更为直接的对外交流机会。

此外,地方自治团体和政府共同进行的国际化推进事业还包括1995年创设的“外交之窗”,“外交集团”和国际论坛等,这些活动为促进地方层次的国际交流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⑫其中,“外交之窗”每年举行5次,由相关省厅的事务次官、局长、大使和其他外务省干部等在地方就国际时局、外交政策等主题进行讲演,或者与地方学者专家就国际交流事宜进行讨论。这些内容通过当地各种媒体的报道,成为连接中央和地方、促进民众国际理解的重要渠道。这些活动的费用一部分由外务省负担,其余则由各主办团体负担。“外交集团”每年举行10次会议,形式与“外交之窗”类似,由外务省的中层官员参加。“国际论坛”每年举行8次,外务省官员在地方就日本的外交政策等内容进行演讲或举办集团讨论,活动内容均通过地方电台的频道发送报道。除此之外,还包括“国际交流研修事业”(以地方自治团体员工为对象的国际交流研修事业)、“故乡讲演会”(外务省职员前往自己故乡中学讲解外交问题)等国际交流支援活动。

三、日本文化外交政策的重点事业

1、日语普及事业

这一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文部省和总务省的外国语教育设施支援、日语教师派遣事业(REX)、国际交流基金的青年日语教师派遣事业(TAP)、邀请外国青年进行语言指导的JET项目等,目的在于在海外的教育机构普及日语。此外,日本政府还为外国留学生在进入日本留学之前主动提供资助,为了能够让他们事先接受预备阶段的日语教育,日本政府派遣教员和教育专家赴国外共同参与学生选拔、研修及派遣等工作。日本外务省、文部省、总务省与地方共同团体还积极合作,通过JET等项目营造外国人感受日本本地语言的环境,给外国人提供接触和练习日语的机会。这项事业请邀请外国教师和日本人外国语担当教员以协同授课方式教授日语,对提高学员的日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支持地方自治团体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化

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国际交流,对国际化和国际交流活动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所谓“国际化减税”是指在国际化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如果对业已认定为公益法人的团体进行赠与,则给予免税待遇。这项事业受到大藏省(财务省)、总务省、文部省等其他相关省厅和部门的大力支援。而“国际交流减税项目”则主要针对那些以在海外积极开展介绍和推广日本为主要事业内容的特定公益法人团体,若对这些团体捐赠同样可以享受免税或减税的政策优惠,这对促进日本企业在海外资助福利、慈善、学术等公益性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刺激,能够促进日本企业在投资国当地作出社会贡献。

3、通过国际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

(1)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促进国际间合作的重要国际专业机构。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扫除文盲运动、国际共同研究、学术工程等项目。例如,1989年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出资设立了用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信托基金”,截止到1992年4月共资出1100万美元。通过这一基金的资金,对柬埔寨吴哥古迹、中国西安唐朝大明宫含元殿、吐鲁番交河古城、南亚国家佛教遗址等亚洲国家的文物保护和修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

(2)参与经合组织(OECD)的相关合作项目。经合组织相关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由发达国家对政策开发课题进行共同调查和研究,并把这种成果推广至其他国家。在教育领域,经合组织设置了教育委员会和教育研究革新中心(CERI)两个机构,日本是其中的重要参与国。

(3)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相关合作项目。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18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机构。亚太经合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等经济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技术援助等领域的合作。日本文部省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的教员培养计划,并在国内联手六所国立大学和两个研究机构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与日本文部省共同召开了关于教育议题的国际会议,15个国家与会,此次会议对促进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结 语

上文对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与重点政策事业进行了梳理。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文化外交政策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和日本国内的社会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文化外交的机构设置和主题内容也不断推陈出新。尽管日本经济在经历了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仍未完全走出低谷,是否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普通国家”乃至“政治大国”的争论也未有定论,但文化外交仍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核心之一。如何以文化外交为手段,将其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相协调,日本的经验得失对于中国而言也有着巨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注 释:

①Joo Youn Lee, *The Politics of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Takeshita's Initiative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Seoul: Kyung Hee University, 1998.

②Sin Hee Seok:《日本的外交政策》,首尔:YeulYu文化社,1991年,第119页。

③和田纯:《日本对东亚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添谷芳秀、田所昌幸主编:《日本的东亚构想》,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71页。

- ④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日本·东盟国际文化交流·文化协力事业的历史经纬、现状、课题》,1999年。
- ⑤高连福主编:《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 ⑥姚奇志、胡文涛:《日本文化外交的观点变革与实践创新——以国际形象的建构为中心》,《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
- ⑦吴咏梅:《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日本学刊》,2008年第5期。
- ⑧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Bluebook 2002*, 2002, pp.192-96.
- ⑨Choi Hyun Joo:《对韩国在东北亚地区内文化外交方向的考察》,1999年,第65-69页。
- ⑩Kim Jong Mun:《日本文化与宗教政策》,首尔:Sunyun文化社,1997年,第102-107页。
- ⑪“The Japan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1999.
- ⑫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网站, <http://www.clair.or.jp>。
- ⑬韩国文化政策开发院:《亚太地区的文化政策与韩国文化外交战略研究》,1997年,第48-49页。
- ⑭周永生:《冷战后的日本文化外交》,《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第75页。

(朴宰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52页)

- ②Patrik stålgrén,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Regional Public Goods,” Working Paper, No.2 (2000), p. 9.
- ③邱丹阳、张静:《东亚金融合作与中国的因应对策》,《南方金融》,2003年第6期,第46页。
- ④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2月,第6页。
- ⑤所谓“货币互换”是指两笔金额、期限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本国及本地区货币作为抵押交给对方,同时获得对方借出的货币或美元,从而使本国及本地区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
- ⑥祝小兵:《清迈倡议当前进展以及后续问题》,《东南亚之窗》,2006年第2期,第18页。
- ⑦“Th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f the 10th ASEAN + 3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5th May 2007 Kyoto, Japan,” http://www.aseansec.org/JMS_AFMM3_Kyoto_final.pdf.
-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10+3财长会接受专访》,2009年5月3日, <http://www.mof.gov.cn>。
-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清迈倡议多边化》,2009年4月, <http://www.mof.gov.cn>。
- ⑩《“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加速——亚洲外汇储备库年底成立》,《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5月05日,第A04版。
- ⑪Joel Rathus,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China, Japan and Financial Regionalism,” May 11,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05/11/the-chiang-mai-initiative-china-japan-and-financial-regionalism/>
- ⑫Joel Rathus,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China, Japan and Financial Regionalism”.
- 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十二届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联合声明》,2009年5月3日, <http://www.mof.gov.cn>。

(范博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清迈倡议多边化”研究

——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视角

范博伟

内容提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国家逐渐提高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金融危机的教训使东亚国家在“东盟10+3”的框架内日益加强互相合作,在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清迈倡议”的提出和发展。2000年提出的“清迈倡议”(CMI)于2009年5月发展为“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清迈倡议多边化”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在金融领域中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机制。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在分析“清迈倡议多边化”助推东亚合作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清迈倡议多边化 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 俱乐部产品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突出了东亚国家抵抗金融风险的脆弱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反应不力,又从另一方面突出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国际体系的自助因素。东亚国家应该如何保证金融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怎样的金融机制适合东亚国家?东亚区域金融机制在国际体系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新兴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为东亚金融机制的设立及运行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分析视角。

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内容

区域性公共产品可以定义为“为了满足区域内各国各方为谋求繁荣、维护稳定的共同需求而由域内国家联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区域性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ry)。非排他性是指无需支付成本也能从某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好处,或者阻止不付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很困难。非竞争性则是指一个人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消费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当该产品供某人使用时,其他人消费该产品造成的额外成本很小或实际上为零。^①

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难觅踪影,因此常见的公共产品往往具有俱乐部物品和公共财产资源等形态。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其“公共性”是相对的,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由于制度上的安排,俱乐部产品仅限于会员消费。会员支付服务费或使用费,从而排除了不能或不愿支付相关费用的消费者。一个俱乐部代表着一种明智的制度安排,它向使用者表明该产品的价值以及他们应该支付的费用。^②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方式有四种。一是简单累加(Summation),指行为体提供的每一单位公共产品都相应地增加了可消费的公共产品总水平。二是最优环节(Best Shot),公共产品的总水平取决于某个做出最

大贡献的行为体。三是最弱环节(Weakest Link),一个行为体的最小贡献为整个集团设置了可行的有效水平。四是加权总和(Weighted Sum),是指在总体计量的基础上对参与国的各自贡献赋予相应权重。

二、东亚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

东亚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因素。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深刻认识到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在这场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东亚各国满满意,而亚太经合组织面对危机又显得束手无策。内部的因素带来的挑战指的是区域的经济安全问题。1997年泰国出现问题后马上扩展到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他东亚国家。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日益明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免于本地区金融危机的感染,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单独应对和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一现象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东盟的大部分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有效地抗衡金融危机的风险。即便是韩国、中国等地区大国,在应对金融时也需要往往需要依靠区域内的集体力量乃至域外力量的救助。

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国家对金融领域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共同需求十分明显。东亚地区的国家都迫切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目的是增加亚洲地区货币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金融稳定,监督国际游资的流动,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相关国家金融援助和救济。

三、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到“清迈倡议多边化”

按照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可以对金融领域适合东亚国家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做一描述。首先,东亚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中重要的行为体,需要一个只有该区域内的国家可以消费的金融机制,也就是说该消费具有排他性。同时,由于东亚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实力不尽相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应具有竞争性的特点,即某个国家消费的多少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消费。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于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希望组建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资1000亿美元资金,其中日本提供一半资金。^③“亚洲货币基金”建立之后,将在较为宽松的条件下向货币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信贷,以避免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但是,这一构想遭到了中国、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对。时隔一年之后,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于1998年10月提出了所谓的“新宫泽构想”。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又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了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2000年,韩国经济学家 Kim Tae Jun 等人倡导,亚洲应仿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总安排建立亚洲的地区借款安排(AAB)。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公告中则提到了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的设想。^④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通过了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的

《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即“清迈倡议”。^⑤“清迈倡议”中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充分利用“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以及信息的交换;第二、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10+3”范围内构建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第三、如果能够将各国的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这将有利于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市场;第四、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各国货币间的交易。^⑥

“清迈倡议”签订以后,《东盟互换协议》和《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止到2007年5月4日,“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总规模已经达到800亿美元。这800亿美元主要来自于8个国家间的16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⑦为深化东亚金融合作,增强区域危机自救能力,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10月在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倡议,建议将“清迈倡议”下较为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08年5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上,各国财长决定区域外汇储备库起始规模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与东盟出资比例为80%和20%。截至2008年底,在“清迈倡议”框架下,中国分别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签订了6份总额为235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其中中国承诺出资165亿美元。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之后,中国又在“清迈倡议”框架之外与部分东亚成员签订了总规模为36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这些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按照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话说,“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支持加快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筹建,以加强本区域危机救助能力”,“另外,中方还积极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参与了在促进本币债券发行、增加本币债券需求、改进监管框架以及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研究,为促进区域债券市场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⑧

2009年2月,在泰国普吉岛举行的特别财长会上,各国财长决定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5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上,各国财长就储备库出资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等主要要素达成一致。^⑨其主要内容是: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将在2009年底正式成立并运作;在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中,中、日、韩三国的出资比例合计为80%,东盟10国为20%,其中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和日本的比例为32%,韩国的出资比例为16%。^⑩具体而言,中国和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即一方面,日本是“清迈协议多边化”的最大的单一出资国(largest single contributor),另一方面,中国和日本又是“清迈协议多边化”的最大平等出资国(largest co-equal contributors)。^⑪这不但表明了中国政府依据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愿意承担地区责任的立场,也说明中国坚持在地区合作中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四、“清迈倡议”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分析

“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充分表现出,东亚各国迫切希望利用区域合作实现经济发展和减少对大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而金融危机正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加速器。可以说,“清迈倡议”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维护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功能是其重要属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破坏性显而易见,加剧了东亚各国实现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前,由于历史原因及对区域外大国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依赖,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缓慢,但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确认了维护金融稳定这个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实施“清迈倡议”的核心在于各个国家得以联合起来,将各自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拿出来,放到一个共同的储备库中,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货币和金融危机时都可以动用。这样,通过建立一个区域的危机防范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亚各国对同一个目标的需求。

(2)在“清迈倡议”之前,东亚各国在贸易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当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东亚各国根据市场机制和各自利益驱使而形成的贸易合作,有效地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但这种合作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对区域外部强势大国的依赖程度不同,其合作状态仍是松散的、不均衡的,尚未形成机制化。因而,当面临外部冲击之时,往往不能有效抵御风险,对内也无法控制互相传染。“清迈倡议”的签订可以通过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以及机制化协议提高合作的范围和水平,使各国分摊发展与稳定的经济成本并减少相互之间的竞争性。

(3)在“清迈倡议”中,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涵盖范围较小,政策目标和实施路径较为明确,各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也比较清晰,从而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同时,中日韩三国根据现实的经济实力担负起了主要供应方的角色,三者之间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力量分布和责任分担的格局可以避免霸权国或主导国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独大的局面,自然也能获取东盟中小国家的信赖和认同。

(4)纯粹集体供给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其利益完全是非竞争的和非排他性的。但在东亚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区域贸易主要表现为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之间的贸易,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四角的关系,其中中国、日本、韩国对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小于东盟国家,对于金融合作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应该说,“俱乐部产品”这一并不纯粹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比较符合东亚现实的。

(5)当一个国家的消费减少了其他国家可得的利益(部分竞争性),或者一种排他的成本使该产品的利益只限于付费者消费(部分排他性)时,该产品就是不纯的公共产品。由于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程的动力机制不是建立一个目标明确的、具有实体功能的东亚共同体组织。因此,“清迈协议”在利益上表现为鲜明的选择性,在支持机制上体现为灵活的多层次性。“清迈协议多边化”也表明东亚各国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中遵循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不追求一步到位,也没有提出超越域内国家意愿和实力的过于理想化的要求。

五、“清迈倡议多边化”面临的挑战

“清迈倡议多边化”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东亚区域的主要金融治理和合作机制。但是,它仍面临着不少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实际操作层面也还存在着诸多有待完善的方面。

首先,“清迈倡议多边化”目前尚没有坚定的金融监管机制。2001年日本建议设立清迈倡议监管机制,但因遭到中国的反对仅仅于2002年3月设立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机制,即“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Economic Review and Policy Dialogue)。^⑩虽然为了批准互换协议时必须经过这一“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但“对话型”机制的实际作用仍有待加强。

在金融监管问题上,东亚各国在第12届东盟10+3财长会议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同

意尽快建立独立的区域监测机构,对区域经济形势进行监测和分析,并为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决策机制提供支持。在初始阶段,我们同意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一道加强现有监测机制,为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监测工作夯实基础。”^③可以说目前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仍扮演者重要的第三方角色,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提供外部性的支持和指导。“清迈倡议多边化”迫切需要建立本身的、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

其次,“清迈倡议多边化”在机制化之后必须设立一个秘书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在纽约,这与美国在战后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毋庸讳言,在“清迈倡议多边化”中,日本、韩国、中国等东北亚国家的贡献相对很大。香港将是“清迈倡议多边化”秘书处的上佳之选。一方面,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又有中国大陆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香港在金融人才、语言、社会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和合作,也能够较好地平衡东北亚三国和东盟十国之间的关系。

最后,“清迈倡议”中实际出资规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脱钩部分比例为 20%。也就是说各成员国仍过度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清迈倡议多边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本地区的短期流动资金困难,二是弥补现有国际融资安排的不足。根据第二个原则,“清迈倡议多边化”不会也无力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的作用,而只是起到协同、辅助的作用。但是在东亚内部,对于这一原则仍存在着不同意见,如马来西亚一直反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条款。如何解决这一原则性问题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东亚的金融合作具有多重政治含义,需要政治认知的驱动。东亚金融合作有利于东亚地区各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东亚地区各国之间仍存在着诸多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东盟 10+3”机制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各国得以通过对话加深了解和理解,增加合作,进而改善关系。例如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对话是在“东盟 10+3”这个机制下启动的。又如,中国和东盟之间以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了南海领域的合作,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长远看,这些发展将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东亚建立更加稳定的地区秩序。各个国家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努力基于现实利益开展务实合作,构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把区域金融合作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结果。

虽然 1997 年提出的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没有实现,但是“清迈倡议多边化”起到了类似的功能。东亚区域金融稳定是东亚地区 13 个国家的共同目标。“清迈倡议多边化”作为区域性金融机制,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共同需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清迈倡议多边化”以俱乐部物品的模式可以保证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并合理地提供各个成员国所需的外汇。“清迈倡议多边化”在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的同时,可以提高东亚国家在区内、区外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东亚国家具备所有的资源特别是庞大的外汇储备,已为这一金融合作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运行关键还是看各成员国是否真正有愿意去努力付诸实施。中国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最大出资国之一,也应该通过积极参与这一机制和合作进程,努力兑现和平发展的承诺,实现睦邻、安邻和富邻。

注 释:

①Bruce M. Russett and John D. Sullivan, “Collective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4 (1971), pp. 845-865.

(下转第 47 页)

中日韩 FTA 研究

朴昭姬

内容提要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过去 10 年,东亚经济合作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取得了功能性整合的诸多进展,但仍缺乏制度化建构等刚性推动。2010 年 5 月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同意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整合的谈判,中日韩 FTA 有了新的转折点。本文认为相比三国之间的双边 FTA,中日韩 FTA 更具现实可能性,且其积极作用将超越经济领域而扩散至政治领域,从而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 中日韩 FTA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东亚经济共同体

以 1993 年欧盟(EU)的正式建立以及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生效为契机,地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东亚虽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中心,但其经济一体化程度仍相对滞后。特别是中日韩等东亚的主要经济强国之间尚未建立制度性的经济合作框架。中日韩三国经济联系密切、经济结构互补、地理临近,但三国又受制于各自的敏感产业以及领土和历史等政治问题。在地区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东亚各国亟需通过地区合作强化自身的影响力,以 FTA 等形式增强地区竞争力并有效地解决双边经贸摩擦问题。

一、中日韩 FTA 的进程

1999 年 11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中日韩首脑非正式早餐会上,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开展关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共同研究。自 2001 年 1 月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等三国研究机构开始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展共同研究,并发表相关研究报告。这一共同研究得到了三国政府的大力支持。2007 年 1 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表示,“三国领导人注意到三国学术部门关于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取得的进展,期待有关研究不断取得积极结果,并可能派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员参与有关研究”。^①

2009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中日韩三国的首脑对三国之间建立 FTA 都表示出积极的态度。2010 年 5 月 6 日至 7 日,中日韩正式启动第一次中日韩 FTA 的官产学共同会议。5 月 23 日召开的中日韩通商将官会谈上,韩国通商长官、中国商务部部长和日本经济大臣同意在今年内缔结 FTA 的前阶段三国投资协定。5 月末在韩国召开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同意积极推动区域内经济整合谈论。2010 年 9 月在日本、12 月在中国进行中日韩官产学共同会议。

整体而言,对于中日韩 FTA,中国持相对积极的立场,韩国持保留的立场,日本则持消极

表 1 中日韩 FTA 的主要推动进程

时期 / 地点	主要内容
1999 年 11 月,菲律宾马尼拉	在中日韩首脑非正式早餐席上, 韩国提出关于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合作的研究。
2002 年 11 月,柬埔寨金边	在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上, 中国首次提出签署中日韩 FTA。
2003 年至 2009 年	进行中日韩 FTA 的民间共同研究。
2009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北京	在第二次中日韩首脑会议上, 三国达成一致结束中日韩 FTA 的民间共同研究,开始进行中日韩 FTA 的官产学共同研究。
2010 年 1 月 26 日,韩国首尔	为了进行中日韩 FTA 官产学共同研究, 召开中日韩三国间局长级别准备会议。
2010 年 5 月 6-7 日,韩国首尔	正式启动第一次中日韩 FTA 的官产学共同会议。
2010 年 5 月 23 日,韩国首尔	召开第七次中日韩通商部长会谈。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3 日,日本东京	进行第二次中日韩 FTA 的官产学共同会议。
2010 年 12 月 1 至 2 日,中国威海	进行第三次中日韩 FTA 的官产学共同会议。
2012 年	将在结束中日韩 FTA 的官产学共同会议以后,展开正式谈判。

资料来源:参考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国内对策委员会官方网站、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和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而整理。

的立场。具体而言,韩国国内存在着一些利益集团的牵制,中韩和韩日 FTA 的进展较为困难。因此,韩国希望通过三边 FTA 的建立,缓和国内的政治压力,同时增加 FTA 带来的实际经济实益。随着韩日 FTA 谈判的进展,中方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两大同盟国之间建立 FTA 不利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和经济利益,因此积极地建议开展中日韩 FTA 的谈判。由于日本始终担心大量中国产品对本国市场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因而相比韩日 FTA 对于中日韩 FTA 的积极性较低。无论是日本外务省制定的《日本的 FTA 战略》、经济产业省公布的《全球经济战略》等官方文件,还是经团联、“日本国际论坛”、“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等非官方机构发表的政策建议报告或意见书,均把韩国和东盟作为日本推进 FTA 的优先对象,而将中日韩 FTA 建设作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②需要指出的是,2010 年 6 月 29 日中国大陆与台湾缔结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由于韩国、日本和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商品近 70%为同类商品^③,如果中日韩之间在经贸领域未能建立相应的制度性框架,韩国和日本在对华出口中就会处于相对弱势,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促使中日韩 FTA 研究和谈判加速的积极因素。

二、建立中日韩 FTA 的推动因素与障碍因素

(一)推动因素。对于建立中日韩 FTA 来说,其推动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人文地理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方面,中日韩往来频繁,在众多的合作领域有着广泛的接触和实质性进展。除了国家领导人的互相访问、外交对话和首脑峰会之外,三国还在六方会谈、东盟 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20 国集团(G20)等区域和多边机制上积极合作。

从双边关系来看,通过最高层次的交流,韩中两国不断增进和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不

断推动双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1992 年两国建交时建立的“睦邻友好关系”于 2008 年升级到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1965 年韩国与日本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在 1998 年宣布了“21 世纪新伙伴共同宣言”。作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韩日两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也维持着密切的合作。中国与日本 1972 年正式建交,2005 年开始通过两国首脑的互相访问逐渐恢复和改善两国关系,2007 年提出了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日韩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根据韩国外交通商部公布的数据,2009 年中日韩的经济规模达到整个东亚地区的 70%以上,其 GDP 达到全世界总量的 18.6%,人口达到 22.3%,贸易额达到 16%。因此,一旦三国之间建立 FTA,将会诞生一个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圈^④,东亚地区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也将随之上升,进一步与欧美抗衡。

迄今为止的中日韩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根据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的数据,2009 年韩中贸易额为 1562 亿美元,韩日贸易额为 784 亿美元,中日贸易额为 2279 亿美元。中日分别是韩国的第一、第三出口对象国,同时是第一、第二进口对象国。韩日分别是中国的第四、第三出口对象国,同时也是第二、第一进口对象国。韩中分别是日本的第三、第一出口对象国,也是第七、第一进口对象国。除此之外,韩国对中国 2009 年的投资金额为 18.1 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投资金额为 1.6 亿美元;韩国对日投资金额为 3.6 亿美元,日本对韩投资金额为 19.3 亿美元;中国对日投资金额为 1.37 亿美元,日本对中投资金额为 65 亿美元。^⑤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日韩三国之间都是极为重要的伙伴。

在经济结构上,中日韩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韩国和日本的比较优势在于高科技和丰富的资本,比较劣势在于资源缺乏、国内市场规模相对有限。与此相反,中国的优势在于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以及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持续的内需增长,但技术和资本相对处于劣势。韩日在高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则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部门优势明显。三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将为制度性框架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分工合作。

再次,在人文地理方面,中日韩作为地理临近的邻邦自古以来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交流活跃。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一关系更为密切,相互依存程度也日益提高。根据韩国外交通商部的数据,2009 年韩日两国的互访人数大约为 484 万人次,韩中大约 454 万人次,中日则为近 487 万人次。仅以 2010 年 3 月为例,韩日之间每周航班次数是 577 次,韩中之间为 837 次,中日之间则为 726 次,均极为可观。通过旅游观光、友好姐妹城市、市民交往等形式,三国之间的互相交流逐渐扩散至更广泛的层次。这对于改善国民认知和建构区域认同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障碍因素。阻碍中日韩 FTA 的因素也可以大致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方面,中日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之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作为新兴经济大国,中国正在迅速提升自己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而与此同时现有的地区大国日本不愿丧失已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说,中日之间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竞争不但不利于中日韩 FTA 的发展,而且也是阻碍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核心障碍因素。更为棘手的是,中日韩三方之间还存在历史问题以及领土、领海纠纷。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对历史的认识态度使得韩国和中国普遍对日本表现出不信任,进而怀疑日本能否真正成为东亚区域整合进程中志同道合的伙伴。此外,

韩朝双方的紧张对立使朝鲜半岛始终处于冷战状态,甚至有爆发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这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日本等朝鲜半岛周边的国家,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以及繁荣产生巨大的负面印象。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介入既是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也为其继续维持军事存在、战略同盟并开展军事演习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朝核问题无法解决,东亚的经济整合和地区一体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其次,在经济方面存在着两大制约因素。(1)中日韩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以及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根据 2010 年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实际 GDP 达到 32620 美元,韩国达到 28036 美元,中国大陆为 6914 美元,韩日的人均实际 GDP 达到中国大陆的 4 倍。^⑥由此可见,韩日属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则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落差就直接导致经济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不同。(2)各国敏感产业部门力图延缓结构调整,对各自政府施加了巨大政治压力。中日韩三国内都有竞争力较弱的产业部门,例如在韩日 FTA 的谈判中韩国的零件制造业和日本的农业部门就成为重要的反对力量;而在拟议中的韩中 FTA 问题上,由于韩国国内农业保护集团的压力,这一谈判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就中日韩 FTA 而言,韩日力图保护国内的农业部门,而中国则不想过快开放服务业并大幅改革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种制度。^⑦特殊利益集团的牵制成为中日韩 FTA 谈判逡巡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文化方面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尚不充分,构建东亚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任重道远。一般来讲,中日韩被认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是儒家传统在三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差异巨大。再以语言为例,由于文字、语法和发音等的不同,三种语言的分野很明显。这与欧洲等拉丁语系地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意识形态、基本价值观等方面中国与韩日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显著。

三、中日韩 FTA 的效应

首先,在经济方面,由于中日韩三国经济都是外向型经济,因此 FTA 的建立将对三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中日韩 FTA 的建立将为三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中日韩三国的总人口接近 15 亿,贸易额和经济规模分别超过 3000 亿美元和 75000 亿美元,三国之间的域内贸易率已经达到了 23.96%(表 2)。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研究发现,《茂物宣言》目标与中日韩 FTA 对中国、日本和韩国 GDP 的经济效果分别达到 5.91、0.61、1.74 个百分点(表 3)。中日韩三国共同研究小组和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都表明,中日韩 FTA 对三国实际 GDP 增长率都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其对韩国的影响又远大于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表 4)。

在具体产业部门中,这一影响则更为复杂。在制造业方面,中国的优势是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廉价且供应充足,大规模生产能力强,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有望从中日韩 FTA 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服装产业和电子产业。中国处于劣势的代表产业部门是汽车产业和石油化学产业。与此相反,韩国和日本的优势是技术先进、资本充足,所以韩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当的市场前景。在汽车和机械产业方面日本稍占优,但是在石油化学和电子等产业中则会受到来自韩国的竞争压力。就韩国而言,在建立 FTA 之后,来自中国的汽车、石油化学以及钢铁进口量将可能大幅增大,同时韩国在汽车、机械等

表 2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一体化构想的比较^⑧

	中日韩 FTA	ASEAN+3 FTA	ASEAN+6 FTA	FTAAP
人口(千)	1,480,750	2,032,147	3,151,161	2,640,876
贸易额(百万美元)	337,962	818,609	952,818	3,319,586
经济规模(百万美元)	7,522,398	8,412,783	10,007,964	25,027,522
域内贸易率	23.96%	39.98%	43.87%	71.06%

表 3 《茂物宣言》目标与中日韩 FTA 的经济效果^⑨

对 GDP 的经济效果	茂物目标	茂物目标 + 中日 FTA	茂物目标 + 日韩 FTA	茂物目标 + 中韩 FTA	茂物目标 + 中日韩 FTA
中国	4.97	5.60	4.94	5.21	5.91
日本	0.46	0.64	0.47	0.44	0.61
韩国	0.60	0.37	0.74	1.99	1.74

数据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调查课:《面向加强日中韩三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课题》,2000 年度《政策效果分析报告》。

表 4 中日韩 FTA 对实际 GDP 增长率的影响(单位:%)^⑩

	韩国	中国	日本
中日韩三国共同研究小组的预计	2. 8	0. 4	0. 3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预计	5. 14	1. 54	1. 21

产业部门与日本的竞争将会变得空前激烈,在纤维等产业部门则面临着与中国的短兵相接。在服务业方面,中国的敏感领域是交通运输、金融、文化产业;日本的敏感领域是交通运输和通讯产业;韩国的敏感领域则是保险、文化产业。由于跟北美或者欧洲相比,中日韩三国在服务业上的竞争力普遍较弱,因此,三国通过建立 FTA 有望进一步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通过区域合力强化对国际市场的开拓。

其次,在政治方面,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将会外溢至政治领域,从而最终提高本区域的共同体意识。通过中日韩 FTA,三国可以提高政治战略意义上的一体感。以欧盟为例,其建立目的不只在于通过市场整合而获得经济效应,而更多地在于加强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减少乃至消弭战争的风险。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的地区安全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的核武器开发计划、美国对这一地区作用和影响力的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上升等。尽管中日韩三国在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打击越境犯罪等领域已经开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功能性合作,但是就整个地区的治理机制而言仍处于较低的制度化水平,甚至不如东南亚地区。虽然 FTA 主要是贸易领域的一体化合作,但有望成为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基石。此外,随着中日韩 FTA 的建立,东亚三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发言权也得以加强。东亚将真正成为与欧盟、北美三足鼎立的区域。

四、结 语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韩 FTA 的实质性协商,三国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为了最终建立综合性的 FTA,三国政府有必要将其作为长期的战略课题,广泛听取和充分汇聚利益攸关方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尽早达成国内共识,准备阶段性的谈判路线图。对于谈判中可能面临的争论和障碍,三方应有清醒和认识 and 应对方案。

其次,在继续深化中日韩官产学共同研究的同时,三国在政府和产业界层次应确保持续的交流渠道和协议空间,比如中日韩经济战略对话等,增加和深化三国之间对于经贸议题的意见沟通和利益交换机制,防止韩日 FTA 谈判时因中间阶段会谈中断导致谈判长期逡巡不前的情况。中日韩三国迫切需要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增信释疑”。一方面,在官方的各个层次建立定期的会晤和磋商机制是极为必要的,频繁的意见交换有助于政治互信的建立,切实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的建立并完善也有助于减少突发性事件对三边关系的破坏。另一方面,民间交流始终是三国关系发展的基石,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的设立、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市民团体的互访、个人入境旅游手续的便利化等都是这方面的有益举措。某些阻碍合作的因素在短期内未必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理解,少一点猜疑就少一点隔阂。

最后,中日韩 FTA 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其宗旨是促进东北亚的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在这一战略认知下,三国不应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追求阶段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政府也应该少一些外交辞令和 policy 宣示,而是脚踏实地、先易后难地稳步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中日韩三国都必须作出战略权衡,本着共赢互补的原则寻找区域合作中成本收益的平衡点,既要从国计民生出发,防止过快自由化对本国核心利益的损害,又要具备长远和全局的战略眼光,认识到东亚区域一体化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日韩三国政府都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力量。其中,韩国应以适当方式在中日之间妥善地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共同推动 FTA 的发展,使之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

注 释:

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新华网菲律宾宿务 2007 年 1 月 14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14/content_5605616.htm。

②日本外务省:《日本的 FTA 战略》,平成 14 年 10 月;经济团体联合会:《希望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2000 年 7 月 18 日,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00/033/index.html; 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与日本的作用》,2003 年 6 月;东亚经济共同体评议会:《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2005 年 8 月,http://www.ceac.jp/j/pdf/policy_report.pdf; 日本经济产业省:《全球化经济战略》,2006 年 4 月。

③Cheong Jun-kyu、Yoo Ki-j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如何进行?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案》,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2009 年 10 月,第 20 页。

④韩中日三国的 GDP 规模为大约 10 兆 7 千亿美元,仅次于欧盟(16 兆 4 千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14 兆 2 千亿美元)。数据引自韩国外交通商部:《韩中日合作概况》,2010 年 5 月,第 168 页。

⑤同上书,第 178 页。

⑥数据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adb.org/>。

⑦Song won-geun:《韩国在韩中日 FTA 中的作用以及重要性》,韩国经济研究院(KERI),2010 年 2 月,第 6 页。

⑧外务省经济局:《日本的 EPA 谈判:现状与课题》,第 35 页;《EPA/FTA 的成果与今后的方向性》,第

17-18 页。

⑨西川博史:《日中韩三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 期,第 62 页。

⑩KIEP,“Joint Re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Possible Roadmaps of 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Korea,”p.4.

(朴昭姬: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上接第 63 页)

⑭《美国风牛病例引起亚洲国家恐慌》,《央视国际》,2003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cctv.com/news/world/20031225/101024.shtml>。

⑮刘静:《韩国“牛肉风波”的原因分析——基于集体消费心理的角度》,《当代韩国》,2008 年秋季号,第 62 页。

⑯《韩国:美国牛肉引发连环危机》,搜狐新闻,2008 年 6 月 17 日, <http://news.sohu.com/20080617/n257554241.shtml>。

⑰张玉山:《韩美 FTA 的“牛肉风波”及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2 期,第 77 页。

⑱《“牛肉风波”搅动韩国社会 李明博执政地位遭重压》,《人民日报》,2008 年 6 月 4 日。

⑲Moon Ihlwan:《韩国国内美国产牛肉骚动的始末:陷入危机的李明博政权》,Business Week,2008 年 6 月 9 日。

(朴昶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魏全平)

(上接第 70 页)

⑳《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5 页。总力报国会成立于 1942 年 1 月 17 日,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组织,以上海的 10 万日本人为核心,以统治当时在沪中国市民及各国侨民为目标,并统辖总领事馆、在沪日本居留民各团体、日本特务机关、商工会议所、海军武官府等各机构。

㉑《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5-1236 页。

㉒《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6 页。

㉓《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6-1237 页。

㉔《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7-1238 页。

㉕参见《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8-1239 页。

㉖参见《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9 页。

㉗参见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第 158-161 页。

㉘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前言。

(乐敏: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徐静波)

日本和韩国对美国进口牛肉政策的比较研究

朴昶盈

内容提要 2003 年美国发现疯牛病之后,美国产牛肉的进口问题成为日美贸易和韩美贸易的焦点议题,进口限制几经反复,且在日韩国内日益演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事件。日本和韩国在处理美国进口牛肉问题上存在着若干相似之处,但又不乏明显的差异。本文将回顾和梳理日本和韩国处理美国进口牛肉的政策过程,并对其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 疯牛病问题 食品安全 比较研究

牛肉是美国的重要出口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2003 年 12 月美国本土首度发现疯牛病(BSE:牛脑海绵状病)病例。韩国和日本等 25 余个国家相继宣布禁止美国牛肉进口。经过紧张的对美谈判,这一禁令在日本和韩国国内各自经历了反复。2005 年 6 月 25 日,美国再度爆发疯牛病。尽管美国对韩国和日本分别施压,要求其对美国进口牛肉开放国内市场,但韩国和日本政府均予以拒绝。^①

一、日本对美国进口牛肉的政策

自日本 2001 年 9 月 10 日于千叶县的农场发现首例疯牛病以来,日本社会对牛肉的食品安全十分敏感。^②日本是美国牛肉出口的最大对象国,美国产牛肉每年约有 30% 出口到日本,年贸易额达 14 亿美元。^③2003 年日本牛肉进口量为 67.3 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34.7 万吨,超过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美国爆发的疯牛病立即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本政府于 2003 年 12 月 24 日立即宣布停止从美国进口牛肉。12 月 26 日,日本根据《食品卫生法》正式停止对美国产牛肉和牛肉加工品的进口。日本政府对美国牛肉实施进口限制加上人们对牛肉的防范心理极大地打击了以牛肉为主要原料的部分连锁餐饮业,以出售牛肉盖浇饭而家喻户晓的“吉野家”不得不关停了部分门店,食其家、松屋等连锁品牌则只能以中国产、澳大利亚产的牛肉代替传统的美国产牛肉。关于取消牛肉进口限制的攻防交涉成为日美之间在经贸领域最大的不和谐因素。^④

2003 年 7 月,农林水产省成立了消费者安全局,承担振兴牛肉生产和确保牛肉安全两个方面的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把发展牛肉产业放在优先地位,以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为核心,忽视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在从全世界组织采购饲料时更多地考虑价格因素,贸然进口了带有疯牛病的牛骨粉,造成日本国内爆发疯牛病的恶果。

2004 年 10 月,美国大选之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送给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一份政治大礼,日美两国之间达成了关于牛肉进口的临时协定。这一协定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根据 2004 年 12 月初的调查,75.2% 的日本消费者不希望食用进口美国牛肉,只有 21.2%

消费者仍想品尝进口美国牛肉;担心进口美国牛肉安全性的受访者达到了 62.5%。^⑤

为此,2005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邀请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对美国牛肉的安全性问题作出准确评估。2005 年 5 月 31 日至 10 月 31 日,食品安全委员会接连召开了 10 次调查审议会以。根据评价结果,12 月 12 日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表示同意恢复美国和加拿大牛肉的进口。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向日本出口的肉牛年龄必须小于 20 个月龄,牛肉必须剔除脑、脊髓等危险部位;美国和加拿大从事食肉生产和屠宰处理的农户和厂商以及从事牛肉进出口业务商社必须得到政府认可。^⑥根据这一要求,美国有大约 500 万头牛符合出口条件。美国对此举表示赞赏和欢迎。美国农业部长迈克·约翰斯当天发表声明说,“我非常高兴地宣布,日本市场现在向美国牛肉制品开放。对美国生产商和日本消费者来说,恢复同日本的牛肉贸易是非常好的消息,也是在科学和国际公认标准基础上,贸易正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⑦2006 年 1 月 20 日,在运抵成田机场的美国牛肉中发现了应该剔除的脊椎骨。日本政府遂于同日再次停止美国产牛肉的进口。

日本国内的消费者团体一直对政府轻率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抗议日本政府允许进口美国牛肉,要求对进口的美国牛肉进行严格的检查。民间的压力迫使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建立了新的食物安全委任机构,在食品生产上推广可追溯系统,食品行业采用担保程序,希望以此减少消费者对食物安全和卫生的忧虑。

日本政府对应用科技手段确保食品安全较为重视,希望利用信息技术监测食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为此,日本推广了“产品履历跟踪监视系统”,广泛采用 GPS、条码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等先进科技。2003 年 6 月,日本出台了“牛的个体识别信息管理及其联络特别措施法”。^⑧这一法律规定,每头牛自出生之日起就必须佩带耳标,耳标应注明牛的识别履历,包括出生报告(时间、地点、具体识别号)、农家条码、种别等。屠宰分解后的每一部分也必须加上标签方能出售,要让消费者在从货架上拿到的每一小包装牛肉盒上都能查到上述信息,违者将处以 30 万日元的罚款。^⑨为此,日本全国还建立了牛个体识别数据库,从 2004 年 12 月开始,消费者能直接从网上核对所买食品的各种信息。由于修改后的“关于农林物资规格化及品质保证规范法”(JAS 法)对原产地的标示等要求更为严格,处罚也更为严厉,食品产业予以了高度重视,运用 GPS 技术记录和监督航程、码头、仓库的全部运作过程。^⑩2004 年 9 月 14 日开始,日本政府还基于 JAS 法对“加工食品品质表示基准”进行了修改并付诸实施。

二、韩国对美国进口牛肉的政策

韩国是牛肉消费大国,但韩国牛肉的自给率较低,刚过三分之一,其余全部依赖进口。从 2001 年开始,作为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协议的一部分,韩国开始全面进口美国牛肉,平均每年从美国进口达到 20 多万吨,成为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⑪牛肉贸易量达到近 8 亿美元。日本在 2001 年 9 月在国内曾出现过疯牛病病例,韩国国内此前并没有发生过疯牛病。2003 年 12 月,韩国宣布因疯牛病问题全面禁止进口美国牛肉。由于美国牛肉进口受限,韩国的人均牛肉消费量大幅下降,从 2002 年的 8.45 公斤,下降到 2004 年的 6.84 公斤和 2006 年的 6.80 公斤。^⑫

在 2005 年 12 月,韩国政府向美国派出了一个访问团,包括韩国政府官员、兽医、消费者团体、牧场经营委员会、牧畜检疫委员会等各界人士。他们的调查结论是,北美地区的牛肉较

为安全,可以开放进口美国牛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也于同期表示,30个月龄以内的美国牛肉,如果去除大脑、内脏、脊髓等易于传染疯牛病的部位,瘦肉部分较为安全。2006年1月,韩美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前,美国政府要求韩国政府恢复进口美国牛肉,以换取不将韩国大米市场列入谈判议题的承诺。因此,韩国不得不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但仅限于生长期30个月龄以内的瘦牛肉。2006年10月30日到12月6日,韩国政府在美国牛肉进口检疫过程中相继发现三次牛排骨,都将其产品退回美国。2007年5月,韩国在美国进口牛肉中再次发现牛骨,8月1日又发现疯牛病的危险部位脊椎骨。于是,2007年8月2日韩国政府再次宣布对美实施全面禁止进口牛肉的禁令。为此,美国农业部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裁决向韩国不断施压,要求韩国对美国牛肉全面开放市场。

2007年韩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后仍需经双方国会批准才能生效。李明博总统急于将这一协议作为本届政府乃至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贸功绩,为此,牛肉问题成为美国向韩国施压的重要渠道。2008年4月15日至19日,李明博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出访,目的地自然是美国。李明博与布什互换“见面礼”。美国送给李明博的礼物是:同意停止减少驻韩美军的数量,降低对韩国汽车的进口关税;韩国人到美国逗留3个月以内可免签证。李明博则投桃报李,同意5月中旬恢复进口美国牛肉。^⑩协议规定,韩国在恢复进口初期进口月龄不足30个月龄的美国牛肉;在美国公布饲料管理强化措施后,还将进口包括月龄30个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禁止进口的部位为特定危险物质(SRM)及可能被其污染部位,30个月龄以上的牛有7处,不足30个月龄的牛有2处。签署这一协议的消息传回国内,立即遭到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5月3日,韩国民众在首尔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烛光集会”,反对进口美国牛肉。这次抗议活动韩国共有1700多个社会组织和团体参加,人数多达200万。仅6月10日的一次示威活动,就有约100万韩国人参加。^⑪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3日,当天正是李明博政府执政100天。据韩国盖洛普的调查,李明博政府的支持率从3月初刚执政时的接近52%大幅下降至21.2%,成为历届总统中支持率下跌最快的一个总统。^⑫在另一项由韩国调查和韩国有线新闻电视台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中,87%的受访对象对韩国与美达成的牛肉协议表示失望。^⑬迫于民众压力,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郑云在6月3日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韩国政府已要求美国停止出口30个月以上月龄的美国牛肉。

三、日本和韩国对美国进口牛肉政策的比较分析

日本与韩国在对待美国进口牛肉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相似点。从政治关系和战略因素来看,日韩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同盟,对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长期存在着不对称依赖关系,也始终受到美国的各种政策压力。无论是小泉纯一郎首相还是李明博总统都希望通过在牛肉问题上对美缓和和妥协,换取其他领域的好处。从贸易本身来看,日本和韩国对美国产牛肉的贸易依存度较高,但牛肉及相关产业在各自国内经济中的比重并不突出,至多对日常消费有些许影响。换言之,牛肉问题究其根本并不是关系到两国国计民生的核心事件,事件的催化、发酵和蔓延受到经贸之外其他因素的左右。从交涉过程来看,日韩对是否开放本国市场允许美国牛肉进口问题都存在着反复,这与各自国内的政治社会形势变化息息相关,也突出地反映出两国的国民性格和政治生态。

当然,对比两个案例仍能发现一些显著的差异。首先,从政策反应度而言,韩国和日本都

曾同意暂时恢复美国牛肉的进口,但条件有所不同。日本只同意进口 20 个月龄以内的美国牛肉,韩国则将这—期限放宽到 30 个月龄以内,相比而言日本政府的规定和条件更为严格。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尽管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规定对加盟国的国内标准和双边协议并没有强制力,但日本政府仍在政策酝酿和执行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参考了这一标准。基于这一标准和日美两国各自开展的调查和研究,较为公正地对美国产牛肉实施限制或放宽禁令。日本甚至担心,如果对美国产牛肉设置过于严格的禁令,将导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内向日本提起诉讼,这将对日本造成不利影响。其次,从应对手段来看,日本政府大力强化了检验检疫的技术手段和监管体制,也出台和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更为应对有序。而韩国直到 2010 年 8 月 9 日才宣布计划自 2010 年 12 月起实施“进口牛肉流通履历制”,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一系统确认包括原产地、品种、出口厂商、进口厂商、进口日期、屠宰日期、流通期限等进口牛肉的履历信息。在韩国国内,在出现了所谓“韩国人患疯牛病的几率是美国人的三倍”等传言的情况下,政府并未通过科学的检测数据和权威报告合理引导消费者的理性情绪,部分学术机构未经充分证实的研究报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从国内政治气候和权力博弈来看,日本国内支持开放牛肉市场的利益集团力量较为强大,院外游说机制也较为健全和有效。这突出地表现在牛肉经销商和牛肉产业下游业者及部分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影响上,他们一直要求在保障食品的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弱化对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而韩国国内则似乎缺乏类似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呼声,普通民众普遍表现出较为团结和坚决的反对立场。参与街头抗议的群体除了直接受到进口冲击的肉牛养殖户之外,还包括家庭主妇、学生、农民、政界人士、非政府组织成员等,几乎涵盖了韩国社会的所有阶层。原本经贸和食品领域的牛肉问题被无限放大,提升到爱国主义、民族尊严和经济主权的层面。这也迫使李明博政府不得不违背国际承诺,对美“说不”。

注 释:

①Choi Byong il, *Reverse Scenario for Korea U.S. FTA*, Random House, 2006, pp. 317-330.

②对于日本处理美国产牛肉进口问题与 BSE 的过程,可参见农林环境课:《美国产牛肉进口问题与 BSE》,国立国会图书馆,ISSUE BRIEF, No.530, 2006 年 4 月 6 日。

③日本厚生劳动省食品安全部、农林水产省消费安全局, 2005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mhlw.go.jp/houdou/2005/05/h0524-2.html>。

④《日本的食品安全现状及对策》,《食品开发》, 2005 年 7 月 18 日。

⑤The Japan Times, December 22, 2005.

⑥《恢复进口美国牛肉》,日本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 2005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mhlw.go.jp/top-ics/2005/12/tp1212-1.html>。

⑦《日本取消美加牛肉进口禁令》,新浪财经, 2005 年 12 月 13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51213/07112193270.shtml>。

⑧日本厚生劳动省食品安全部、农林水产省消费安全局, 2005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mhlw.go.jp/houdou/2005/05/h0524-2.html>。

⑨《日本的食品安全现状及对策》,《食品开发》, 2005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ifood1.com/mag/showwz.php?wzid=86.html>。

⑩日本农林水产省:《JAS 摘要》, http://www.maff.go.jp/j/jas/jas_gaiyou.html

(下转第 59 页)

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

乐 敏

内容提要 日本居留民是近代上海外侨中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个群体,在国家对外扩张和中日冲突的大背景中,他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的各种团体组织与国内同类团体有类似之处,亦有不同功能。其中众多妇女团体在建立之初主要是居留民妇女的社交场所,并经常从事慈善救助活动,在中日关系紧张时期亦为日本军队提供后方支援;中日战争爆发后则转变成完全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的组织。其发展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日本政府对国民的全面统制以及女性与战争的关系。

关键词 上海 日本居留民 妇女团体 时局妇人会

日本居留民是近代上海外侨中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个群体,它既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载体,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工具。但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似乎被人们努力地遗忘和掩盖。日本学者虽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有关于上海史的著作出版,但没有过多关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这一社会群体。由于日本较晚进入世界殖民国家的行列,其强权和影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尚未超出亚洲范围,因此在沪日本居留民群体在西方史学家的眼中也成了“沉默的日本人”。而在将日本人作为侵略者的中国,他们更是从未出现在学者的视野中。^①这种局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所转向,深入研究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已经成为上海史、殖民主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当时日本政府为保护居留民的利益而建立的各种自治机构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但作为这些自治团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团体,学者对其的论述并不多,^②对其建立、发展的过程、从事的活动进行梳理,探讨其性质,无疑将使在沪日本居留民社会生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将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妇女在近代亚洲社会历史中角色的变迁。

一、日本居留民人口的增长和妇女从业的多样化

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始于 1871 年 9 月《中日修好条规》之签订,但在此之前已有日本居留民在上海出现,据 1870 年工部局的登记,当时的日本居留民仅有区区 7 人,在公共租界的 1666 名外国人中几乎可忽略不计。^③1905 年之前,日本居留民人数的增长十分缓慢,“从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四、五年,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人数从 10 人增至 100 人,平均每年增加 5、6 人。而且,不论在什么时代,男女比例大致是 1 比 2。”^④1890 年时日本居留民的人数增加到 644 人,男性居留民人数(339 人)才第一次超过女性(305 人)。1899 年末,日本居留民的人数超过 1000 人;1904 年末超过 3000 人,其中男性 1959 人,女性 1080 人。^⑤日俄战争后,以纺织业为首,制粉、机械、榨油等日本资本开始正式进入上海,与此同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急剧增

加。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从中国撤退,日本资本在上海突飞猛进,1915 年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达到 11457 人,超过了英国人而位列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数第一。进入 20 年代后,随着上海-长崎定期航线的开设,日本居留民持续增加,在 1926 年突破 2 万人,根据 1927 年 12 月末的调查,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有 25827 人,占上海外国人总数 54388 人的 47%。^⑥

随着日本居留民人口的增多,居留民社会的构成也越来越复杂,早期来沪的日本人中“男性大多数是杂货、陶器、小百货店的商人,还有一些是商社职员和官吏,女性中十有六七做的是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性买卖。……他们成为日本居留民在上海的先驱者”^⑦而到 20 世纪初年,日本人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多样化,1904 年 1 月 2 日,日本居留民办的《上海新报》刊登了《上海在留日本人营业指南》,展现了初期上海日本人从业的全貌。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开始有了从事护士、接生婆等职业的日本女性。^⑧而随着日本居留民社会的不断扩大,这种趋势也在不断发展。1928 年 10 月末,上海日本领事馆对在沪日本人的职业进行了一次调查,其结果显示,在当时的 10228 名女性当中,有从事学艺、娱乐、装饰品制造业者 3 人,从事物品销售业者 73 人,从事印染洗濯业者 1 人,从事被服日用品制造者 53 人,从事物品租赁存放业者 3 人,作为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员、事务员者 94 人,从事旅馆餐馆租房艺妓业游戏场演艺场业者 77 人,艺妓娼妇陪酒女及其他者 628 人,从事理发浴室业者 42 人,从事其他商业者 6 人,从事邮政电信电话业者 3 人,宗教人员 2 人,教育人员 22 人,医务业 224 人,从事新闻杂志、文学艺术、摄影者 7 人,其他自由职业者 11 人,其他有职业者 146 人,家庭佣人 542 人,未申报职业的其他有职业者 749 人。^⑨从中可见,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日本居留民中从事艺妓娼妇陪酒的女子仅占女性总数的 6%。而从事其他各种职业者在沪日本女性居留民中约占 1/5。这不仅反映出日本居留民社会的生活需求,更与 20 世纪初期日本国内妇女思想解放运动及妇女就业的兴起是一致的。

二、日本妇女运动和居留民妇女团体的出现

20 世纪初,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国内出现了妇女思想解放的潮流和妇女政治运动,建立了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新妇人协会、妇选获得同盟、女医会、至诚会、处女会、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友爱会妇人部、赤澜会、关东妇人同盟、全国妇人同盟、爱国妇人会等一系列妇女团体。^⑩与这种趋势相呼应,上海居留民社会中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妇女组织。大约在 1905 年 5 月成立了“爱国妇人会”;1915 年 11 月 31 日由东本愿寺发起成立了“妇人恳谈会”;1918 年 10 月 12 日,田添幸枝发起成立了“大和妇人会”,并在日本小学校举行了成立仪式。这一时期出现的妇女团体还有上海妇人会、矫风会、樱枫会、佛教妇人会等。根据记载,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的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共出现过大约 17 个妇女团体。^⑪

虽然目前尚无足够的史料可以窥见当时这些妇女组织的人数和规模,但从已经发现的史料看来,这些妇女团体在当时的居留民社会中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比如 1905 年 6 月 15 日下午在靶子路赵子花园内召开的“爱国妇人会”总会就有 140 人出席。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爱国妇人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募集了 274 名会员,^⑫这在当时总数仅 1592 人的日本女性居留民中是非常可观的。

这一时期所成立的妇女团体,其主要活动一是组织居留民妇女之间的交流,组织提高妇

女技艺的培训活动。如 1915 年组织的“妇人恳谈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其宗旨是“为了在留邦人的友好交流及其道德完善和妇女技艺的提高”。又如“大和妇人会”，该组织设有研究、社交、人事等部，每月发行《上海妇女》杂志，论述有关日本妇女、中日妇女交流等问题，组织有关妇女思想解放的演讲会等。1925 年 2 月 19 日，新渡户稻造博士作为国际联盟事务局的和平特使，在赴任途中来沪，并在由上海妇人会和日中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⑬

当时居留民妇女团体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慈善救助活动。各个妇女团体都组织过各种类型的慈善活动。比如 1920 年 3 月 13 日，大和妇人会在日本小学校举行实践躬行会，为幼儿制作简单的服装。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同时发生了火灾和海啸，死者 9 万余人。大和妇人会募集各类救灾服装 4413 件，于 9 月 16 日由“北野丸”号运输到日本；还于 12 月 1 日向日本灾区送去了正月年糕。其他日本各妇女团体也在日夜兼程募集各类衣服。上海妇人会募集了救灾资金和毛毯千余条，于 9 月 10 日送往日本。^⑭

这一时期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的慈善救助对象不仅包括上海居留民社会的日本人和国内重大灾害地区的日本民众，还包括中国民众。1920 年 9 月，中国华北发生旱灾，上海各界都举行了慈善救助活动。当时日本居留民也发起了华北救灾会，10 月 17 日，日本艺妓联举行演艺会，将所得银 1000 余元捐给中国灾区。^⑮1921 年 3 月 26 日，为救助中国贫民，中日公理教会妇人会慈善音乐会募集了 4974 元 5 角。12 月 1 日，大和妇人会为收容教育中国孤儿及贫困妇人免费生产成立了明星社，募集经费 10 万元。^⑯

除组织日本妇女之间的交流和慈善捐助活动之外，在沪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就是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为日本居留民社会自身（包括上海及在长沙、青岛等其他中国城市的日本居留民）以及日本在华部队做后方支援。1911 年 10 月 31 日，西本愿寺附属佛教妇人会为保卫汉口日侨的第三舰队及义勇队员征集慰问袋。1915 年末，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后，中国各地多次兴起排日风潮。在排日运动中，日本居留民社会开始组织起来，谋求保护自身利益，在沪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也参与到其中。1920 年 8 月 2 日，上海妇人会、上海樱枫会对第一遣外舰队赠送了慰问袋。1923 年 6 月 1 日，长沙发生了排斥日货运动，当地的中国学生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生了冲突，导致学生数十人死亡，北京政府对日进行了强烈抗议。当时上海的七个妇女团体基督教妇人会、大和妇人会、上海樱枫会、矫风会、佛教妇人会、中日公理教会妇人会、上海妇人会联合起来，募集了慰问金寄给长沙的日本居留民。^⑰可见居留民社会中妇女团体相继建立及展开活动，既在居留民中发挥了社会中间组织所应有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开始加入到日本政府的军事侵略行动之中。

三、居留民妇女团体类型与职能的转变

在日本国内，20 世纪初所兴起的众多妇女团体大致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妇女团体、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国家主义妇女团体和普通社交团体、同业协会及宗教妇女团体几种类型。比如，日本最早的妇女团体——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即被归为自由主义妇女团体，以“矫正社会弊端及不良风气、修养道德、禁酒禁烟、提升妇女品位”为目的，对培训女子劳动者、废娼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等方面也十分关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也有配合当局政策的活动。友爱会妇人部、赤澜会、关东妇人同盟、全国妇人同盟则属于社会主义妇女团体，主要活动是进行社

会主义宣传,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以及争取妇女参政权等。成立于 1901 年的爱国妇人会则属于国家主义妇女团体,是日本第一个体制内的官方妇女团体,最初是作为一个军需援助团体而成立的,发起人是主张大陆出兵路线的奥村五百子,并得到贵族院议长近卫文 和东伏见宫、闲院宫等皇族、贵族的首肯;其主要活动是在各地举办演讲会和对战死者、战争中病死者家属、因患病或负伤导致残疾的军人和病弱军人们进行救援。^⑩

而在海外的居留民社会,妇女组织的类型显然同在国内有一些差异。虽然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从得知一部分妇女团体的具体活动,但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成立的居留民妇女团体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普通社交团体;二、自由主义团体;三、国家主义团体;四、宗教团体;五、同业协会。可以看到,居留民社会中没有在日本相当活跃的社会主义团体,这显然同日本在海外居留民社会的特性有关。虽然日本国内有些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如全国妇人同盟力图将职业妇女、农业妇女、护士等都组织起来,但社会主义妇女团体的主要成员还是工厂女工;而海外居留民社会的中下层主要由小所有者构成,缺乏社会主义团体存在的基础。

而且,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与日本国内妇女团体在实际职能上的差异可能比其表面上的差异更大。日本国内各种类型的妇女团体,其主要活动和职能虽然有相互重叠的领域,特别是在妇女思想解放和妇女参政权方面,但互相之间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根据前述居留民妇女团体的主要活动来看,作为日本当时国内妇女团体之要务的妇女解放思想之宣传、维护妇女自身权益等问题在居留民妇女团体中并不受到过多关注,而作为国内妇女团体最大政治目标的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由于海外居留民社会的特殊性,则根本不是自由主义妇女团体关注的对象。相比之下,这些居留民妇女团体的职能是比较单一的。它们除作为居留民妇女之间的社交平台之外,主要职能就是进行慈善救助活动和在居留民群体与外界关系紧张时进行后方支援,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妇女团体都是如此,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同一性。

不过,居留民妇女团体在一个问题上同日本国内的妇女团体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随着中日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它们都开始支持并参与到战时体制中,最终其他民间妇女团体都被整合到国家主义的官方妇女团体中,其职能也从中日关系比较平稳时期的社交平台、慈善捐助组织和后方支援组织,转变成为完全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的组织。下面我们就以“上海时局妇人会”为例,来看看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

四、上海时局妇人会与日本侵华战争

上海时局妇人会是战时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最重要、也是中日战争期间最为活跃的居留民妇女团体。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也是日本侵略势力最早侵入中国的地区之一。自 20 世纪初以后,日本在华利益猛增,它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对华投资占对外投资比例最高者,而上海在其对华投资当中所占地位又日益重要。^⑪1931-1932 年,日军先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其间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积极活动,促使日本政府使用武力保护在沪日人利益。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军又不断在上海挑衅,并于 8 月 13 日开始大规模侵犯上海。在沪日本各团体在“七·七”事变后就召开会议,组织紧急委员会以应对时局;在沪日本居留民也大量撤离上海,一度仅余 4900 人。^⑫但

在 1937 年 11 月中国军队西撤之后,上海租界以外华界地区及部分租界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日本移民也被允许返回上海,并且还有大量新移民不断到来。1938 年 2 月 5 日,在居留民团的协调下,各宗教团体所属的妇人会及其他妇人会联合成立了上海时局妇人会。

时局妇人会是一个组织相当严密、高效的妇女团体。它在建立之初由选举产生的常任干事负责妇人会的日常事务以及为日本军人的服务。但随着日本侨民回国的增加,会内的联络工作碰到了困难。因此在同年 7 月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对组织方式进行了改革,设置了会长、副会长和总务若干人;设置了 13 个部分别管理各方面事务,各部设立部长及副部长;在各町内会成立了分会,各分会设立分会会长和副分会会长及干事若干人,并把相居邻近的日本人每 5 人分为一班,每班都有班长。妇人会的所有工作计划都首先在总务会上进行研究,再通知各部部长及分会会长进行实施。1938 年末,妇人会募集资金 5000 元修建会馆,于次年 2 月 5 日正式落成。妇人会聘请了总领事和居留民团团长为顾问,并邀请若干军界及民间的著名人士担任咨询员。到 1942 年,上海时局妇人会的会员总人数已超过 1 万。^②

通过上海居留民团所保留的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局妇人会”是日本政府通过居留民团在上海进行国民总动员,为侵华的日本军队提供全面支援的工具。它所设立的十三个部中,服务部、慰问部、卫生部等 8 个部是特别重要的。

一、服务部:主要任务是为侵华日军部队提供休息处所和食堂。1938 年 2 月 8 日开始,妇人会就在虹口菜场设立了军人休息所接待日本军人,所内备有茶水、点心和新闻杂志等。后因菜场内商店增加,于 3 月 5 日移到废弃的北四川路虹口旅馆内,那里设有浴场和理发所,还备有留声机,成为功能完备的日军休息所。妇人会会员每日有 4-5 人,甚至 12、3 人来此服务。日军来此休息的也从最初的每日四、五百人增加到超过一千人。妇人会的各分会也利用寺院的空房间等处设立日军休息所,备有糕点、茶水等接待、慰问日军。每逢节日还为日本军人提供日本风味的各种点心。各处休息所都为日本军人提供同样的服务。1939 年后,出于经费上的考虑,各分会共同出资在吴淞路军队卡车停车场中设立了共同休息所,将原来的北四川路休息所及一些分会休息所集中起来,于 10 月底正式开始服务。1940 年 1 月 3 日开始,共同休息所和智恩院北四川路、杨树浦路分会休息所为军人免费提供各种料理,后来吴淞路休息所还根据日本军队的请求开始运营付费食堂,每日有二、三百名,有时达一千名以上军人用午餐。每年正月有 1 万人以上的军人在各休息所免费享用各种料理。服务部在 1938 年 7 月 3 日后还负责通过火车和汽车运送日军的接待工作。^③

二、慰问部:主要以学习过演艺和舞蹈的青年女子会员组成,工作是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在上海及附近的各部队慰问演出,有时也放映电影。各分会也有各自的文艺演出,还携带各种慰问品前往各部队。1941 年 3 月开始,慰问部不仅借用中华大戏院进行一般的慰问演出,还向社会进行公开演出,将一部分收入捐给日本军队,一部分则充作慰问资金。1942 年 3 月,慰问部与居留民团社会科合作,到现场为出征、入伍及战死者家属等进行演艺慰问大会。^④

三、交际部:主要任务为在接到神社参拜及祭奠亡灵的通知时,部长及各分会代表出席参拜仪式,慰问士兵及战死者亡灵;为出征将士送日本太阳旗等。当总力报国会成立后,交际部协助总力报国会参加大诏奉戴日的遥拜式。^⑤

四、卫生部:主要负责协助日本军队制作卫生用品和进行防疫工作。1938 年 5 月开始,有 20 名会员为深谷部队进行两星期的绷带制作。1938 年 5-9 月,每日为深谷部队、黑田部队制作药包,并协助陆战队医院的防疫工作。每年为防疫班协助注射预防流行病霍乱、伤寒等疫

苗,并出版相关书籍,宣传相关卫生防疫知识。^⑤

五、手工艺部:主要工作是为上海及附近的侵华日军部队修补军服,利用旧棉布制作为清扫枪管用的布供军队使用。在武汉战场沦陷后,手工艺部制作绉纸花 17000 余朵庆祝胜利。还为军队医院制作纸花慰问伤病员,制作枕头 3000 个送往各部队的医院。在妇人会会馆开办利用废物制造玩偶以供慰问部队之用的讲习会。^⑥

六、社会部:通过各种途径募集资金,支援日本军队。1939 年 6 月开始,社会部利用中国人为其进行废品回收,并把所得用于国防经费。截止 1940 年 2 月便已达到 15000 余元。在这年的海军纪念日,社会部举行了向军队贡献机枪车三辆(以时局妇人会报国号命名),陆战机枪一部的仪式。在 1941 年 3 月 10 日的陆军纪念日上,又为军队贡献新兵器费用 2 万余元。1939 年 11 月开始,社会部同青年部、手工艺部举行了家庭不经常使用物品的交换会,将所得资金充当表忠塔的绿化费用以及日军休息所的服务费用、慰问金和新兵器费用贡献给陆军。^⑦

七、粮食部:主要工作是与服务部合作,在上海事变后为日军休息所、食堂和日军赴前线作战部队提供粮食,并为时局妇人会各种活动,如敬老会和演艺大会的演出者提供便当,为马尼拉在留日本人在沪期间提供食品。^⑧

八、储蓄部:1940 年 5 月以后提倡实行爱国储蓄活动,储蓄资金达 97110 元。这一工作在 1941 年秋得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表彰。另外 1938 年 8 月 13 日,即“八一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陆军举行了毛毯募集运动,第一次储蓄部为陆军提供新旧毛毯 1161 条,第二次提供了纯毛毛毯 805 条,棉毯 3000 条。储蓄部自建立以后还进行了十次街头资金募集工作。^⑨

时局妇人会自成立以来,不但为日本侵华军队进行直接的服务,为其提供饮食、衣物、慰问品和休息场所,而且为日本军队直接、间接提供了大量资金。她们的行为不但在物质上支持了战争体制,而且对军人起到了激励和鼓动作用,在精神上也支持了战争体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辅助机构。时局妇人会因此多次得到日本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感谢和表彰。^⑩

20 世纪初,随着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发展,居留民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它们在建立之初类型虽然还比较多样化,但其主要职能则集中于慈善捐助和为军队服务方面,已经出现单一和同化的趋势。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种类型的居留民妇女团体在上海居留民团这一接受外务省机构监督的“自治团体”的主导下,与“日本人各路联合会”这样的“草根法西斯”组织^⑪互相结合,形成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全面动员居留民社会的工具,其职能也完成转变成成为日本侵华军事行动提供全面支援。上海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的这一发展过程,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揭示了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对国民的全面统制,以及日本妇女在战争中与日本政府紧密站在一起这一事实,也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近年来学者对女性与战争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日本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⑫

注 释:

①还可参见安克强:《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②高纲博文的《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一文(见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对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的主要组织进行了研究,但并未涉及妇女团体问题。陈祖恩的《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对在沪日侨的基层组织和社团进行了研究(见第 76-81、109-138 页),其中提到了四

个妇女团体：“大和妇人会”、“日本艺妓联”及两个宗教妇女团体，即东本愿寺设立的妇人恳话会和高野山出張所举办的妇人会（见第 130、140、27-39、366、370 页）。安克强的《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提及了“妇女紧急行动委员会（Shanghai jikyoku fujinkai）及其组织和主要活动（第 187 页）。美国学者傅佛果对上海居留民团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上海居留民团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日本居留民团进行了比较，见 Joshua A. Fogel, “Shanghai-Japan”: The Japa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No. 4 (Nov., 2000), pp. 927-950. 作为日本妇女团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历史阶段，即战时日本妇女团体，日本学者有不少成果，但比较系统、全面和更为深入的研究尚显不足；关于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状况及中国学者的研究见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年），该书对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剖析，但并未涉及战时日本妇女团体的海外分支机构。我国学者刘晶辉的《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研究了日本妇女团体在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活动。

③米泽秀夫：《上海史话》，东京畝傍书房，昭和十七年，第 93 页。

④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1942 年，第 42 页。

⑤《上海新报》，第一期，转引自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76、84-85 页。

⑥转引自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

⑦《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42 页。

⑧参见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第 67-76 页。

⑨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第 158-161 页。

⑩参见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41 页；西川祐子：《总体战与女性：向战争的倾斜与翼赞“妇女”们》，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⑪参见《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岛津四十起编：《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金风社，1934 年，第 288-290 页。

⑫《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2 页。

⑬《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431 页。

⑭《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418、423、416 页。

⑮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第 140 页。

⑯《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385、390 页。

⑰《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256、376、410 页。

⑱参见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第 28-41 页。

⑲20 世纪 30 年代初，英国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比例最高，但也仅为总额的 5.9%，美国仅 1.3%。而日本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 81.9%。特别是 1914 年后；1914 年和 1930 年，日本在华人口中约 80% 在东北，7% 在上海，而在上海的企业投资总额却从 1914 年的 7.8% 增加到 1930 年的 24.6%。参见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57 页，第 353-355 页。

⑳《申报》，1937 年 7 月 29 日；《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673 页。

㉑《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1-1232 页；参见上海每日新闻社编：《华中现势》，1942 年，第 1274 页。

㉒《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2-1234 页。

㉓《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 1234-1235 页。

（下转第 59 页）

赴华与赴日之美国传教士对美国 东亚政策影响之比较

袁 瑒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通过对赴华传教士团体与赴日传教士团体加以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美国传教士在此期间对美国东亚政策形成之影响。总体而言,赴华美国传教士及其子弟在中国和美国本土两线都积极而成功地制造了“同情中国”的舆论,促成了美中最终的结盟;而赴日美国传教士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相对低调而沉默,未能积极推动美日关系、阻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关键词 美国传教士 美国东亚政策 抗日战争 基督教

美国传教士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逐渐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研究范畴大多局限于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与言论,极少将其与美国传教士在日本的言行作深度比较,也鲜有涉及在华在日两大传教士团体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学科分野是导致这类比较研究在中国尚未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这一研究空白也反映了东亚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通病,即各国学者都将焦点置于本国基督教的发展,而对基督教在国际间的关联和影响缺乏学术关怀。已有学者指出,“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传教网络,这种网络并不因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界线而发生阻隔,从整体上看它是一个系统”^①。基于以上两大原因,从事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中国传教史研究的学者都忽略了这一颇富挑战性的学术领域。相对而言,作为向世界各地差派传教士的美国,在学术视野和文献材料等方面都占有优势^②。对赴华与赴日的美国传教士作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绝非笔者所能胜任,本文意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尝试分析以下问题:为何美国民众在中日战争过程中逐渐由“亲日”转向“亲华”,传教士在此期间起到什么作用?为何前往日本的美国传教士并不积极也未能成功在美国人中制造“同情日本”的舆论,而前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却积极而成功地制造了“同情中国”的舆论?

虽然本文的研究范畴仅限于美国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传教士(不包括天主教及其他差会),时间范畴为九一八事件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在进入正题之前,极有必要先对中日两国基督教起源与发展做一简要回溯。而以传教士为主导时期的基督教会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又必须和西方差传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评述。按徐以骅教授的断限(periodisation),美国海外传教运动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一为预备阶段(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至1810年),二为开始阶段(1810年至1890年),三为全盛阶段(1890年至1918年),四为调整阶段(1918年至1945年),五为复兴阶段(1945年以后)^③。美国首次任命前往中国的传教士^④(1830年)和前往日本的传教士^⑤(1859年)都是在草创的第二阶段,而抗日战争则处于调整的第四阶段。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不仅在政治经济等硬实力方面进入“美国世纪”,在海外差传等软实力

方面美国也取代了英国跃居基督教国家的首位；而中国始终是北美新教差会最大的宣教区域。1890年北美新教差会共向中国差派了198名传教士，向日本差派了146人，两者相差不大，仅次于在印度传教士的人数(262人)。到了1938年，北美传教士在中国的人数已增长到3090名，而在日本的人数仅为686名^⑥。

1935年，新教传教士在华总人数为8,250人，一年后降到6,059人，美国传教士约占60%^⑦。中日两国信徒人数的绝对数字虽有差异，但比例上都在总人口的1%以下。综合美国学者泰勒的统计和《时代》(Time)的报道，三十年代末，日本境内曾有近八百名新教传教士，1940年底仍有640名，到1941年4月剩214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本土仅余90名传教士；而在中国日占区仅美国传教士便超过两千名^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在日军占领地区或国家的盟国传教士都被关入集中营，或遣送回国；但在中国的大后方仍有不到一千名美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活动^⑨。由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基督徒在中国和日本都属少数群体；2)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和在日的美国传教士人数都处于逐渐递减的状态；3)中国信徒的人数在战争期间增长迅速，但日本信徒人数没有明显变化，甚至还有减少的趋势。

一、美国赴华传教士对“中美结盟”的促进

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的美国赴华传教士基数庞大，他们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很难一言蔽之，也无法由某个传教士全面代表，因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历史回顾，并各举一至两名传教士作为典型个案：一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沦陷区的活动，以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例；二为美国传教士在“自由中国”的活动，以牧恩波(Rev. George W. Shepherd)为例；三为美国传教士对中日关系的调解，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例；四为美国传教士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周以德(Dr. Walter Henry Judd)为例；五为美国传教士在美国民间的宣传活动，以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和赛珍珠(Pearl Buck)为例。

如果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传教士对本国远东政策的影响则是他们在中日两大传教场域经历(field experience)的折射。在深入了解美国传教士在美国的影响之前，极有必要回顾他们在中日两国的活动与感受。对抗战期间美国赴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学者较侧重南京大屠杀这一时期，据考证统计^⑩，南京大屠杀期间共有39名外侨留宁，其中24人经历了全过程，在这24人中21人持美国国籍，含14名传教士^⑪，这一群体自发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两大救援机构，后来出席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作证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马吉(John Magee)、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和威尔逊(Robert O. Wilson)皆为两委员会成员中的传教士^⑫。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书面见证以中、英、法、日、丹麦各种文字出版后^⑬，通过从日本撤离的传教士将书偷运到日本。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读后，曾发布《告日本全体将士书》，承认日军在南京有“辱国行为”^⑭。此书也成为东京法庭对日本战犯定罪量刑的书面证据之一。

美国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活动可谓美国以及大部分西方传教士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华言行的缩影。一方面传教士在日占区的经历改变了他们对日本人的好感；另一方面，传教士为平民提供的避难、医疗、慈惠等服务也改变了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偏见。美国传教士不仅是整个中国苦难的见证人，他们本身也经受了很大的冲击，在一篇以《被忽视的受害者》^⑮为题的论文中，彭剑将之总结为财物损失、与家人离散、音信不通、行动受限、体力透支

与精神崩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守在中国的盟国传教士还蒙受了被关集中营的经历^⑩,按顾长声先生之说,约有一千二百名英美在华传教士被关进日本集中营,经日方两次遣返,到1945年6月,仍有766名在押^⑪。传教士在日占区被杀害的消息也屡有传出^⑫。

美国传教士也积极参与中国的后方建设。就教会教育而言,抗战期间,教会大学陆续西迁,在西南大后方重新办学;沦陷区教会大学的外籍校董与日军斡旋、勉力维持,继续为中国培养高级知识分子^⑬。就传教事工而言,工作重心逐渐向西南诸省转移,增设新传教区进行拓荒植堂^⑭。战争引发民众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人心渴求宗教慰藉,教会虽然在人力与物力方面损失巨大,但信徒人数仍增长甚快。在民政建设方面,美国传教士的成就可以美部会的牧恩波^⑮为代表。1935年,牧恩波因在江西黎川实验区的工作卓有成效,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总干事,被视为政教合作的典型案例^⑯,作为一种官方精神动员,蒋介石也有意使该运动“基督教化”,成为“人格救国”的内涵之一^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 Price)直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顾问^⑱。

美国传教士在抗日期间所作的另一努力便是调解中日关系、促成中日媾和。当时各方势力都看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⑲的背景,希望通过他向美国政府传递消息,达到各自的目的,但因为日、蒋、汪、美四方利益各不相同,司徒雷登虽然于1938年至1941年间五度奔走于重庆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却仍以失败告终。据民国外交史专家石源华教授分析,司徒雷登的和平之行反映了一个基本信念:“由美国介入中日和谈,是解决远东危机的有希望的方案”。^⑳这一信念在当时很多美国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

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与传教士在美国的影响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美国传教士于中美关系的影响,过去只集中于若干名由传教士转业为驻华外交官的美国人(比如伯驾、卫三畏和司徒雷登)^㉑,而传教士与美国东亚政策的关系远较此更为广泛与深入。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和外交官的步调是一致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影响已渐趋式微^㉒。尽管如此,传教士与美国政府官员之间仍保持着持久的人脉网络。除了直接担任对华外交职务外,美国赴华传教士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游说间接左右了中美关系。美国学者特兰尼(Eugene P. Trani)撰专文论述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美国赴华传教士之间的交往以及传教士对其远东政策的影响^㉓。威尔逊对美国在中国所扮演角色的信念可浓缩为:“传播民主理想、传授基督教品德、帮助中国人寻求稳定与发展”,同时他也深悉美国对华政策的局限性,即“美国人民不会为中国人而支持一场战争”^㉔。这不仅是威尔逊时期美国对华方针,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的定调。即便是今天,我们仍能从美国的“人权外交”和非政府组织的对外援助中看到这种“传教热情”式的理想主义。

据统计,二战期间,研究外国文化专家中,约有半数为传教士后裔^㉕,汉学专家更是如此^㉖。美国政府每年定期收到的大批美国东亚政策的决议案和声明,相当一部分出自海外传教会议或其下属委员会和其他各宗派海外传教理事会、牧师协会的表决^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母国的政治参与当以周以德为典型^㉘。周氏于1925-1931以及1934-1938年期间两度来华,在华北以传教士的身份行医、教授音乐和英语,在国共合作期间,为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提供过医疗服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回到美国成立了“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gation),在1939至1941短短几年间,在美国各地发表一千四百多场演讲,反对向日输运废铁等军用物

资。他主持的多项全国广播节目,以及 1939 年 4 月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942 年,他被选为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在之后二十年的从政生涯中继续影响中美关系。二战期间的在华传教士既有“援蒋抗日”的一面,也有“援蒋反共”的一面^⑤。这一倾向在开“中国游说”之先的周以德身上尤其明显,周的立场与其说是“亲华”,不如说是“亲蒋”,这一局限性导致其在 1949 年以后走上“反共援台”的道路,鼓吹“围堵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三十年代反对美日贸易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精神、还是其日后众议员生涯中暴露出不合时宜的执拗,都是周以德在中国传教之使命感在美国的延伸。

巡回演讲并非周以德的首创,按当时教会界的惯例,几乎每个传教士回国叙职期间,都会受邀在公众场合作有关传教工场的演讲。以美国赴华传教士人次基数之大,每年在北美各地以中国为主题的传教士演讲势必数以万计^⑥,这一在美国民间的庞大“中国游说团”对美国大众的舆论取向之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在言论中尤其强调中国国力以及国民政府的不屈服性,并发出日本计划侵略菲律宾和英、法、美等国在南亚之殖民地的警告。历史证明,传教士的观察是正确的。通过传教士的眼睛观察亚洲的美国政府,也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援华制日”的东亚政策。

此外,美国赴华传教士(包括他们的子弟)通过美国新闻传媒和文艺作品制造了有利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卢斯往往被中外学者列为最典型的个案。身为传教士之子^⑦,卢斯的出生地山东登州原为德国在华的租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会上,被日本接管。成年后,卢斯运用自己旗下的《时代》(Time)、《生活》(Life)、《财富》(Fortune)等杂志的影响力,将三十年代美国舆论转向了对中国的同情,形成了对美国改变东亚政策的公众压力。按美国学者基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的说法,卢斯在推销“一个美国式的中国”(an American China)^⑧方面最不遗余力^⑨。他不仅将中国与其基督教领袖(尤其是宋氏家族)联系在一起,为“宋美龄旋风”营造声势,也成功地把蒋介石从一个独裁者“华丽转身”为一位政治家,甚至是民主主义者^⑩。日本学者寺岛实郎曾将卢斯和出生在日本的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⑪相比,并不无遗憾地论道:“也就是说,在 20 世纪初叶的同一个时期,卢斯的父亲和赖肖尔的父亲都作为长老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和日本活动过。历史是无法有假设的,不过有人认为,要是假定传媒之王的卢斯出生在日本,成为学者的赖肖尔出生在中国的话,20 世纪的日美中的关系恐怕就会不一样了吧。”^⑫

赛珍珠是另外一个典型个案。1931 年前,美国流传最广有关中国的著作乃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于 1892 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1931 年后,变成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⑬。美国学者米勒(Thomas Millar)认为赛珍珠的《大地》几乎一手将中国人形象在美国人心中从“大体负面”转换为“亲切而正面”(warmly positive)^⑭。当卢斯“改良”了中国执政当局(国民党)的公众形象时,赛珍珠“改良”了普通中国人民的形象。作为“中国的守望者”(China watchers),他们的观点受众面最广、流传最快、也最容易接受。

综上所述,“传教士外交”和“传教士媒体”的交错作用在教会界、政界、报界、文艺界等社会各层重组了美国大众对中国的解读。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初,相当一部分国际舆论接受了日方的误导,倾向于相信是中国人“迫使”日本人在满洲采取“自卫行为”,中国军阀割据的局势也容易给外界造成口实。然而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发出的一手消息,以及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宣传,逐渐让美国人了解到中日之间这次战争是一场与以往中国与西方的历次军事冲突不同

性质的战争。

二、美国赴日传教士“美日和平之梦”的幻灭

与赴华美国传教士推动美中关系相比，赴日美国传教士在推动美日关系上低调消极得多。这一鲜明对比的不寻常处在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是“全盘西化”的模范生，乃西方列强向东方老旧帝国推广现代化的“活广告”。日本的先进性甚至导致时人在界定世界地理时，无法确定日本究竟属于欧洲，还是亚洲。甲午战争之后，在华传教士常常鼓励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并将日本的进步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⑤。中日矛盾爆发之前以及战争早期，西方人普遍对日本的印象较中国为好，这一偏向甚至在赴华的西方传教士中也不例外^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传教士可谓美国最早的“日本游说团”，以“亚洲潜在的基督教盟友”的定位向本国政府引介日本^⑦。但这些传教士说客主观上并不存在什么战略目的和政策意象，更未受日本政府的幕后驱使，与后来日本的“银弹委员会”雇用美国顾问与专家为其喉舌的“代理外交”具有本质上的区别^⑧。有关赴日美国传教士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活动与美国东亚政策的关系，美国学者泰勒(Sandra Taylor)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⑨。她认为，自从十九世纪末美国排华政策成功地削弱了华人在美的“可见度”，“日本人”便逐渐取代“中国人”成为“黄祸”的“形象代言人”，；抗日战争期间，在“中美相似论”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时，“日本威胁论”也逐渐盛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与赴日美国传教士在战前二十年的时期中，由积极转为低调、不再努力推进美日关系存在潜在的关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传教黄金期之后，基督教新教在日本始终被排拒在社会边缘。1914年，“联邦教会委员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聘请正在美国休假的古利克(Sidney Lewis Gulick, 1860– 1945)^⑩为“对日关系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Relations with Japan)以及“国际公义与亲善理事会”(th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Goodwill)的秘书。彼时，古利克以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在日本已居住了25年之久，被泰勒称为“日本唯一一位敢言且感人的传教士朋友和拥护者”^⑪。这位“日本的周以德”随即成立了“现行移民法规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Effective Immigration Legislation)，1921年改名为“美日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主要致力于修改、取消针对日本的排外法案。与其说古利克是赴日美国传教士的代表，不如说他是异数：因为除了他和斯古达(Doremus Scudder)、艾科斯林(William Axling)外^⑫，其他传教士都很少发表意见。这也许是因为，在二十年代所有为日本公开辩护的美国人都会受到海军情报部门和调查局的监视，古利克也不例外，并一度被定性为日本政府的雇员^⑬。1924年美国《排外法案》的通过，使在日美国传教士的处境更为尴尬。古利克所成立的“美日关系国家委员会”告解散，二战前美国唯一的“亲日”游说机构就此夭折。传教事工在日本的停滞，也使“日本正在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之类的乐观主义缺乏市场。泰勒认为，在日本于远东之迅速扩张和日侨于美国本土之“不合群”的内外因夹攻下，打造一个“民主与和平”的“日本形象”对任何一个游说团体而言都是高难度的挑战，遑论孤军奋战的“传教士游说”^⑭。日本公理会信徒的“爱国狂热”也为古利克的“亲日”立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传教士与信徒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灌输，传教士将基督教信仰传递给日本信徒的同时，也感染了日本信徒所笃信的“日本有理论”。

1895年以来,日本大约每十年进入一场战争,而在日的美国传教士大多选择站在日本这一边。九一八事变后,仍有不少美国传教士相信日本的官方宣传,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虽然“不幸”、“令人不快”或“不够荣誉”,却仍是合情合理、有其正当的外交原因。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治理满洲,在满洲有利益的日本有权接管”的观点较常出现在日本传教期刊上^⑤;另一方面,在日传教士也承认中国的主权需被尊重,呼吁美国的基督徒从双方的角度看问题。

随着日军在中国沿海的军事行动日益加剧,在日美国传教士就美国是否应该出兵保护本国在华财产与生命产生了分歧。有二十多名新教传教士联名写信给国务院,以对神之义务当高于对国家之义务的名义,反对美军向上海调兵,认为这样只会激怒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并增加具有开放思想的日本人寻求仲裁与合作的难度^⑥。当日本进一步陷入军国主义之手后,美国传教士的观点更加分化。日本当局开始禁止言论自由,超级国家主义者(ultranationalist)公开威胁异议分子的人身安全,日本著名基督教领袖、和平主义者贺川丰彦(1888 - 1960)的频频被捕,让在日传教士明白,他们眼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日本而保持缄默,二是谴责战争与暴力而被驱逐出境。1936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在向华盛顿提交的报告中,列举了近年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传教士的反美活动^⑦。日本信徒组成基督教联合会后,传教士对日本教会和社会的影响早已江河日下。日本的基督教和佛教、神道教一起被“国家主义化”,加入了所谓的精神动员运动。日本政府视日本基督徒为半个叛徒,因为他们与帝国潜在的西方敌人过从甚密。很多传教士无奈地离开,选择留下来的人变成一个低调而沉默的群体,尽量回避提及战争问题,将活动范围缩小在福音事工和教会建设上。如何调解基督教信仰和所谓“非宗教性的”靖国神社参拜仪式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在日传教士对身边日本信徒的同情也往往使他们无暇关注大海以西的中国民众。

随着日军侵华的血腥事实越来越多地被披露后,即便是古利克这样的“亲日派”传教士也已很难再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直接辩护,他们的论述开始转向对美国以及西方的谴责:正是欧洲的帝国主义引发了日本的“泛亚帝国梦”,是西方教会了日本如何凭武力称霸,日本在华的行径实为西方在世界各地行径之翻版。日本在“满洲”的行为正如美国之于墨西哥一样,只是对已陷入混乱的邻国施以“门罗主义”而已^⑧。日本提出“把白人从亚洲赶出去”从而建立“亚洲人的亚洲”的主张正是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大部分在日传教士呼吁西方“不应将其归类为如德国及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⑨,并视中国为“腐败堕落、贪污颞颥、玩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⑩极少数在日传教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的军事扩张,即便在国际舆论都在谴责军国主义时仍浑然不觉^⑪。耐人寻味的是,此时传教士中有关“和平主义”的争论似乎只限于美日之间有可能、而未发生的军事冲突,而未涉及全面爆发、愈演愈烈的中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可以接触到大量日军,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却很难接触到中国难民,因此,前者为中国的辩护较后者更令人信服。在日的美国传教士往往要到日占区旅行后才会改变对中国人的偏见,开始质疑“日本将对该地区中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使之成为天堂”^⑫的观点。他们一方面对战时惨状表示惊骇与失望,另一方面仍认为美国的压力只能适得其反^⑬。

泰勒认为,与赴华的美国传教士为促进美中关系相比,赴日的美国传教士总体而言在改善美日关系方面的声音不仅是“缺乏效果”,而且是几乎“难以听到”^⑭。当蒋介石夫妇的“信仰故事”以及他“为敌人祷告的事迹”^⑮在全美以及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报刊上不断被转载时,日

本官方对基督教的仇视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历史评价：诸探讨模式的再检视

最后,本文将就赴华与赴日之美国传教士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做初步的理论探讨。最传统的理论模式莫过于“间谍论”。诚然,在日和在华的美国传教士都在不同时期被东道国视为国际间谍,但将传教士简单地归为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帮凶已嫌粗糙。在抗日战争期间,西方传教士所披露的中国战况在客观上将国际舆论扭向了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各国传教史研究都曾呈现过护教者的溢美之辞和新左派的过苛指责之两大极端。冷战之后,已有不少中西学者排除以往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偏见及预设立场,在严谨使用史料的基础上,尝试对现实中不断变化的人性做鞭策入里的客观分析,这种学术态度是值得推广与学习的。

有关抗战期间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学术出版物中,“人道主义”这一语词近年来频频出现。“人道论”固然在开拓学术视野方面迈了一步,但作为理论框架仍略显单薄与片面。基督教信仰并非简单等同于“人道主义”,反之亦然。“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哲学思潮和伦理学说需要进一步的界定,不然则很难解释何以同为美国传教士,在华成员可以为中国平民舍生忘死,而在日成员对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展现出普遍的冷漠?又为什么传教士所显示出的人道主义与国人所期待的不尽相同^⑥。对传教策略的忽视,容易使学者摸不准“传教士人道主义”的底线。不加鉴别地使用“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也无助于区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人道主义因素”的异同。

泰勒对赴日美国传教士的论述展示了一种“夹缝论”的模式,这一模式也可用来解释美国传教士在中日两国的某些言行。传教士的尴尬之处在于:如果他们远离政治,会被斥为虚伪与冷血、缺乏正义;而一旦他们积极参政,又会失去超然地位、被戴上政教勾结的帽子。传教士角色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如何调和不同的身份(ident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基督教向来有“入世”与“出世”的双面性,而作为一名传教士,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工作久了,都会对当地的文化与人民产生爱恨交织的情感。在“属地又属天”加上“属美国又属别国”的两种双重身份的交叉与对立下:抗日战争期间,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比较倾向于利用自己“中立国”公民的有利身份帮助他所认同的中国人;而旅居日本的美籍传教士,在美日战争一触即发的阴影下,则容易陷入一种“我究竟该认同谁?我究竟该帮谁?”的困窘。“夹缝论”正可协助梳理传教运动在不同地域和国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具体而言,美籍传教士在华与在日“表相之不同”的背后却隐藏着“内在之一致”:他们都向美国民众呼吁对东方民族传扬基督教的积极意义和重要性,并向母国争取传教资源。泰勒每每不忘在结论处指出,宣传和外交皆非传教士(missionaries)的使命(mission)^⑦,为了能继续留在宣教工场,赴华与赴日的美籍传教士都选择过沉默,而大部分差会明知谁是谁非也只能持守“中立”的公开立场。

最后一种理论模式或许可被冠以“切换论”。泰勒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日本仍是古色古香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弊民穷的,美国人就会为之倾倒。一旦她变得强大、开始象其他列强那样介入世界事务、按照符合她自身国家利益而采取必要行动时,日本便不复使人着迷而成为了恐惧的对象。”^⑧泰勒的分析带有建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色彩,不仅适用于解读美日关系,也适用于解读美中关系,以及欧美与亚洲之间的多边关系。王立新教授曾将美国的“中国形象”之更替归纳为三大阶段:1)十八世纪晚期之“积极的他者”;2)十九世纪之“劣

等的他者”；3)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可控制的他者”^⑩。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之所以在二战期间定下“援华抗日”的东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因为日本之强大和中国之贫弱。王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战后迅速“变色”，脱离美国的扶持，使其帝国梦产生幻灭感。但美国很快从日本找回了信心，“战败后的日本扮演了中国的角色，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置换”^⑪。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也见证了美国“中国威胁论”的逐渐升温。由此可见，美国人在意的既非中国、也非日本，而是任何一个“有助于证明美国国家身份的对象”^⑫。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治和经济并不能完全左右外交政策。在制定与其他国家相处之道时，美国始终在寻求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道德立场。王立新教授曾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具有的对他的情感肯定会影响两国关系……通过研究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形象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测两国之间的关系”^⑬。抗日战争期间，在赢得美国大众情感这一方面，中国显然比日本占有绝对优势，而这一优势，与在两个国家从事传教事工的美国人的不同投入与付出成为正比。大体而言，民教关系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得到改善，在日本得到恶化。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促成了美中结盟，而在日的美国传教士却无法阻止美日交战。以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传教士为例的比较研究，为在思想史的架构中审视国际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并为传教史和东亚史有机结合后的学术潜能作出了初步尝试。

注 释：

①刘莉：《贺川丰彦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思潮》，华中师范大学2008硕士论文，第1-2页。

②已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研究方向，如徐以骅在《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关系》第一辑《美国宗教的“路线图”》，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一文中便提到驻各国的传教士在促进美国与其所驻国关系时起到的作用。

③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史述评》，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关系》第一辑，第321页。

④首位赴华美国传教士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于1830年2月15日抵华。

⑤首位赴日美国传教士为里根斯（John Liggins），原为赴华传教士，于1859年初前往日本疗养时，由差会改派为赴日传教士。

⑥数据引自 W. Richie Hogg, “The Role of American Protestantism in World Mission,” *American Missions in Bicentennial Perspective*, p.369.

⑦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⑧参看 “Religion: Missionaries and Japan,” *Time*, Mon, Dec. 15, 1941. 以及 S.C. 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Japan Missionari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70-1941,”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1), 1984, p. 37.

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67页。

⑩详见朱成山：《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外籍人士数考》，《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⑪包括6名担任牧职的传教士、4名金陵医院的医护人员和4名金陵大学以及金陵女大的教授。

⑫贝德士为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马吉为美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牧师；费吴生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威尔逊为金陵大学医院外科副主任医生。

⑬该书英文版书名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中文版书名《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发行10万册，日文版书名《所谓战争》发行1万册，此外还有印度版、法文版、丹麦文版。

⑭郭存孝：《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⑮彭剑：《被忽视的受害者——南京大屠杀中美国传教士的另一面相》，《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⑯参看 Cliff, N (柯喜乐), *Prisoners of the Samurai: Japanese Civilian Camps in China, 1941-1945*, Essex

Coutyard Publishers, 1998; Spink, C. D. *An Oral History Case Study on the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ing at the Chefoo School and in Weihai Internment Camp*, PhD. Diss. Widener University, 2000; 米大卫 (David Michell), *A Boy's War* (1988, OMF IHQ; 中译本: 张玫珊译:《战地童心》, 香港: 海外基督使团, 2007 年)。

①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第 367 页, 但作者未注明统计数据的出处。

①⑧参吴邦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史学集刊》1997 年第 3 期)一文第 50 页所引用的史料(《民国档案》1996 年 1 期, 文章名与作者名不详)。

①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第 374 页。

②⑩详见罗冠宗:《抗日战争时期的外国差会和传教士》,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第 337-339 页。

②⑪牧恩波原为新西兰弟兄会 (Brethren) 传教士, 1918 年 7 月来华, 1925 年转入公理会宗的美部会 (ABCFM)。

②⑫国内相关学术研究请参: 刘家峰:《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基督教江西黎川实验区研究》,《浙江学刊》, 2005 年第 4 期。国外相关学术研究可参: Brenda A. Ericson, *The Making of an Ally: Chiang Kai-she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6-194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2004, Chapter 3.

②⑬梁冠霆:《处境选择或信仰决志——抗战前后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评析》,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关系》第四辑《宗教与国际关系》(下),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 第 754 页。

②⑭关于毕范宇与蒋介石的关系, 参见 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Isaiah in China: Frank W. Price, Chiang Kai-shek and Reforming China, 1941-1949,"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82:3 (Fall), 2004, pp.180-203.

②⑮司徒雷登, 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尔 (John Linton Stuart, 1840-1913) 之子, 1904 年以传教士身份返回中国, 后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国共内战时期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6 年 7 月 11 日至 1949 年 8 月 2 日)。

②⑯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566 页。

②⑰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8), 美部会传教士, 1834 年 10 月来华, 为基督教新教赴华首位医疗传教士, 参与鸦片战争之后多项中美外交事务, 并于 1855-1857 年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卫三畏 (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 美部会传教士, 1833 年来华, 在华 43 年, 前 23 年为传教士, 后 20 年为外交官, 7 次代理馆务。

②⑱D. P. C. Neils:《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之影响》, 吴萼洲译, 李本京主编:《美国基督教会对东亚之影响》, 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 第 12、14 页。

②⑲Eugene P. Trani, "Woodrow Wilso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ies (1913-1921)",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v.49, n.4. 1971. 中译版: 陈茂华译:《伍德罗·威尔逊、中国与传教士 (1913-1921)》, 徐以骅: 主编《宗教与美国关系》第三辑《网络时代的宗教》, 时事出版社, 2005 年。

③⑩《伍德罗·威尔逊、中国与传教士 (1913-1921)》, 第 287 页。

③⑪《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之影响》, 第 7 页, 原文出处不详。

③⑫例如, 美国传教士鲍乃德 (Eugene Epperson Barnett, 1888-1970) 的长子鲍华伦 (Robert Warren Barnett) 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 次子鲍大可 (Arthur Doak Barnett, 1921-1999) 曾任美国当代世界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1949 年之后改任美国国务院外交研究所研究员。

③⑬《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之影响》, 第 12 页。

③⑭《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之影响》, 第 3-23 页。

③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方传教士》, 第 48 页。

③⑯按 James Reed 在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Cambridge: Harvard, 1983) 一书中的统计 (第 24-25 页), 即便在 1912 年, 美国每年约有三百位赴华传教士回国度假叙职, 即使每人每周演讲两次, 每年以中国为主题的演讲就约有三万场。而 1938 年美国赴华传教士的人数达到 3090 人时, 每年在美国民间的“中国游说”的频率势必大幅增长。

③⑰卢斯的父亲鲁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 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 先后出任齐鲁大学和燕

京大学的副校长。

③⑧例如,《时代》和《财富》等杂志常将中国大后方等同于美国西部,中国向后方撤退被喻为美国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转引自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李灵、尤西林、谢文郁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回顾与展望——纪念马礼逊来华两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414页),该文作者甚至认为在此语境中,抗战时期中国的英雄形象简直是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自我形象的翻版。

③⑨T.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ix, 11-12.

④⑩Ericso, *The Making of an Ally*, p.173.

④⑪美国历史学家,曾任驻日大使,著有《日本人》等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著作多种。

④⑫寺岛实郎:《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徐静波、沈中琦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④⑬刘禾(Lydia Liu)为《中国人的特性》英文2003年新版(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写的介绍。

④⑭Thomas J. Millar, *Americans and the Issues of China: The Passion and Dispassion of American Opinions about China, 1930 to 194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8.

④⑮详见孙广勇:《西方传教士对清末学习日本活动的引导和反应》,《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4卷第2期,第89-91页。

④⑯例如:彭剑在《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一文中将南京陷落前后传教士对日军态度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陷落前对日军之信任;2)陷落之际对日军之欢迎;3)目睹日军暴行后之极端失望。

④⑰Mindy Kotler, "Making Friends: A History of Japan's Lobby in Washington, D.C." *Venture Japan* 2, 1990, p.2.

④⑱赵可金:《论日本对美国的游说活动》,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239-240页。

④⑲S. C. Taylor, *Advocate of Understanding: Sidney Gulick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with Japa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Ineffectual Voice"; Taylor:《十字架与太阳旗:公理教会传教士与日本的扩张》,梁秀榆译,李本京主编:《美国基督教会对东亚之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

⑤⑩古利克为在马歇尔群岛传教的传教士(L.H. Gulick)之子,美部会传教士,1887年前往日本从事教育事工,25年后返回美国,撰有多本介绍日本的著作。

⑤⑪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23.

⑤⑫艾科斯科林为浸信会传教士、日本基督教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Japan)的荣誉秘书。

⑤⑬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p. 25-26.

⑤⑭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p. 27, 37.

⑤⑮例如: "The Manchurian Question", *Japan Christian Quarterly*, VII, 1932, pp.2-5.

⑤⑯Resolution from the Japan Missionaries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Stimson, Feb. 15, 1932, file 793.94 P.C. /75, RG 59, 转引自 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30.

⑤⑰J. C. Grew to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Nov. 12, 1923, file 711.94/922, RG 59; "Suppression of Pacifism in Japan,"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in Tokyo to Secretary Hull, Dec. 10, 1936, file 394.1124/Kenard, J. Spencer/6, ibid, 转引自 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32.

⑤⑱《十字架与太阳旗》,第55、61页。

⑤⑲《十字架与太阳旗》,第57页。

⑥⑩《十字架与太阳旗》,第61页。

⑥如,马立特(Merritt)曾发表一孤立声明,为日本的行为辩护甚至为日本轰炸上海怪罪中方,只有85岁的女传教士丹顿(Mary Flora Denton)在声明上签了字;详见《十字架与太阳旗》,第58页。

⑥此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 Frances Clapp 在信中流露的看法,引自《十字架与太阳旗》,第55页。

⑥《十字架与太阳旗》,第59页。

⑥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 38.

⑥在华北人士曾见证蒋介石在每日例行祷告中为日军祈祷。

⑥比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持基督教信仰的安全区委员会成员因视生命高于民族主义而与国民军将领发生争执,为了保证安全区的“非军事性”又主动缴没国民军的枪械移交日军,给人以“协助日军杀俘”的印象。

⑥如 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 38;《十字架与太阳旗》,第60页。

⑥Taylor, "The Ineffectual Voice," p. 38.

⑥详见: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一文。

⑦《在龙的映衬下》,第419页。

⑦《在龙的映衬下》,第419页。

⑦王立新:《美国在华传教运动与美中关系:一个初步的阐释框架》,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关系——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袁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88页)

③《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121页。

③《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70-71页。

③《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68-69页。

(徐青: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徐静波)

由《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看“八·一三” 事变之后的上海形象

徐 青

内容提要 论文通过战前日本的大众娱乐杂志《摩登日本》特派员松井翠声所著《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一书,揭示了“八·一三”事变之后在日本大众眼中的上海形象,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他者”否定模式的全班出演。松井为迎合时局,按照当时的报道模式对上海的形象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但是即便在战争时期,松井最终仍难以否认上海的魅力无处不在,坦言上海这个不可思议的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键词 上海指南 松井翠声 八·一三事变 上海形象

一、“上海指南”的研究现状

从 1853 年日本国内最初的《通航一览》出版以来,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到了 1930 年代后期,在沪日本侨民人数已超过了万名。^①为了方便他们的生活,同时也给新来上海的日本侨民引路,在这期间出版了不少有关上海的指南、概览、要览、一览、便览、年鉴和大观等书籍。其间比较著名的有:岛津长次郎著《上海案内》(金风社,1913 年)、杉江房造编《新上海》(日本堂,1918 年)、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上海概览》(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1921 年)、米泽秀夫等著《大上海要览案内》(上海出版社,1925 年)等。近期出版的“上海指南”有广冈今日子和夏本雄二共同编著的《大上海时空旅行指南》(情报中心出版局,2006 年)。著作分“大上海的散步方法”和“喜悦的大上海”两部分。前者对公共租界、法租界、南市、苏州河以北进行了分类介绍。后者则非常详尽地对上海的摩登流行、宣传画、罗宋汤、宾馆、跳舞场、音乐等进行了描述——这些,是三十年代都市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上海场景。此外由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副中心主编的《近现代上海·大阪的空间与社会》也值得一提。撰稿人之一的西部均将其称为“为了近代上海地理学研究的预备考察”。^②西部对自己的研究虽然自谦为“预备考察”,但是,就此领域的研究还未被开拓的现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山下武、高崎隆治主编《上海丛书》第 6 卷的《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横山隆发行 1938 年,以下简称《上海指南》)为主,以上海市档案馆资料为辅。个人认为《上海指南》是可以作为众多的“上海指南”研究资料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资料之一。该书虽然被收入《上海丛书》,但少见有对此书的研究发表。唯一见到的是在平野纯的《上海收藏》一书中曾载录了《上海指南》的最后三节。平野解说:“《上海指南》是 1938 年出版,松井翠声作为大众娱乐杂志《摩登日本》的特派记者,对前一年发生的第二次上海事变^③后的上海后方的调查报告。从书名中可以得知,餐厅、电影院等指南也同时收录在此书中。在严肃的日本军国主义美

谈内容的前提下,可以说这是贯穿着异色娱乐读物并具有高昂战意的通讯报道”。^④

本文选择研究“上海指南”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有关 1930 年代的“上海导游”和“上海指南”的研究很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以此探究“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本人眼中的上海是怎样的形象、有何变化。

高崎隆治曾说过:“1937 年中日开战之后的出版物与 1938 年夏天,徐州之战、武汉进攻战时组成的‘笔部队’时所出版的刊物性格是完全不同的”。^⑤松井来上海采访是“八·一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个月,而《上海指南》又是 1938 年 1 月出版的。当然这个时期各个杂志特派员也受日本国内舆论影响,但是他们的发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自由的。例如在当时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图书室里,还能够比较自由地看到包括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内的各类图书。^⑥在逐渐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对他者形象进行表述将是本文最主要的着眼点。

二、松井翠声与《上海指南》

松井原名五百井清荣,东京本乡出生。祖母是江户时期大阪的豪商。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运开始走下坡路。松井小学只读到一半就不得不外出打工。一边去照相馆工作、当寺院的小和尚、送报;一边在锦城中学的夜校就读。因为想换成白天读书而开始寻找晚上的工作,松井投入到无声电影解说员松浦翠波的门下当了一名见习解说员,改名为松井翠声。就此,松井一边做见习解说员,一边在中学就读直到毕业。此后在早稻田大学英文科就读,毕业后成为西洋电影专职解说员并独当一面。

有声电影导入之前,在日本电影界,特别是西洋电影解说员在知识分子阶层里是非常有人气的。松井 1930 年去美国,在好莱坞的派拉蒙电影公司制作的群星荟萃“派拉蒙大游行”里以翻译角色出演。1932 年又把有声美国西部电影介绍到了日本,并以这样的方式与德川梦声等一起在东洋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浪子》里担任了角色。1938 年又在东宝电影公司的记录片《上海》里担任解说,^⑦不仅去了中国,还慰问了日本的士兵。1941 年 10 月作为“文艺枪后运动讲演班”的成员与林芙美子、小林秀雄、新居格等一起去朝鲜旅行了一个月。^⑧由此推测,松井翠声与新居格^⑨之间有着具体交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事实上,松井在“八·一三”事变之前已经开始向大众娱乐杂志《摩登日本》^⑩投稿。曾经去过美国对美国电影非常熟悉的松井,在 1934 年 1 月写了题名为《好莱坞》的文章;1937 年 2 月还写过小说《看唐人阿吉的梦》,都刊登在了《摩登日本》上。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卢沟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抗日战争就此爆发。1937 年 8 月 13 日在上海的中日两军开始交战。在战火中松井自身对上海持有怎样的印象?为什么自愿当特派员呢?这些将在论文中进行检证。

首先,因为“新闻电影”登场的手法给了松井以极大的刺激,驱使他奋不顾身地前往动荡的上海。^⑪(松井有很长一段时期在做解说员的工作并加入了娱乐界,对应该怎样应付媒体是非常精通的,同时又有在“宣传上决不输给支那人”的自信。)其次,正巧当时《摩登日本》杂志社的社长来找松井商量,“为了杂志《摩登日本》,是否能作为特派员奔赴上海采访呢?”^⑫(那时,日本国内电台每日每晚都播放着“发自上海的同盟○○○”,松井很有可能也听到了这些报道,或许这也是他决定去上海的一个原因)当时,他爽快干脆地回答“我去,今天就去”。

就这样,松井前往上海采访,发表了《乘着战火的上海》和《上海战线突破全记》2篇报道,并连续以专刊形式刊登在同年的《摩登日本》11月和12月特别号上。这些报道第二年就以《上海指南》为名,作为专著出版。此书共有147页,分三个部分:《乘着战火的上海》、《上海报道(通讯)制作日记》、《上海指南》。第三部的《上海指南》共有40页,这是一个带有旅行导游式的题目。其他部分有关“战争中的外地”的描写方法与吉屋信子^⑮的作品很相似,内容也与书名《上海指南》相符合,包括“交通工具”、“小费”、“电话”、“电影院”、“赛狗”等通俗话题。

《摩登日本》主编菊池宽对刊物的要求非常明确,“只要把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中的现代日本表现出来就行了”。^⑯针对“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中的现代的日本”,什么是构成“杂志第一趣味”的话题,就是在创刊时须着重于“摩登”的趣味。一旦发生“战争”的话,那“战争”就是凌驾“摩登”的好素材。结果杂志《摩登日本》成了以“生活”为基础的、引诱一般读者“趣味”的媒体,“趣味”成为这份杂志存在的重要因素。

三、“八·一三”事变之后的上海形象

本节根据松井的上海采访记,对他眼中窥视到的上海印象作具体的论述。

在《摩登日本》1937年10月号上,关于“中国人的宣传”,松井有着如下言论:“有关自己的宣传,像支那人那样高明的人种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没有的。不管是怎样的胡说八道,煞有介事的夸大,花言巧语的哄骗,却掌握着巧妙地吹嘘的技术要领。这就是,支那人特有的民族性格”。^⑰文中对“支那人胡说八道”的印象描写还有以下文字:“要知道他们是何等的会说谎一事,只要看支那出了孔子和孟子那样的男人就可以判断。也就是说,支那人都是胡说八道像小偷一样的人。”^⑱“在这些年里,出了一两个应该出的人就显得很突出。在日本出了孔子、孟子,也不可能突出。因为日本人都是很伟大很正直的……这当然不能说都很正确,但是他们的胡说八道是非常彻底的”。^⑲

当时,处于特定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会说敌方在“胡说八道”。这种制作民族人种国民性格的倾向,就是19世纪的民族主义、人种主义依然残留的反映。像这样鄙视、讨厌他国国民的态度,无疑在近代的西洋国家主义、强调文明性的帝国主义的“文明与野蛮”的世界观中暴露无遗,其极端表现是德国法西斯的“犹太人虐杀”,俄罗斯人称芬兰人和波兰人为“猪”,以及当时很多欧美人鄙视地称日本人为“猴子”。

在英语中“shanghai”一词有诱拐、欺骗的意思。与喧哗的都市意义所不同的是,在伦敦、纽约、洛杉矶,说到唐人街,就意味着是暗杀团、赌博团的巢穴,至少经常与这些有关联。^⑳照此谬论,上海不就相当于原汁原味的犯罪发源地么?^㉑可见,处于与近代西洋接触点的上海,这种思想可以说得到了特别的扩张。

在日本人有关上海的著书中除以上的中国人爱“胡说八道”的印象描写以外,描写最多的是上海的“卫生”问题。这不仅在1862年的“千岁丸”调查员日记^㉒中可以看到,在日本思想家文学家笔下^㉓、在日本儿童的作文里^㉔都可以看到。对于上海的不卫生这一负面形象,在“八·一三”事变时期也同样被重复强调。在“八·一三”事变之后,松井笔下的上海“不卫生”形象又是被怎样反复描述的呢?

已经有过上海体验的松井直率地对“八·一三”事变后的上海印象作了如下描述:
“上海的夏天闷热得要把人烤焦。冬天又有着大陆气候特有的寒冷。并且,那里的人好像是没

有卫生思想似的,赤痢、霍乱、伤寒、鼠疫、凡是传染病全部都有。…在这之上,水道的水又没有达到可以安心饮用的程度。说是在日本打了预防针再去上海,但是,像这样多的传染病预防针都打的话,身体也吃不消。”^②

在“八·一三”事变之前,“上海”留给松井的印象最深的是“不卫生”印象,而当战争爆发后,他暂时把视线从集中对上海街道状况的描写转到了战争。^③但最终又从战争转回到了“不卫生”的负面形象中来。

“吸着零售香烟,黑痰毫不犹豫地到处乱吐,痰和口水能吐的地方都吐遍了。一般来往的穿着整齐、一流的、有着绅士风度的男子,哧的一声用手在擤鼻涕。非常地熟练,但有时候鼻涕还是会从手指缝中漏下来。这种时候,他本人一点也不慌张,慢吞吞地在附近的电线柱上擦一下。所以,到了上海千万不能靠在电线柱、手正好可以够得着的地方,鼻屎呀什么的正在那里发光呢……然而,初看只觉得很肮脏的日本人街道,在进入街道以后会发现痰啊什么的没有的。各家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喜好清洁的日本人的努力已经到达了街道的各个角落。这里没有会发光的电线柱。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外面虽然穿着木棉的破衣服,但是里面的内裤却一定是新的所谓的江户人。与涂满白粉用香水糊弄,半年一年都不浸浴的支那人有些不同的。”^④

松井又道:“在上海的街道上在用眼睛看之前,得先用鼻子和耳朵来感觉”。^⑤这是异文化体验的基本法则。这是日本人对外认识最古典的“难关”。“臭”是嗅觉上不快的体验,而“嫌恶、讨厌”则是心理上厌恶的意思。虽然程度不同,但是经常作为同义词来使用。这种人间的感观与“臭”的机械装置应该怎样解明是非常难的课题。对西洋人来说,他们的体臭是构成忌讳的要素。而对亚洲的各个都市来说,忌讳的就是街道的恶臭。松井独特的记述捕捉到了这点,特别在空间感觉的差异和观察视点移动这二点上颇为传神。

“支那式厕所的味道在街道上到处飘散,上海的味道如果不到这里来是不会知道的”,^⑥“大众剧场的卫生也一点不输给这座城市。打开窗就像通过隧道时的感觉,合着喧闹的伴奏音乐声、演员们的尖叫声,再加上众人的齐声喝彩声、一边喋喋不休讲话一边看戏的观众,一边发出唏里唆落的声音,一边把西瓜籽的壳与口水一起往外吐。不清洁的上海剧场里有声效果百分之一百。如果不给我们那令人产生不安的、发黑的、谁用过也不知道的、令心脏不适的有香味的毛巾的话,那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观众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了。不管怎么说,支那娱乐场的厕所终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方。既没有围栏也没有屋檐,一进去就是排列的马桶,大家正坐在上面方便。在方便中与左右两边的人说话,看过的广告和报纸又转交给旁边的人。大概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做法是一种社交礼节也说不定”。^⑦

“支那式厕所的味道”、“令心脏不适的有香味的毛巾”、“娱乐场的厕所”等有关中国上海“不卫生”、“肮脏”、“臭”的描述,从最初在高杉晋作日记里出现以来,大约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是之后仍频频地出现在日本文献中,在“八·一三”事变后再次出现在面向日本一般读者的杂志里。对上海的负面形象已经普及到了日本的一般庶民世界。有关不卫生、肮脏、吐痰、臭的中国上海人的行为,一直都在被反复地描述。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进行相对照,用“出色”、“清洁”、“模范国家”来标榜日本自身。

其实,卫生问题不一定是日本西洋化和近代化所衍生的产物,只不过日本人喜欢清洁比较出名而已。^⑧在把“不卫生”作为贬斥中国最好的材料来使用的同时,难以掩饰日本民族在卫生观念上的优越性被多次反复表明,并被模式化地使用。“卫生”和“教育”被认为是判断

“文明和野蛮”的重要尺度。在这里,日本人把自己归属于“文明”,中国上海归属于“野蛮”的书写手法是标准的东方主义^⑨模式,这在松井的言论里被毫无遗漏地发挥着。

对知道电影是由上海进入日本一事的松井来说,上海在进行怎样的电影制作,有些什么样的观众,是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的事。松井曾道:“其实大多数的支那人是不识字的。来看这些输入电影的人已是相当的知识分子……虽然这些电影的摄影班子大体是完整的,但因为来看的大众都是些‘低级’的人,所以电影也都是些荒唐无稽的隐身术或荒谬的豪杰故事,都是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内容”。^⑩

众所周知,作为“大众”媒体——上海电影(虽然电影娱乐不像当时的日本那样隆盛)在那个时期上映了不少抗日影片,这与松井偏激地评价中国大众是“低级”的、“都是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根本不能反应当时上海电影产业的实态。

松井在文章中还反复强调中国人绝大多数不识字。“虽然被说成是文字的国家,但支那人能够写字的人,在5亿民众之中不过八九个人(译者注:原文如此)。此外,因为国家很大,发音和方言不同,英语或法语等外国语言交杂在其中,显出了不可思议的现象。苦力们根本不能写字,只好在‘代写书’处请人代读信并代写回信”。^⑪诚然,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文盲现象普遍存在。但怎样提高识字率的问题,早就是近现代中国的一贯课题。而日本虽说识字率很高,但是也存在着“代写书”现象。从统计数值使用方法来看,在像《阿信》这样描写日本战前的电视连续剧里,有关“在代书屋代写信或代读信”的场景不也时时登场吗。

像这样把并不是久远的过去日本的落后形象,反射成日本优越地位的说法,把对方放在劣等地位中的典型的创作描写手法,在松井的报告里随处可见。松井的观察虽然敏锐,但是对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层结构不甚了解,只能是非常粗略地描述。所以,是“美丽”还是“肮脏”;是“正直者”还是“胡说八道”,存在着单纯的思考分类方式。这仅仅代表了“侵略者”日本人的立场。

为了把“侵略者”眼中中国民众的“抗日”、“排日”印象反映在日本人眼中,从“不卫生”的视线转到“抗日”问题上也就成为非常自然的事情。在松井眼里“一般知识阶级青年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接受了排日和抗日的特别教育。这种错误的教育方法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认为抗日就是救国”。松井在这里又强调了中国教育问题。日本在相当程度上认为,“抗日”也是教育的结果,是“知识阶层”特有的现象。这种理解方式是为了告诉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的中国绝大多数一般民众是不会高呼“抗日”的。笔者认为,他们为了维持自己心理上的平衡,自欺欺人地认为是大日本帝国在为受虐待的中国一般民众而战斗,真正的敌人是欧美帝国主义。以这样转换敌对目标来欺瞒自己,或许才能在上海生存下去和站立起来。反之,如果把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民众都认同为敌人的话,我想结果只能是失去理智,抑郁气绝。

此外,松井还有过如此的观察:“抗日、排日的口号用油漆半永久性地被写在了墙壁、建筑物和门上。各种各样的排日运动计划在这里滋生的证据陆续地被发现……其实他们的排日之根之强劲令人惊叹。看到读到的都是这些东西。士兵们指给我们看一副画说,‘但是,孩子们到底还是向着我们的。像这样的东西也有’——在日本人的文字下面画了一个乌龟。”^⑫松井针对日本兵们的“不管如何孩子们还是向着我们”的误解及狂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把“孩子们也讨厌日本兵”的现实如实地告诉了日本兵。在松井的报道里,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把“八·一三”事变中上海的战斗情况切换成日本庶民也能理解的通俗易懂的内容,描写社会关系中最弱一环的“儿童”对异国访问者的“印象”。

“某天访问了〇〇部队。在自动车前聚集的孩子们非常吵闹地喊着……孩子们都把手举了起来。孩子们唱起了歌,热烈欢迎。在几天之内村子里的孩子们成了士兵们的好朋友,还学会了日本歌曲。“谢谢,糖”唱完了歌一个孩子伸出了手……孩子们知道有日本客人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糖。反而兵士们脸红红地叙说着‘难为情的是我们。如果不给这样可爱的孩子带去礼物的话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歉意’”。^③

这里,松井在军事上的无知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上海作为“前线”的时间很短,对后来陷入中日战争困境的状态来说,此时松井描写的“战场风景”简直就如同“田园牧歌”。日本军占领上海,自诩为“解放者”。为了自身形象和行为的合理化,这样的描述是必然的。例如,在上海市档案馆资料 Y6-1-389(共 26 页)里可以看到,“支那良民愉快的生活”、“宝山县的太阳旗部落”、“上海宝山县城太阳旗村成立”、“村民信赖着皇军在耕田织布。天真的中国孩子们与和蔼的日本部队唱歌游戏,过着非常和谐愉快的生活。白地染上红色的太阳……和着风琴唱着半生不熟的歌。离战火渐渐远去的上海郊外,非常快地出现了日支亲善的风景。”在同一资料中还有着如下的文字,“对破坏东洋和平的恶敌,我军是一步也不会退让的,但是对良民、妇女、孩子的爱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的一样”、“我军对待俘虏的态度到处都显示出仁爱。对归顺的受伤敌人的治疗,食物的配给也是用心周到,对在恶军阀的统治下过着贫穷生活的支那军来说是像梦一样的惊喜”。从这些文字不难看出,日本军把自己吹嘘成“解放军”,仿佛是对松井报道的解说词。

四、小 结

纵观上述资料,我们了解到一些松井在战争中取材上海并在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战中上海状况的文章。虽然书中论述有着“战争敌我”意识,为了迎合时局,按照当时的报道模式对上海的形象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也有着许多滑稽可笑、是非颠倒的记叙,但最终,松井还是承认上海的魅力无处不在。“虽然都是些令人不太愉快的场面。但是在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却好似有什么东西在拉自己的头发”,“那里有迷惑人心的东西,上海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

可见,松井真正感兴趣、真正关心的还是“摩登上海”、“国际上海”,如果脱离了这些可以夸耀的“摩登”、“国际”等字样,“上海”就无法描述。总之,在他眼里,代表“上海”的只有赛狗场、夜总会、舞厅、咖啡馆、电影院、红灯区等娱乐设施。即使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也不忘对“摩登上海”、“国际上海”进行叙述。对松井而言,对上海的关注与大正时期在上海逗留过的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上海”印象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一边是单方面的鄙视,另一边却是憧憬,二者之间互相矛盾。“到底是什么使上海这样吸引着自己”的问题,在松井的报道中没有明确的解答,这或许与他曾经在上海的经历中所受到的影响有关,从而产生了留恋上海的同时又不可遏止地贬斥上海的现象。总之,松井在战火硝烟的上海看到的“不卫生”、“胡说八道”、“抗日”、“无教育”等负面形象都是我们熟识的他者认识模型的全班出演,从这一角度去追踪当时浮现在日本大众意识中的上海形象是重要、非常有意义的。松井是当时日本大众的代辩人。遗憾的是,被代辩的上海形象在此之后仍被反复提及和刻意夸大。

注 释:

①日本侨民的人数从 1893 年的 866 人增加到 1911 年的 7036 人、1935 年的 20000 人、一直到 1937 年高

峰期的 100000 人。参照高崎隆治解说:《上海丛书 第 6 卷》,大空社,2002 年(1938 年复刻版)。

②西部均:《大阪市立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科 21 世纪 COE 计画——为都市文化创造的人文科学研究》,2006 年,第 43-64 页。

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被称为“八·一三事变”。在日本近代史上这一事变一般被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是指 1932 年 1 月 28 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④平野纯编:《上海收藏》,筑摩书房,1991 年,第 168 页。

⑤参见高崎隆治:《战场的女流作家们》,论创社,1995 年。

⑥参见安泽隆雄:《东亚同文书院与我们的生涯 100 年(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小册子(1))》,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2006 年。

⑦龟井文夫编辑·松井翠声解说:《战记映画复刻版系列 上海——支那事变后方纪录 3》,东宝映画文化映画部制作,1938 年。

⑧参见河上徹太郎年表 <http://www.geocities.jp/penginkk/kawakami-nen.htm>。

⑨新居格编:《支那在留小学生作文》,第一书房,1939 年。

⑩《摩登日本》的篇幅一般为 130-140 页,少的时候有 84 页,多的时候则有 176 页。1930 年 10 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从 1932 年 7 月 1 日的第 3 卷第 1 号开始改由摩登日本社出版发行。于 1943 年 7 月的第 14 卷第 7 号开始改名《新太阳》,由新太阳出版社出版。战后,再次更名为《摩登日本》,以月刊形式每月发行一次,定价 35 钱(之后几次调整过费用)。

⑪松井翠声(笔者译):《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横山隆发行,1938 年,第 15-16 页。

⑫《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7 页。

⑬参见吉屋信子:《战祸的北支上海行》,新潮社,1937 年。

⑭菊池宽(笔者译):《有关摩登日本》《摩登日本》,1930 年第一卷第一号,第 1 页。

⑮松井翠声(笔者译):《支那在做怎样的宣传?》,《摩登日本》,1937 年第 10 期,第 100 页。

⑯《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31-132 页。

⑰《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34 页。

⑱《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8 页。

⑲强调上海“危险”的类似描述在当时的日本文献中有很多,如《上海案内记》,《犯罪科学》,1931 年,第 2 卷第 11 号。

⑳佐藤三郎:《近代中日交涉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 年,第 79-80 页。

㉑福泽谕吉《西航记》、涉泽荣一《航西日记》、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江南游记》、谷崎润一郎《上海见闻录》、吉屋信子《战祸的北支上海行》等。

㉒新居格编:《支那在留小学生作文》,第一书房,1939 年。

㉓《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8 页。

㉔193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

㉕《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45-47 页。

㉖《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16 页。

㉗《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06 页。

㉘《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113 页。

㉙幕府末期去过日本的法国公使雷奥·露雪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巧妙地使用手纸和布手巾,爱好清洁的日本人身上有着一一种在别的亚洲人身上所没有的特性。鸣岩宗三:《幕末日本与法国的外交》,创元社,1997 年。

㉚参见萨义德:《东方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

㉛《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第 60 页。

(下转第 81 页)

东亚地区青年的东亚认同与价值取向

刘岱淞

内容提要 东亚认同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考察东亚青年在亚洲形象建构、亚洲身份认同、东亚共同体建立相关事务方面的认同程度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 东亚共同体 东亚认同 价值取向

近年来地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也纷纷效仿欧洲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构想,并进行了很多研究和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理因素在界定地区时的作用逐渐下降,而认同在地区形成与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区化趋势及其最终导致某种形式的地区共同体的建立,是某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不断强化、地区内行为体的认同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集体身份的过程。^①然而从 1999 年东亚展望小组(EAVG)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到 2009 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提东亚共同体,共同体的实际构建过程中困难重重。其原因在于,目前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主要以经济合作为推动力,然而经贸领域的密切合作并未将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引入东亚认同建构的深度空间,同时由于缺乏共通的东亚地区认同,很多交流合作一直停留在框架协议上,无法落实。

对于东亚认同意识的概念与意义,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李文认为东亚认同是指东亚人由于分享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和集体记忆,并意识到彼此间存在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的归属感。^②崔新建表示,东亚认同是一种在超越了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认同不仅包含着认知,而且还包含着信任和承诺,认同就是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增加确定性、建设性的因素,以降低相互交流、合作的“成本”和“风险”。^③俞新天在《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一文中说,“认同给东亚各国以集体身份,指引各国以合作寻求利益的方向。”^④亨廷顿也曾表示:“在东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⑤

那么,今天的亚洲青年对东亚地区的认同现状如何?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如何定位?他们对东亚合作是否认同?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价值观念是否依然存在?在这种文化认同的现状上能否有效地建立起东亚共同体?青年的新媒体使用情况是否与东亚认同的形成有关?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在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3 月进行了题为“全球化进程中亚洲青年的价值观”的调查,调查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七个国家的十六所大学中同时展开。这十六所大学依次为:韩国汉城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国国立法政大学、菲律宾德拉萨大学、菲律宾蒂利曼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每所大学 200 名学生,按照性别、文理科类别、年级均等分布的原则进行抽取。根据抽取结果,来自七个国家的 3264 名学生接受了访问,被访者均为本地学生,无留学生或交换生;其中男生占 50.7%,女生占 49.3%;文科生占 49.2%,理科生占 50.8%;一年级到四年级依次占比例为 25.8%、26%、25.8%、22.4%;年龄呈正态分布,平均年龄 20.52 岁,标准差为 1.88。^⑥

一、想象中的亚洲形象

亚洲作为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所指。在近代之前,亚洲的概念从未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出现。而近代西方先进国家对亚洲的殖民,逐步建立起了以西方视角为主的亚洲形象:专制、野蛮、落后。作为后进者的亚洲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知识、文化、技术的同时也都接受了这种视角。19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派遣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感受到了欧洲文明的先进和对落后的亚洲文明具有的压倒优势,从而产生了对亚洲落后现状的不满,形成了“亚洲文明是落后愚昧的文明,日本不愿成为亚洲文明的一员”的亚洲观基础,进而促使明治政府确立了“脱亚入欧”的路线。因此,各国青年心目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建构的,某种程度上暗示着该国青年在想象中对于亚洲现实的接纳程度,间接反应了国民群体对于“亚洲”这个身份归属地的认同感。那么,在亚洲各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今天,在亚洲各国青年的心中亚洲具有怎样的形象呢?

1、迅速发展而又充满活力

67.4%的受访者认为亚洲给人们的印象是迅速发展的,同时有 63.6%的青年认为亚洲的形象是充满活力、十分具有发展潜力的。他们认为,历史上的亚洲虽然曾经落后,但是近几十年来亚洲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近代以来西方给亚洲贴上的“落后”的标签,尤其是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体创建的亚洲模式、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发展的格局。但同时也有 14.9%的受访青年认为亚洲的发展是迟缓的,虽然有部分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多数亚洲国家仍处于缓慢的发展中,无论是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居民生活消费,都无法和欧美经济强国相比。

其中,韩国有 70.2%的受访者认为亚洲的形象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分别有 59.6%和 55.2%;同时韩国只有 14.6%的受访者认为亚洲是“发展迟缓的”,而中国和日本分别有 24%和 23.8%的受访青年持此观点。相比较之下,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小国对于亚洲“迅速发展”的形象更为认同,如越南、泰国和菲律宾分别有 69.8%、75.6%和 69.6%的被访者认为亚洲是迅速发展的。

2、古老而多元化

51.6%的各国受访者认为亚洲是“古老的”,55.3%的受访者认为亚洲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是“多元而异质的”。他们认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两个在亚洲,而且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今天的人口之和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泰国、越南、韩国、日本等国也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并有保存完好的文化古迹,今天的很多亚洲人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因此亚洲的整体印象应该是“古老的”。同时,也有 27.7%的受访者认为亚洲是“年轻的”,21.8%的受访者认为亚洲是“同质的”、“一元化的”。

其中,中国和韩国青年都倾向于认为亚洲是“古老的”,有 60.4%的中国青年和 44.7%的韩国青年持此观点;日本青年则倾向于认为亚洲是“年轻的”,40%的受访者赞同此观点,而只有 29.7%的日本青年认为亚洲是古老的。

3、干净的亚洲? 危险的亚洲?

对于亚洲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这两个议题,亚洲各国青年没有形成统一的印象。日本和中国青年倾向于认为亚洲是“肮脏的”,有 58.8%的日本青年和 42%的中国青年持此观点,而仅有 9.7%的日本青年和 21.5%的中国青年认为亚洲是“干净的”。其余国家则倾向于认为亚洲是“干净的”。如 60.1%的菲律宾青年和 53.8%的新加坡受访青年支持此观点,同时这两国分别只有“10.5%”和“15.9%”的受访者持相反意见。

中国和越南倾向于认为亚洲是“安全的”,其他国家倾向于认为是“危险的”。越南青年的安全感较高,有 50.5%的受访者认为亚洲是安全的,而中国有 36.5%的青年如此认为,仅比持相反意见者多 3 个百分点。日本的安全感最低,有 61.7%的日本青年认为亚洲是“危险的”,仅有 19.5%的日本青年认为亚洲是“安全的”。韩国青年中 39.8%认为亚洲是“危险的”,29%认为亚洲是“安全的”。

亚洲各国青年心中的亚洲形象总体上是古老但富有活力的、文化多元同时又相互包容,尽管现状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正处在迅速发展的阶段,前景可喜。与西方世界一百多年来构建的传统亚洲形象相比,今天的亚洲形象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亚洲形象的建构影响着国民对于地区归属感认同的建构。对于亚洲形象美好的想象往往意味着亲近感,代表着强归属感认同;相反,对于亚洲形象恶劣的想象意味着疏远感,代表着弱归属感认同。日本“脱亚入欧”的历史已经很明确的印证了这一点。在各国青年对于亚洲形象的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小国如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都有很强的地区归属感认同,普遍高于中日韩三国。而中日韩三国中,又以韩国的地区归属感认同感最强,中国次之,日本最弱。韩国青年表现出来的积极和正面性与日本青年的冷淡和消极形成了较鲜明的对比。

二、亚洲青年眼中的亚洲国家

在“符合您心目中亚洲形象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中国大陆排在总评的第一位,后面依次为日本、新加坡、香港和韩国。可以看出,迅速发展的经济强国是亚洲青年心中理想的亚洲国家。同样是地区大国但经济发展整体情况较落后的印度排名较后,甚至在马来西亚和越南之后。这是亚洲青年对于想象中的亚洲形象的另一种回答。但是对于亚洲形象的接受并不代表着最终亚洲认同感的建立,地区国家间彼此的关系是能否构建起信赖,乃至地区性认同的重要因素。这种因素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划分体系中被划为角色认同。角色认同只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角色是通过他者看到的自我。^⑦认同不仅包含着认知,而且还包含着信任和承诺。^⑧

尽管中国大陆在亚洲形象的排名中排在最先,但在与他国的友好程度上落后与日本等国。有超过 25%的青年认为中国对自己的国家有不利的影 响,而日本不到 20%,韩国低于 10%(表 1)。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和韩国对自己的国家有更好的影响,分别为 59.9%和 56.1%,超过中国的 51.6%。在所有国家中,新加坡被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第二是澳大利亚,接下来依次为英国、韩国、日本。而最不友好的国家依次为朝鲜、印度尼西亚和越

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两国青年中给予对方国家负面评价的人比正面评价的人多。中国有 26%的受访者认为日本会给中国带来不好的影响,有 19.9%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很坏;日本有 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较坏,13.5%认为影响很坏。此外,日韩两国都将朝鲜看作“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日本有 24.7%的受访者认为朝鲜的影响较坏,66.9%的受访者认为朝鲜的影响很坏,在韩国这两个数字依次是 46.1%和 14.1%。

表 1 亚洲各国青年对中日韩三国可能对自己国家产生的影响评价

	影响很好	影响较好	不好也不坏	影响较坏	影响很坏
中国	13.3%	38.3%	22.5%	19.2%	6.7%
日本	21.8%	38.1%	21.1%	12.8%	6.3%
韩国	13.6%	42.5%	33.8%	7.3%	2.7%

可以看出,由于没有完全抛弃成见,亚洲国家之间至今仍受到历史的影响,从民众对于其他国家友好程度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意识形态与教化的痕迹。虽然持不友好态度的青年总体上为少数群体,但在建立国家间角色认同的过程中可能起到的负面作用却不容忽视。同时,国外青年对于日本、韩国的好评度高于中国也提醒了我们在对外交流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不足。

三、东亚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认同与价值规范

在东亚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区域内的国家可能采取一系列的方式加强交流、合作、互动,增强国家之间文化的认同,信赖关系的搭建。这一过程涉及到一系列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对这些规范的认同将起到彼此确定身份的“建设性作用”。在交往过程中,确定采取哪些行动会使相关的其他行为体承认某个特定行为体的身份。^⑨因而,民众对于建构共同体的路径、组织方式、合作领域以及一系列共有价值规范的认同,可以提示我们共同体的建设进行状况,以及可能发生问题的环节。

1、亚洲身份与亚洲认同

在对于“亚洲身份”的认同情况的调查中,亚洲青年表现出了相当高的认可率,有 30.3%的受访者对于“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表示“非常赞同”,61%表示“赞同”,仅有 8.7%表示了“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同时,亚洲青年对于“亚洲身份”的认同度两项合并达 91.3%,略低于对“国家公民”的认同(96.8%),但高于对“世界公民”(86.7%)和“社区公民”(82.3%)的认同。但是,在“亚洲缺乏整体的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仍有接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同时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大力发展“亚洲公民”的概念表示支持。

同时七成受访者认为亚洲国家之间共性大于差异;九成受访者都认为亚洲认同的成长将有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其中认为非常重要的占 49.1%。日本青年在这几个问题的态度上均显得比较消极,除“亚洲认同的成长有助于地区稳定”外,均有半数表示反对意见。而韩国青年显得尤为积极。

地区认同是以地域作为划分依据的集体认同,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将体系内一般化的他者作为自身理解的一部分的认同,以及将自己作为群我一部分的意识。^⑩尽管有九成多的受访者认可“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等于承认“亚洲公民”的身份,但仍有半数

被访者表示亚洲缺乏整体的身份认同。说明亚洲青年对于“亚洲身份”的高认同率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对自己身在亚洲因而获得的这样一种“无法选择”的身份的接受,而非心理意义上的“认同”。因此虽然在比例上对“亚洲公民”的认同仅比“国家公民”的认同低五个百分点,但“国家公民”身份所蕴含的文化、身份、民族等认同的力量是“亚洲公民”所不能比拟的。因而有接近半数的被访者认为“亚洲缺乏整体的身份认同”。但可喜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多数亚洲国家对于发展“亚洲认同”持积极的态度。

2、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是东亚地区合作的重心,一般学界观点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将对地区的政治、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受访者中的 96.9%认为经济一体化对于亚洲稳定是很重要的,其中 70%的人认为非常重要;有 83.7%的受访者相信经济一体化能使得亚洲国家之间更加彼此信赖;有 78.1%的人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使生活更富裕,只有 21.9%的人反对这一点。亚洲各国青年普遍认同经济一体化将给亚洲各国来带有利的发展前途,同时也会让亚洲整体环境更趋于稳定和睦。

但同时也有 54.6%的人认为经济一体化会拉大贫富差距,32.1%的人认为经济一体化会破坏国内经济,另有 38.9%的人相信国家力量会被削弱。不少亚洲青年也很冷静地看到经济一体化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不利因素。52.5%的受访者表示经济一体化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 61%相信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只对外国跨国公司有利。

中日韩三国青年对待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略有不同,在“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严重的贫富差距”上,38.9%的中国青年表示同意,8.2%表示非常同意,两者合并为 47.1%,同时有 52.9%的中国青年认为经济一体化不会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然对此问题,45.6%的日本青年表示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11.3%表示非常同意,两者合并为 56.9%;韩国青年有 60.9%表示对“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表示同意,12.1%表示非常同意,两者合并达 73%。此外,有 56.2%的韩国青年认为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严重的环境危机,而日本和中国分别只有 37%和 43.9%这样认为;52.3%的韩国青年认为经济一体化会削弱国家力量,37.6%的日本青年也持有相同观点,中国青年对此认同者占 31.4%;总体看来,亚洲各国青年充分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将对本国带来的利益,经济利益仍然是推动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对于经济一体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中国青年相对更乐观,韩国和日本更为理性并略显消极。

3、地区安全与稳定

关于亚洲地区的安全稳定,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大国间的势力均衡很重要,同时也不能排除美国在亚洲局势稳定中的作用。接受访问的各国青年认为“大国平衡”对安全稳定是“重要的”占 45.3%,认为“非常重要”的也占 45.3%,合计超过 90%,其中中国认为大国平衡非常重要的占 65.7%,远超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力量在亚洲稳定中“一般重要”的占 45.6%,认为“非常重要”的占 15.5%。中国青年中有 21.5%认为美国力量“非常重要”,远高于日本的 14.9%。而反对的意见中,认为美国力量“不是很重要”和“一点也不重要”两项合并的比例中国为 37.2%,日本为 42.7%。韩国青年认为美国力量“非常重要”的比例为 14.7%,但是认为美国力量“一般重要”的为 60%,为各国最高。在各国青年中,中国青年对于大国实力的重要性认同度最高,同时中国青年整体对于美国重要性的认同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相反,日本青年对于美国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相对于中国和日本青年观点的离散程度较大,韩国青年对于美国影响的认同较为一致,认为美国影响既不能忽视,但也并非至关重要。

亚洲青年对“如果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我国应该进行军事干涉”这一问题普遍持反对意见,61.4%表示“不同意”,17.6%表示“非常不同意”,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仅占16.7%。日本青年表示“非常不同意”的有38%,表示反对意见的两项数据合并占90.1%,高于平均水平;中国表示“不同意”的占65.7%,表示“非常不同意”占9%。在表示赞同意见者中,韩国青年表示“同意”的比例为29.5%，“非常同意”的为6.5%,均高于平均水平。

对于“当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侵犯人权,我国应采取行动”这一问题,六成亚洲青年持支持态度,四成反对。中国青年在此问题上有55.9%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44.1%表示“同意”。韩国青年有62.5%表示“同意”,8.4%表示“非常同意”。对于“当他国发生如种族灭绝等严重人权侵害事件时,我国应支持联合国干预行动”这一问题,九成受访者表示支持,28.6%的人表示“非常支持”,60.2%表示“支持”。各国选项分布比例相似。

在对于他国内政的干涉上,儒家传统的文化主张“和而不同”,绝大多数亚洲青年也表达了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意愿。尤其当涉及到军事行为的时候,亚洲各国青年更为谨慎。但当极为不人道的事件即将发生,亚洲青年同样旗帜鲜明地表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干涉。中国因在人权问题上经常受到外媒的攻击,因而对于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极为反感,表示不同意的人数远高于平均水平。而日本青年对于“干涉”、“军事”等敏感词汇的反应相当谨慎,普遍低于平均水平。韩国青年在军事安全相关问题上积极的表现也符合韩国国内对于成为东亚政治大国的积极要求。

4、文化交流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亚洲青年都认为亚洲各国之间应该进一步增加文化交流,但是有三成的受访者反对人口流动的增加,认为流动人口可能带来诸多在安全、环境、竞争等方面的问题。

在对于国外的了解上,多数亚洲青年的信息来源于媒体。有半数受访者表示从未去过国外。亚洲青年去过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有25.1%的受访者到过中国,而只有12.8%到过日本,8.7%到过韩国。中国是到访率最高的国家,却是出国率最低的国家。其中,受访的中国青年中有80.1%从未出过国,而韩国这个数字是32%,日本只有20%。韩国青年到过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和中国,分别有36.6%和24.9%的韩国青年到过这两个国家。而日本青年到过最多的国家为美国和韩国,分别占48.5%和21%。

如果出国留学,亚洲青年的首选地是美国,有4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有兴趣,39.4%表示比较有兴趣。其次是英国,有33.7%表示非常有兴趣,43.3%表示比较有兴趣。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亚洲青年心中最理想的留学国,有23.5%的人对日本留学非常有兴趣,37.2%表示比较有兴趣。其次为新加坡,再次为中国和韩国。对留学中国表示“非常有兴趣”的有8.9%,比较有兴趣的有24.3%。

各国青年普遍认为增进文化交流有利于东亚认同的培育和民众之间的了解。但日韩两国显然并不愿意让来自中国的数量庞大的劳工群来到自己的国内争夺有限的就业岗位。同时数据显示,中国在开放国门吸引国外青年来华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内青年走出国门、到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与日韩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虽然受制于体制和经济等原因,但这提示了我们高校教育应该注重国际化交流,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同时,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亚洲青年理想的留学国家为欧美国家,但数据仍提示我们开发留学市场,增进文化交流仍有相当大的潜力。

5、地区性组织与东亚共同体

在亚洲的地区性组织中,东盟的知晓率最高,为 91.9%,其次为亚太经合组织 91.6%,再次为东亚峰会 56.4%。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的知晓率都较低,分别为 32%、24.4%、22.7%。其中东盟成立的时间最长,关注亚洲地区性合作最久,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是在东盟首脑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东亚国家尤其是小国中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盟已经结成一体,以一个团体的身份在亚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超越地理意义上亚洲区域的联合组织,包括亚洲、大洋洲、美洲的国家都在这个平台上共商经济发展与贸易合作。由于有美国的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在亚洲的影响比东盟更加广泛而深远。除中国外的亚洲各国青年对于东盟和 APEC 以外的亚洲地区性组织知晓率不高,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日本青年的知晓率为 9.6%,韩国青年为 10.5%;博鳌亚洲论坛的知晓率更低,日本仅为 3%,韩国为 2.4%。相比之下,中国青年对这两个组织的知晓率分别高达 71.5%和 78.8%。

对于地区性合作组织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洲各国青年认为难民问题、传染病防治、贸易政策和领土争端应该是地区性组织更多发挥作用的领域(表 2)。受访者普遍认为很难准确划分地区性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界限,尤其在当前亚洲地区还没有建立稳定成熟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因而更多的合作是通过双边协议或者国际组织来进行的。出于历史原因,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组织更适合处理国际间事务,地区性组织独当一面的时机尚未成熟。

表 2 您认为以下这些事务更应该由哪一级别的组织制定政策或进行管理

	维护 和平	环境 保护	援助 发展中 国家	难民 问题	保护 人权	疾病 防治	汇率 管理	贸易 政策	跨国 犯罪	领土 争端
国家政府	28.0%	35.2%	17.0%	24.4%	38.2%	34.0%	36.0%	40.6%	11.2%	28.8%
地区组织	12.7%	19.7%	18.6%	28.6%	11.0%	25.9%	16.0%	24.1%	11.5%	24.5%
国际组织	59.3%	45.1%	64.5%	47.0%	50.8%	40.2%	48.0%	35.3%	77.2%	46.7%

对于“东亚共同体将于 2020 年建立”的判断,54.1%表示同意,9.5%表示非常同意,但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受访者表示不赞同。反对的声音中中国有 39.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4.7%表示非常不同意,两者合并 44.3%;韩国 42.6%“不同意”,5.2%非常不同意,二者合并为 47.8%;日本 51.6%不同意,13.7%非常不同意,二者合并高达 65.3%。与日本政界在东亚共同体上积极的态度相比,日本民间尤其是日本青年对此反应却很冷淡。

四、媒体使用情况与东亚认同的形成

80.4%的各国受访者几乎每天都上网浏览网页,15.3%的受访者至少每周浏览几次,很少或者从不浏览的合计不到 2%;同时 50.6%的受访者每天都会收发电子邮件,31.5%每周都会收发,9.4%的每月都会收发,同时也有 8.5%的受访者很少或者从不发(表 3)。手机使用方面,86.1%的受访者每天使用手机收发短消息。新媒体的使用已经成为各国青年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是获取信息和人际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和当地经济情况相关,中日韩三国青年的使用频率无显著区别,但普遍高于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相对于收

表 3 中日韩三国青年新媒体使用情况

	每天浏览网页	每天收发电子邮件	每天收发手机短信
中国	83.1%	56.2%	94.7%
日本	85.5%	51.5%	96.8%
韩国	90.5%	41.5%	96.8%

发电子邮件,各国青年的人际交流和工作交流更经常依赖手机短信。

对于本国传统媒体的使用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国外传统媒体的接触主要集中在卫星电视和本国媒体转播的影视剧作品等。根据调查,各国青年对于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美的影视作品(电视剧、电影、动画)都有相当程度的接触,其中以欧美为最高,有 24.1%的受访者表示每天都会收看欧美电视剧或电影等,接触率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除欧美影视作品外,日本影视作品的接触率也较高,其次为中国和韩国(表 4)。每一部影视作品都蕴含着很多的文化因素如:历史、地理、生活习俗、艺术、音乐。同时又穿插着生产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价值理念,在文化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的构建上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在亚洲各国青年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同化过程中,欧美文化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日本、中国和韩国在这一方面不相上下,各有千秋。

表 4 亚洲各国青年收看外国影视作品的情况

	中国影视作品	韩国影视作品	日本影视作品	欧美影视作品
中国青年	55.8%	20.0%	27.0%	39.3%
韩国青年	3.2%	74.6%	24.1%	41.6%
日本青年	0.5%	3.8%	84.0%	17.2%
越南青年	71.3%	56.5%	26.1%	79.5%
泰国青年	37.0%	46.0%	52.8%	71.0%
菲律宾青年	19.0%	41.3%	54.3%	86.5%
新加坡青年	61.3%	32.4%	37.0%	65.6%

欧美影视作品的高接触率,说明来自欧美的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效能已经远超其他国家,成为仅次于亚洲各国官方意识外第二强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小国和经济后发的国家中影响显得更加明显,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都有六成以上的青年经常收看欧美的影视作品,而在中国和韩国仅有四成青年经常收看,日本更是低于两成。经济上的强大与独立自主,往往伴随着心态上的优越感,从而使得国民在文化上愈加独立自主。中国青年仅有刚刚超过半数的人经常收看本国节目,但同时却有相当高比例的群体收看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影视作品;而日本和韩国青年却几乎很少有人经常收看中国的影视节目。同时相对于韩国,日本青年更多的收看自己国家的节目,而排斥其他国家的影视节目。

一个国家的影视作品蕴涵着该国家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接受并喜欢看这类影视作品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该文化和价值观的接纳。以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为例,用欧美影视节目的接触频率作为自变量,考察它和“美国的软实力过于强大,亚洲国家无法抵抗”态度变量以及前往美国留学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在 0.01 水准上呈显著正相关。但在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亚洲的稳定很重要”这一态度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时未得到显著相关的结果。

说明影视节目等媒体文化传播手段能够有效地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消除刻板印象,增加进一步了解的意愿,但在涉及到政治、军事等敏感话题时,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有限,有时甚至起到反效果。因此,在亚洲国家之间通过各种媒体增加文化交流,将对促进民众之间的交流,创造良好的、鼓励性的环境有显著效用。

五、亚洲各国青年的东亚认同感现状与对策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进程中亚洲青年的价值观”的调研结果显示,被访的东亚各国青年已经用积极发展的亚洲形象代替了古老而落后的亚洲形象。东亚各国青年已经看到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将对自己国家带来利益和长远发展,绝大多数积极认同以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带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在安全稳定与文化交流上,亚洲各国青年主张“积极交流,和而不同”的原则。经历了经济全球化以及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巨大变革之后的亚洲青年,仍会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东亚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各国青年的亚洲观、身份认同感、对各种价值规范的认同均有差异。

作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日本官方和学界向来是东亚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根据调查数据,日本青年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不热心,相反十分冷淡。对于亚洲形象的不良观感、身处亚洲的不安全感、对经济合作弊端的冷眼态度、对东亚共同体成立无所谓等都表示出了与日本官方截然相反的态度。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文化已经趋于稳定状态,日本国民在战后也倾向于和平稳定的生活。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民众最喜爱并向往的国家一直是瑞士,说明小而富裕、政治中立的国家一直是日本国民的理想。^⑩因此,相对来说,日本青年对于大国相争、大国地位等都不十分热心。

相反,近年来经济上保持迅速发展的韩国国内民族主义逐渐兴起,对于传统文化的追寻和发扬、对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争取都促使韩国从官方到民间弥漫着一股激昂的民族主义热情。在旁观者看来,有时不免走向极端。同时近年来韩国在文化产业不断有突出进展,凭借其文化软实力在亚洲乃至全球掀起一阵又一阵“韩流”。因此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上,韩国乐见其成,但目前为止韩国官方并没有像日本官方那样去积极地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青年延续了中华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地区性合作理智而谨慎。相对于日本和韩国,中国青年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很有限,80.1%的受访青年从未出过国。这也导致了中国青年热衷于收看外国影视节目的现象。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中日韩三国青年对于东亚共同体发展的认同程度如何或将成为东亚一体化发展的风向标。

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内晚年曾说:“如果我能从头再来,我会选择文化作为起始点”。亚洲一体化现在刚刚起步,这一代年青人将很有可能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的中坚力量,在文化认同的建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虽然历史问题仍然是文化交流与建构认同过程中的重要阻碍,但是东亚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是共通的,一旦去除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枷锁,东亚认同的曙光就将来临。

注 释:

- ①郭定平:《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 ②李文:《构建东亚认同:意义、问题与途径》,《当代亚太》,2007年第6期,第3页。
 - ③崔新建:《文化认同及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 ④俞新天:《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从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22页。
 - 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⑥以下分析数据均来自“全球化进程中亚洲青年的价值观”调查得出的问卷结果。
 - ⑦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4.
 - ⑧崔新建:《文化认同及根源》。
 - ⑨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
 - ⑩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224.
 - ⑪纪廷许:《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大众意识浅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91-93页。
- (刘岱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论体现“学习当事者需求”的教材开发 及其支援网站建设

田中祐辅

内容提要 当今日语教育中的学习需求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多样化态势,但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应对仍有待加强。构建“教材开发支援网站”的目的在于体现学习需求中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应对的领域,即体现教学现场中“学习当事者需求”的全貌。本文将简要介绍这一网站的功能、使用方法及其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适应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综合日语教材的开发模式。

关键词 教材开发 学习需求 综合日语 教材开发支援网站

一、研究背景

(一)“适应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一项具有现代化意义的课题

2009 年国际交流基金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达 83 万人,高居世界第二,其中多数是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在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的日语教育课程设置中,综合日语(精读)课作为主要科目(曹,2006),至今已编写和出版了多套相关教材(修,2002)。此外,有关其教学目标、教学大纲以及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也都在蓬勃发展(吉冈,2008)。在这一背景下,开发出能够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目的、学习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的日语教材就显得十分必要。但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能够满足所谓学习者普遍需求的教材,因此理想的教材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应该是针对每一个学习者的具体需求而开发的(小林,2010)。因此,无论在哪一个教学现场,都未能全面实现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开发(刘,2008;田中等,2010)。对中国的日语教育而言,开发能够适应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教材,可谓是一项具有现代化意义的课题。

(二)“学习需求”的模糊性

纵观迄今为止的日语教育,在决定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等方针的时候,总是高调倡导“适应学习需求”的必要性(冈野、长田、修克,1991)。但在以往的讨论中,对于“学习需求”的界定向来模棱两可,各执一词。古田(2005)指出,在教育领域中,“需求”常被笼统地加以运用,但作为一个具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概念,对它应当加以分析性地运用,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日语教育中。也就是说,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了适应学习需求的必要性,但对于“学习需求”究竟是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探讨却并不充分。为了在教材开发中有效适应“学习需求”,关键是要具体考虑和落实(1)“学习需求”究竟是什么以及(2)如何才能明确每个教学现场的“学习需求”这两个问题。

(三)本文所界定的“学习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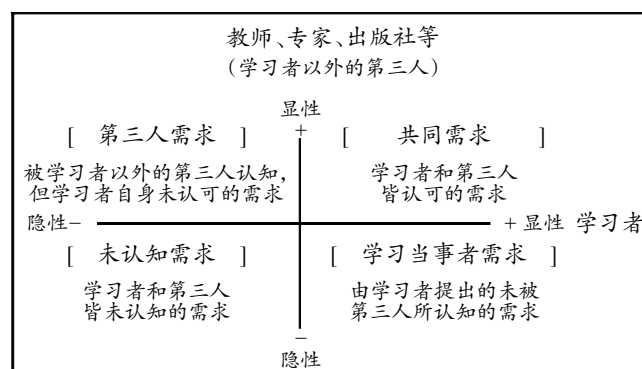


图1 日语教材开发中的四类“学习需求”

在日语教材开发中,究竟何谓必须适应的“学习需求”?本研究在立足于 Bradshaw (1972)、三浦(1985)、上野、中西(2008)、古田(2005)等日语教育学以外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进一步明确日语教材开发所必须适应的“学习需求”的构成要素。

图1是笔者在参考了上野、中西(2008)的基础上制作而成的图示模型。其中笔者将需求的产生主体分成作为学习当事者的学习者以及第三人(教师、专家、出版社等)两大类,并将它们分别置于横轴和纵轴。随后根据它们各自可能存在的需求状态,进一步区分出了“显性(已被认定为需求)需求”以及“隐性(未被认定为需求)需求”。

图1的左下方的部分表示的是学习者和第三人都未认知的需求。本研究中称之为“未认知需求”。左上方的部分是表示虽未被学习者所认知,但第三人已加以认可的需求。本研究中称之为“第三人需求”。例如,在冷(2005)一文中提到,在分别对使用某本教材的教师和学习者进行调查后,发现双方对教材的评价大相径庭,教师表示对教材基本满意,而学习者却对教材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评价。这里的教材也就属于偏向作为第三人的教师所需求的“第三人需求”型的教材。

右上方的部分表示学习者和第三人都认知并认可的需求。本研究称之为“共同需求”。右下方的部分表示虽未被第三人认知,但作为学习当事人的学习者自身所要求的需求。本研究中称之为“学习当事者需求”。同时笔者认为,“学习当事者需求”还应和“第三人需求”、“共同需求”一起构成作为教材对象的现场“学习需求”的要素。

(四)对“学习当事者需求”认知不足阻碍“适应学习需求”

令人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学习当事者需求”都未曾得到开发者的充分重视,因而难以适应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具体而言,在冷(2005)一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事例。在一项针对综合日语的调查中,相关教师和学习者的回答结果显示,虽然双方都认识到必须重视语言的运用能力,但为了能够顺利通过日语能力检定以及专业日语等考试,在实际教学中,往往还是会倾向于采用语言知识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以至于未能很好地适应学习需求。实际上,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并非单纯是教师全然漠视或不愿意去适应学习需求,而是在对学习需求的把握和理解上存在一定偏差。教师虽然认识到“必须重视语言运用能力”这一学习者需求,但在考试合格等于综合日语教学达标这种观念的驱使下,最终还是会基于“注重语言知识的灌输”这一自身的需求来安排教学活动。也就是说,在把握学习需求的时候,教师优先选择了在前文提到的四类学习需求中的“第三人需求”,而非“学习当事者需求”,以至于无法全面体现教学现场的“学习需

求”情况,也未能很好地去适应真正的“学习需求”。一旦这种忽略“学习当事者需求”的现象在教材开发过程中普及和蔓延,要想正确地把握学习需求并作出合适的应对,就将变得十分困难。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从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教材开发者充分认知的“学习当事者需求”以及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始终未能得到正确把握的“学习需求”出发,通过考察“教材开发支援网站”的开发及其运行和效果,以期能够提出适应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综合日语教材的开发模式。

三、研究方法

笔者将记述由他发起成立的教材开发实践团队(以下简称“教材开发小组 A”),在教材开发中,体现“学习当事者需求”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论述由教材开发小组 A 所开发的“教材开发支援网站”的功能以及使用方法和效果,提出适应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综合日语教材的开发模式。本文中使用的调查资料如下所示。

(1)教材开发小组 A:至 2010 年 9 月,目前已有 29 名成员,参与此次在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综合日语课程中使用的日语教材的开发项目。(其中,10 名成员是以日语教育专家为核心的教材内容编写者。其余 19 名成员都是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并且都是作为此次开发的教材使用对象的教学现场的学习者。在教材开发过程中,他们始终作为“学习当事者需求”的提供者,志愿加入团队。)

(2)调查期间:2009 年 9 月 1 日~2010 年 9 月 13 日

(3)分析对象:基于调查对象的网站构建流程、27 篇保存在网站使用者记录中的由 19 名调查对象所发表的意见(站在学习者的立场上针对教材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四、结果及考察

(一)明确个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与整个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

为了让“学习当事者需求”受到重视,首先必须明确教学开发过程中的“学习当事者需求”。为此,教材开发小组 A 除了想到要开展一次性的准备性调查和需求调查等一些基本调查活动之外,更是提出设想,必须构建一个贯穿整个教材开发过程,能让学习者持续发表意见和提出要求的平台。

基于这一创想,教材开发小组 A 定期地举办学习情况调查,在明确了学习者的需求之后决定着手编写综合日语教材。^①此外,为了考察和确认每课登载的文章以及词汇文法说明是否妥当,进而尝试构建一个能让学习者持续发表意见的平台。教材中所有成形的课文都会通过邮件发送给每个学习者,然后再通过邮件接收他们的反馈信息。^②

这里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每个学习者在试用教材后所发表的效果反馈意见,若只在开发者和学习者个人之间共享的话,这些意见只能称作个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而非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因为开发中的教材,是要作为大学日语专业的综合日语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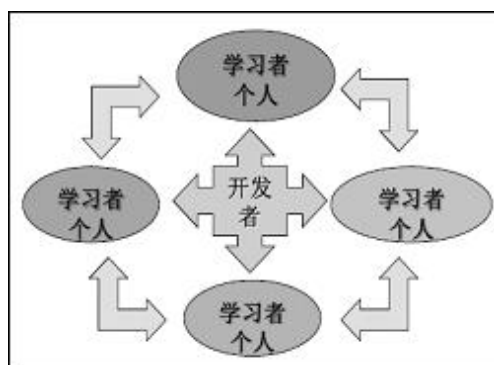


图2 各“学习当事者需求”之间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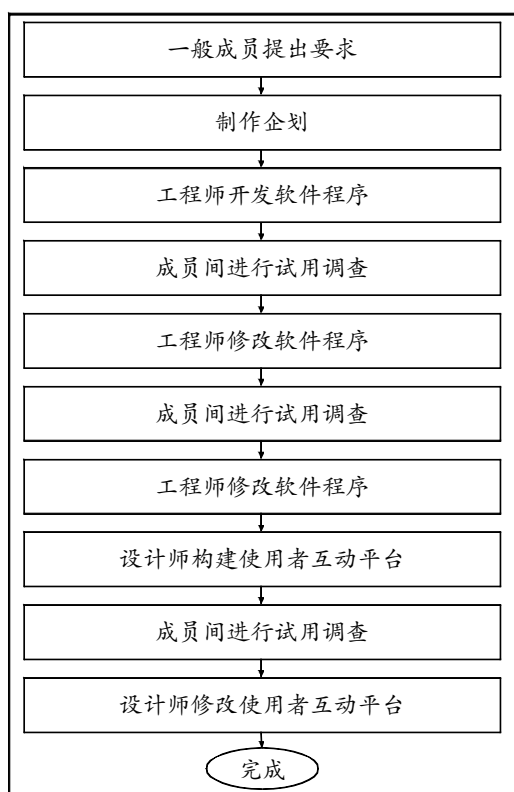


图3 网站构建流程

的正式教材来使用的。试想在聚集了数名学习者的教室中,教室里的成员间彼此通过交流进行语言学习的情形,如果说使用的教材只是适应了某个特定个人的需求的话,必将受到质疑。因此有必要通过教学现场全体成员的互动,来寻求和探究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为此,我们认为,有关教材的意见和要求,不仅要在开发者和学习者个人之间共享,还应该在那些同样能对教材发表意见的学习者之间共享,如图2所示,只有通过不断重复的互动交流,才能明确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

对此,我们在收集了学习者个人针对教材的“学习当事者需求”的基础上,在互联网上开发和构建了一个能够让学习者积累、共享、交流信息的平台。

(二)构建明确“学习当事者需求”的教材开发支援网站



图 4 教材开发试用调查专用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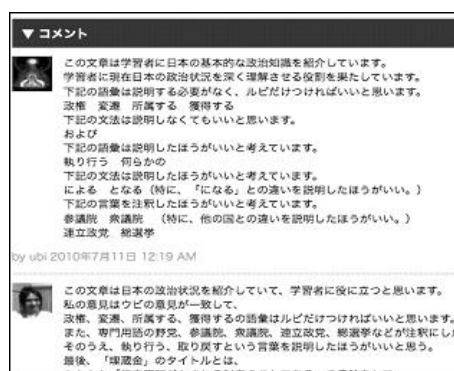


图 5 学习者对上传教材的意见发表功能

首先是提出企划案，并由工程师制作出相应的程序，然后在成员对其进行试用的基础上，由设计师在网站上发表设计并投入实行，正式在网上进行公布。从立案到实施的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

经过上述流程实际制作而成的网站具有如下功能(图 4)。^③

1. 上传教材功能

将本项目所开发的教材转换成 PDF 格式后，便能上传到网站上。此外还能随时发表留言来向学习者作出提示和说明(如试用的具体步骤、对需要给出反馈意见的地方进行特别提示^④等)。

2. 学习者对上传教材的五级评价功能

每位学习者的评价将自动由系统进行统计，并实时显示其平均值。由于没有设定统一的标准，所以这些评价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但却能够有效帮助我们去比较和把握每篇课文在学习者群体中的反响情况。

3. 学习者对上传教材的意见发表功能

学习者在对教材进行试用以后，能够对其发表意见或提出需求。发表的意见将根据发表顺序登载在网站上，并向全体注册会员公开。开发者将根据这些意见，对教材进行修改。随后再度上传到网站上，继续收集和吸纳来自学习者的意见和需求(图 5)。

(三)网站的效果

在以上列举的几项功能中，目前对教材开发试用调查专用网站起着最大作用的是“学习者对上传教材意见发表功能”。它并非是单纯构建开发者和学习者之间的试用调查平台，而

是通过积累、共享、交流每一位学习者的意见,来寻求和探究教学现场“学习当事人需求”,而不是学习者个人的“学习当事人需求”。

1. 学习者个人之间对“学习当事人需求”的意见互动

作为案例,以下将引用教材开发小组 A 所开发的教材的学习者(下文分别以“S1”、“S2”、“S3”代称)针对有关“败犬”(2004 年 YOU CAN 新兴语汇·流行语汇大奖“TOP10 语汇”)一文所发表的评论。

觉得非常有趣。不仅掌握了一个新的语汇,更是通过“败犬”一词,学到了渗透在文化层面上的东西。
(S1 对课文内容的评语)

“败犬”一词只需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查出它的意思。
(S2 对课文内容的评语)

↑在 SNS 中也有人提到知道“败犬”一词意思的人有很多。仅对其进行简单的说明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文章的读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当今日本人对于“败犬”的看法和评价。因此我认为应当加强对于这一部分的说明和阐释。
(S3 对课文内容的评语)

纵观以上评论后不难发现,在针对 S1 所发表的 S2 的观点基础之上,S3 更是结合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进行了评论。也就是说,学习者们在相互之间参考对方意见的同时,还进行着意见的交流和互动。此类互动现象在词汇和语法等说明部分中也同样可见。

2. 对其他学习者的“学习当事人需求”的考虑

有些学习者(下文以“S4”、“S5”代称)不仅是针对其个人的需求发表意见,更是在结合自身经验,并充分考虑其他学习者的“学习当事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提议。

虽然日语中“施設”(汉语意为“设施”)等单词的意思对中国人而言可谓一目了然,但由于正好和汉语中的字序相反,因此有些学生可能比较容易混淆。所以应当对它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順風満帆”(汉语意为“一帆风顺”)作为一个日本的成语,中国学生应该记住它。日语中“精力的”(汉语意为“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一词的用法和中文大相径庭,应当对此进行说明。最后在文中多处出现的外来语对中国人而言恐怕比较难以理解,所以最好能在注释中标注英文。
(S4 对课文内容的评语)

【手冢治虫、大塚英志、浮世绘、桂离宫、小津安次郎】一文中出现的有关日本的名人、建筑、艺术品等专业术语并非所有日语学习者都一一谙熟,因此对这些词汇进行注释,能够加深他们对文章主旨以及日本概况、日本文化的理解。
(S5 对课文内容的评语)

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人需求”并非仅仅由各个学习者独自掌握。其理由是,学习者个人所拥有的有关“学习”的知识,基本都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经验,而非从一个高处俯瞰整个教学现场的视角所得。为此,学习者们就需要在相互之间的意见交流过程中逐渐摸索和探究自己所属的“学习”现场中存在的“学习当事人需求”。

当然,要说在现阶段已经很明确地总结出了“现实学习需求”还言之过早,但至少可以说,为了能在今后让学习者持续不断地发表迄今为止都未曾被开发者充分认识到的“学习当

事者需求”,本研究中所开发的教材开发支援系统,作为学习者们阐述自身需求并进行相互间意见交流互动的平台,其作用不容小觑。笔者认为,像这样能够让学习者之间进行意见和信息的积累、共享、交流,是构建明确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的教材开发模式中的一大重要要素。

五、总结及今后的课题

上文主要论述了针对学习需求中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应对的领域(教学现场中“学习当事者需求”的全貌)而构建的“教材开发支援网站”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能适应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综合日语教材的开发模式。尽管以一直以来都难以得到明确的“学习当事者需求”为核心,构建了教材开发支援网站,但从网站的构建以及运行上来说,要体现出教学现场的“学习当事者需求”,必须使每个学习者的“学习当事者需求”都能得到积累、共享、交流。

本研究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1)对于在过去的日语教育研究中始终未能得到正确定义的“学习需求”,基于社会学领域中上野、中西(2008)等学者的理论进行分类,将教材开发中必须适应的“学习需求”界定为“第三者需求”、“共同需求”和“学习当事者需求”这三类需求的总和。迄今为止有关当事者与其需求的研究,主要是在性别研究、社会福利研究等社会学或教育学等领域开展,对于需求的类型化及其内涵的理解等问题都有所涉及。而在日语教育中,对于论述如何界定“学习需求”并在教材开发中将其明确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2)阻碍开发适应学习需求的教材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能够明确“学习当事者需求”,也未能将“学习当事者需求”有效地应用于教材开发之中。虽然迄今为止也有论文论述了相关内容,例如,适应学习需求的必要性(曹,2006;小林,2010)、学习需求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有效适应(刘,2008;田中等,2010)等,但本文提出,以往未能开发出适应学习需求的教材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对“学习当事者需求”在认识与应对上存在不足。

(3)为了有效排除(2)中所指出的原因,进而提出在教材开发过程中能持续不断地接收到“学习当事者需求”的方法(教材开发支援网站的构建及运行),并进一步验证其效果。

当然,关于本课题仍有诸多问题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首先,本文提到,针对学习需求中尤其未能得以明确的领域(教学现场中“学习当事者需求”的全貌),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活动,并考察了其效果,但对于实际完成后的教材最终能够有效地适应“学习需求”,届时可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验和考察。其次,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学习需求”的全貌必须将“第三人需求”、“共同需求”、“学习当事者需求”这三者综合起来进行把握,所以,通过何种途径将三者联系起来,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相应的理论框架。对于上述两个方面,希望能够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开展进一步深入的探究。

注:本文在“世界日语教育大会(ICJLE)2010”口头发言的基础上修改完成。本研究获得了以下奖学金的资助:青年精英研究奖励奖学金(Syiff)(捐助人:日本财团)、《日语教材开发创新方法论—面向中国的日语教材开发及中日韩合作体制的构建实践与研究—》

注 释:

①详见田中等(2010)。

②当初每当要开展一项调查,就会召集学习者和教师,在对其进行综合日语的模拟授课之后,进行试用调查。但正如川濑(2007)指出的,除去那些极少数拥有丰厚研究资金的研究机构,在教材开发过程中,为了反复进行的调查而动员学习者和教师是十分困难的。在教材开发中实施会导致过度负担的“学习当事者需求”调查并非长久之计,这种一次性的调查活动,最终将导致与接收贯穿于教材开发全过程的学习者反馈这一最本质的目的渐行渐远。鉴于此,为了能够有效排除来自于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经费等一切制约因素,以便能够持续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学习者的反馈意见信息,我们最后选择通过邮件的方式展开调查。

③除了本文所介绍的功能以外,还有“学习者对教材的提案功能”、“问卷的制作及统计功能”等,但由于目前尚处于数据的收集阶段,故在本文中不作进一步介绍。

④例如,“文章的内容能否在学习中起到作用,在内容上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需要加以说明的词汇、语法及其理由”、“需要加以注释的词汇、语法及其理由”、“需要注音的词汇、语法及其理由”、“无需说明的词汇、语法及其理由”等。

参考文献:

- [1]上野千鹤子、中西正司:《面向需求本位的福利社会》,医学书院,2008年。
- [2]冈野喜美子、长田纪子、修克阳子:《需求调查报告与分析——以国际部教科书的编写为前提》,《讲座日语教育》第26分册,1991年,第231-247页。
- [3]小泽伊久美:《处于范式转换期的日语教育——从教育学的视角思考日语教育》,《ICU日语教育研究中心纪要》,第10卷,2001年,第29-39页。
- [4]川濑生郎:《有关日语教材开发月教科书编写的课题》,《日语教育》第135期,2007年,第23-28页。
- [5]小林美奈:《顺利通过日语教育能力检定考试的教授法37》,2001年。
- [6]筱崎摄子《关于精读教材正文》,《日语教学与教材创新研究——日语专业基础课程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1-156页。
- [7]田中祐辅、伊藤由希子、王慧隼、肖辉、川端祐一郎:《面向中国日语专业大学生的日语教科书的课题——对学习学习者学习状况调查的分析》,辽宁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编:《大学外语研究文集》,第11卷,长春出版社,2010年。
- [8]三浦文夫:《关于社会福利中的需求》,《社会福祉政策研究》,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1985年。
- [9]吉冈英幸主编:《彻底导读日语教材》,凡人社,2008年。
- [10]古田薰:《何谓教育性的“需求”:有关“需求”概念的考察》,《教育行财政论丛》,第9卷,2005年,第31-45页。
- [11]曹大峰主编:《日语教学与教材创新研究——日语专业基础课程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 [12]修刚:《从“大纲”的制订过程看精读教育的成果与课题》,《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2002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论文集 日本研究的深化与拓展》,2002年。
- [13]冷丽敏:《关于中国大学“综合日语(精读)”的民意调查——比较学习者和教师的回答》,《日本语言文化研究会论集》,2005年,第59-73页。
- [14]刘玉茹:《中国四川省西华大学日语教育概况》,《大学教育》,第5卷,2008年,第21-33页。
- [15] J.Bradoshaw, “Taxonomy of Social Need,” in Goldon McLachlan ed., *Problems and Progress in Medical Care: Essays on Current Research*, 7th Se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田中祐辅: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外籍教师 责任编辑:徐静波)

论吉本芭娜娜的《厨房》

吴沛瑾

内容提要 吉本芭娜娜在《厨房》小说中,以主人公樱井御影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描写御影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祖母后所遇到的人和事及其心路历程。故事以祖母之死为起点,描述御影从一开始的逃避,到后来的寻求释怀及慢慢释怀的一系列过程。本文将讨论其以《厨房》为题的原因以及“厨房”这一场所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 吉本芭娜娜 厨房 死亡 治愈

吉本芭娜娜于1987年以小说《厨房》获得第6届“海燕文学新人奖”,陆续又获得“泉镜花”、“山本周五郎”等大奖。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常常运用死亡来表达文中意旨。她曾被问过是否特别喜欢“死亡”的题材,而她回答:自己并非喜欢死亡题材,她关注的是人如何从低潮中重新找回希望、重新振作的过程。

本论文以日本《新潮文库》的《キッチン》为蓝本,以时报出版社吴继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厨房》为参考,对吉本芭娜娜最有名的代表作《厨房》进行读解分析。

《厨房》一书里有两个故事,《厨房》与《月影》,内容描述遭逢重大生命变故摧心的痛楚、人生漂泊不定的寂寞之感,但在最绝望中出现的契机、漂亮的结局,让人在阅读中产生一种温暖心安及释怀的感觉与前进的勇气。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处于一种淡淡的忧伤之中,但又不是沉重的、令人坠入深渊般的深沉,相反却给人轻盈纤细、温柔温暖的感觉。同一本书中另有厨房的续篇《满月——厨房2》,然而个人认为,作者欲表达的,从亲人死亡中重新振作及找回生存勇气的意图,在《厨房》一文中已经表达的很充分了,因此本论文将重点放置于《厨房》本文中,《满月——厨房2》则作为点缀性分析叙述。

一、原文中“厨房”一词的运用——「台所」「キッチン」「厨房」

在中文版本的《厨房》中,日文原文中的「台所」「キッチン」「厨房」三个词,一律被翻译成“厨房”,这也是因为中文的普通话里,除了厨房之外,没有其他的词可以来表示“烹调食物的地方”了。然而在日文中,“烹调食物的地方”有数个名词可以表达。在本文中便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词语,分别为「台所」「キッチン」「厨房」。

文中出现「台所」的部分共有29处,试举数例:

・私はこの世でいちばん好きな場所は台所だと思う。(第9页)

我在这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了。

・台所なら、いいなと思う。(第10页)

只要是厨房就觉得很好。

・でも、台所があり、植物がいて、同じ屋根の下には人がいて、静かで……ベストだった。(第 26 页)

但是,有厨房、有植物,同个屋檐下有人陪着,又安静,这最棒了。

・真夜中、しんとした台所に声がよく響いて楽しかった。(第 54 页)

在深夜中,寂静无声的厨房中响起了声音感觉真轻松快乐。

・それともいつかまた同じ台所に立つこともあるのだろうか。(第 61 页)

将来某一天我们应该还会站在同一个厨房里吧。

「台所」这一个日语词汇是本文中用得最多的,从以上的例子看来,无论是主人公御影和祖母生前居住的房子的厨房,或是祖母死后御影暂住的田边家的厨房,或者是泛指厨房这一个场所,作者都使用了日语中最感亲切的和语「台所」,而在一般日语口语中,在表达日式厨房的时候,「台所」是三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而在文中,「厨房」和「キッチン」则各只出现过一次,如下:

ふと気がつくと、頭の上に見える明るい窓から白い蒸気が出ているのが闇に浮かんで見えた。耳をすますと、中からにぎやかな仕事の声と、なべの音や、食器の音や聞こえてきた。——厨房だ。

突然回过神来,我看到头上的明亮窗户中流泻出的白色水蒸气浮在黑暗中。仔细倾听,其中传出了热闹的工作声、锅子的声音、餐具碰撞的声音。——是厨房。

当主人公御影在公交车上泪流满面,情绪崩溃,急急下了公交车,转进小巷,蹲下哭泣之后,让御影渐渐从悲伤的情绪中苏醒过来的,是另外一个“厨房”,此处作者使用了「厨房」一词。

而「キッチン」除了作为书名之外,在故事接近结尾处也出现了:

夢のキッチン。

私はいくつもいくつもそれをもつだろう。心の中で、あるいは実際に。あるいは旅先で。ひとりで、大ぜいで、二人きりで、私の生きるすべての場所で、きつとたくさんもつだろう。

梦中的厨房。我将会拥有很多个梦中的厨房吧。在自己的心中,或是在实际生活里,或是在旅途中。可能是自己一人的厨房,或是很多人使用的厨房,或是两人用的厨房。在我接下来生活的所有场所中,想必还会有很多很多吧。”

作者在最后一个提及“厨房”的地方,使用了与书名相同的外来语「キッチン」(kitchen)。这里的「キッチン」与前面的「台所」、「厨房」相比较,似乎不是指那么“实体”的东西了,这里不是指主人公御影或田边家中的厨房,也不是外面餐厅的厨房,而是一种“概念”。作者这里的「キッチン」,可说是将来人生中,再遇到类似的低潮或不如意,可暂时躲避、寻求心灵安定和慰藉的地方。

以日本人对这三个词的感觉来说,「キッチン」、「台所」、「厨房」这三个词中只有「台所」是传统的日本文字,也就是和语,借用汉字来写,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也极高,对日本人来说有一种亲切、熟悉且直观的感觉。而「キッチン」是日本在和西洋文化接触之后才传进来的外来语,所以给人一种比较现代、或者说是时髦的语气及印象。「厨房」则是从中国输入的词汇,所以和「キッチン」一样,有一种非日本传统的、来自外界的味道,对于日本人来说,「厨房」有一种非家庭式的,而是餐厅、餐饮业中专业厨房的感觉,多用在业务性质的厨房,也比较不那么亲近。主人公御影下了公交车,蹲在别人厨房下哭泣,那个厨房中还流泻出碗盘碰撞的忙

碌声音,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成,御影是蹲在餐厅或是料理店的窗户下哭泣的。与其说是作者刻意去区分两个情景,不如说是作者用字相当精确,因为一般日本人不会用「厨房」来称呼自己家的“厨房”,而作者很巧妙地利用语言习惯非常自然地表现出御影“内心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她内心认同的“厨房”,如自己和祖母的家、田边家的厨房,作者都使用了「台所」,而不属于御影内心世界有所寄托、依赖的厨房,如餐厅的厨房,作者便使用了「厨房」一词。而最后外来语的「キッチン」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比较偏向像是御影心中的象征,并非指真正实体的、形象化的厨房。

二、以《厨房》为题

故事的一开始便直接明了的写道:我在这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了。

这样的开场白令人一目了然,和文章题目相当契合。接着提到不管是干净的厨房或是相当有生活感的、脏乱的厨房,都让主人公御影爱不释手,文中第一次提到“死亡”一词也是在这样一个突然的话题之中展开:

每当我真的累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我经常恍惚地想着。要是那一天面临死亡,我想在厨房咽下最后一口气。即使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地方也好、或是有人陪伴温暖的地方也好,我都想毫无畏惧的睁大眼睛看着,只要是厨房就觉得很好。

一般我们说到希望自己死去的地点,大抵都希望是最令自己心安的地方,而主人公御影希望自己死去的地点是在厨房,可见主人公对“厨房”这一地点的眷恋和依赖。作者除了用“厨房”来表示主人公的眷恋之情之外,也是欲借由“厨房”这一地点,贯穿接下来一连串主人公御影从伤痛中疗愈的过程吧。

三、面对“亲人之死”

1、御影与绘里子的不同态度

小说中提及的两个“死亡”,一为主人公樱井御影的祖母之死,二为绘里子的妻子(即田边雄一的亲生母亲)之死。而面对这两个死亡,被遗留在人间的人该如何自处,故事中也描写了两种相当不同的态度。

首先是御影,她搬离了和祖母生前共同生活的公寓,住到了几乎可说是陌生人的田边母子的家中,面对着和之前生活几乎毫无关联的新环境,把自己的身心都躲藏起来,找一处安心的、不受过去回忆干扰的地方栖息。

而另一方面,绘里子的情形,乍看之下他甚至把性别都更换了,似乎比御影逃离的更彻底,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他把自己的所见所行,都微调至爱人(泛指一切在爱的条件底下交往的人们,包括父母、好友、妻子)的频道,不管是对方的衣服还是贴身饰品,甚至性别都揽在身上,假装一切的氛围都未曾波动。

2、“厨房”的象征意义

除此之外,“厨房”这一地点的象征意义也相当令人玩味。厨房在家庭中的功能为制作食物,而食物对人的意义则在于补充能量,并借此延续生命。因此或许可以认为,比起浴室或卧室,厨房可说是家庭中最具有“生命”意义的场所。而作品中,主人公御影在祖母死后,为了躲

避家中空无一人的空虚,甚至连夜里也坚持睡在厨房里。而当御影一个人在公交车上崩溃流泪时,也是因为看到别人家厨房的剪影和气味,便重拾了活下去的希望。

并不是因为什么事情感到悲伤,我只是单纯得有想流泪的冲动。突然回过神来,我看到头上的明亮窗户中流泻出的白色水蒸气浮在黑暗中。仔细倾听,其中传出了热闹的工作声、锅子的声音、餐具碰撞的声音。——是厨房。

我从无可救药的黑暗中转变成明朗的心情,我抱着头轻轻地笑了。然后我站起来、整整群众,向今天预订回去的田边家迈开步伐。

神啊,请让我继续活下去。

这除了御影本身的喜好之外,恐怕也是由于厨房带有一种“延续生命”的内在意义,使得御影能在厨房中找到慰藉及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

文中除了主人公御影的祖母之死之外,还有另一处提及死亡,即为田边雄一的亲生母亲之死。文中对雄一的亲生母亲并没有太多着墨,因为这并非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作者的重点或许也是在于雄一的父亲(即绘里子)走出其妻子之死的特殊方法——变性成为女人。但在这一段插曲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同御影之于厨房,绘里子选择了怎样的环境去使自己逃离妻子之死的伤痛。文中描写道御影第一次拜访田边家的场景:

在看的到阳台的落地窗前,排列着如同丛林般的植物种植在盆栽中,仔细看看家中到处都是花草。所到之处的花瓶里插满着当季的各种花卉。

田边家的客厅窗前和家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植物和花草,可见绘里子制造了一个充满绿色生机的花园。实际上在后文《满月——厨房2》中也说明了,绘里子的第一盆盆栽——凤梨,其实是为了安慰病重的妻子而买的,而在妻子过世后,绘里子才开始她栽种植物的生涯。因此似乎可以归纳出,绘里子逃避妻子死亡的痛苦且寻求慰藉的环境即为“花园”。在生活中,植物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存在及生生不息的印象,植物在凋零之后,种子落入土壤,仍会发出新生的枝桠,延续生命的意味可说是相当浓厚。因此御影之于厨房,就如同绘里子之于花园,两个场所“厨房”和“花园”皆带有延续生命、“生”的气息,两个场所皆是在亲人之死后,寻求心灵慰藉及生存勇气的好地点吧。

3. 死亡与恋爱的结合

吉本芭娜娜是一名年轻女性作家,她刻意地轻描淡写,刻意地把文章写得很美。第一次读完之后,吉本芭娜娜的作品给人一种少女漫画的感觉。比如说厨房的续篇“满月”的故事,以“死”为桥梁而开始接触的男女,一直处在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暧昧不明状态中,最后以“食”为桥梁展开了进入爱情的状态。其中一幕,一位女性抱着一碗非常好吃的猪排饭,在深夜里造访男人的旅馆,这一幕感觉就是非常少女漫画的。这里或许还可以把食欲理解成所谓的性欲,然而我觉得芭娜娜的作品还是照字面上来理解会比较贴近原意,不顾一切地想把好吃的猪排饭送到爱人身边的那种欲望。大部分女性所向往的爱情故事是稍稍哀伤带点痛苦的。而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刚好满足了这一点。因此普遍女性读者都会喜爱吉本芭娜娜这样的作品。

另一方面,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常常高频率地出现死亡,读者常常遭到死亡阴影的覆盖。祖母之死、恋人之死、朋友之死、情敌之死、宠物之死等等。她的作品的文学性常常来自死亡而非恋爱,然而在她的作品中,死亡的阴影和恋爱的甜蜜就如同情侣一般常相左右,而且她的作品中的死者,并非是把生者带入死亡境界的绝望使者,而往往都是带给生者继续活下去

力量的温柔的存在。这种不可思议的温柔也许就是吉本芭娜娜文中的精髓,也是她广受欢迎的秘密。

四、从绝望到希望

1、御影的那场梦所寓含的意义

主人公御影在处理好一切旧房子的事情之后,在公交车上因为一对祖孙的互动而勾起自己对祖母的相思之情,眼泪决堤地大哭了一场。御影回到田边家,躺在她的沙发上安心地睡去。接着,作者描述了主人公御影的梦境。在梦中,御影和田边雄一回到了御影之前的家,两人做着一般的家务事,聊着天,然而这时田边雄一说出了一番挽留御影的话:

“你正打算搬出我们家吧。别搬走啦。”

他说的话和之前的话题完全没有关联,我惊讶地看着雄一。

“我想你或许觉得我像绘里子一样,是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吧。但是把你叫到家里来住,是经过认真考虑才下的决定。老奶奶一直都很挂心你的事情,我想最了解你的心情的人大概是我吧。我知道你一旦恢复精神,不管我如何挽留,你也一定会搬出去的。但是现在的你还没办法吧。如果没有亲人告诉你你现在还没恢复,那就由我来告诉你。我妈妈赚的多余的钱就是为了这时候用的,不是只为了买果汁机啦。”他笑着说。

这一段由雄一劝说御影留下,继续住在田边家的话,相当真切感人。第一次阅读《厨房》的读者恐怕会惊讶于田边雄一对御影的心理状态与感情如此观察入微,如此体贴细腻。但看到后来才发现,这一大段的话,都是在御影的梦境中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一番话,或许其实是御影对自己的心灵喊话。御影其实一直都在盘算着要尽快搬离田边家,以免给田边母子带来麻烦,但其实内心已经产生了依赖,无论是对沙发、厨房,还是对田边母子。因为在遭逢亲人骤逝的巨变之后,是田边家带给他能够安心托付身心灵的环境,因此御影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些离不开、放不下了。雄一说到“最了解你的心情的人,大概是我了。”这一段话,除了表示了解御影的人还是只有御影之外(毕竟这单纯只是御影的梦境),也表示了御影内心深处渴望有人能够了解她“想依赖”的心情,而最佳人选正式朝夕相处的田边雄一。而接着梦中的雄一又说道“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不要勉强自己,就由我来告诉你吧。”这段话也深深的透露出御影孤单无助的心情了,御影深感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有立场告诉她可以放松一下,因此这样强烈的心情也在她的梦境中表露无遗,这个梦境也透露了御影愿意接纳田边一家的好意了。这个梦境可说是御影的心灵从封闭到接纳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吧。

2.御影和绘里子的谈话

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公认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治愈人心”。这篇代表作《厨房》也是如此。其中让读者和主人公御影最感温暖的恐怕是故事结尾处,绘里子对御影的那番话了:

“我觉得御影跟我特别有缘,才特别想跟你说的,我也是在拉拔雄一长大的时候才了解这些事的。痛苦的事真的太多太多了。真的想要自立的人的话,就养个什么东西吧。养小孩、养植物什么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了。一切都是这时候才开始。”

她像唱歌一般,说着她的人生哲学。

“很辛苦吧”

我感动地说着。

“还好啦。但是人生若没有绝望过一次的话,就不知道自己真正无法割舍的是什么,这样的话也就不知道真正的快乐、莫名其妙的长大了。我是幸运的呢。”她这么说着。

这一段话的确给了读者和主人公御影继续走下去的勇气。的确,或许有的人一生中从未品尝过彻底绝望的滋味,在普罗大众的价值观中似乎是一件幸运的事。然而这里作者却提出了反向思考,如果不彻底地绝望过一次,那么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了,不知道真正对自己重要的、无法割舍的东西是什么了。如果就这么不知道下去,那么也就不知道真正打动自己的快乐是什么了。也就是说,其实每一次的“绝望”,都不会是表面意义上的失去,生命会从别的地方补偿你一些什么,借由这次的绝望,进而更了解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定义自己,也不失为一件幸福的事。这样的一番体悟,实实在在地激励了读者,提供了读者换位思考的方向和接受困境的勇气。

3.如同宗教一般的存在

文中提到了御影在下了公共汽车后无法自拔的哭泣,直到看到餐厅厨房传出的白烟和忙碌的声音,心情才豁然开朗,像获得重生的勇气一般,拍拍裙子继续往前走。这段调适的心情就仿佛是有神的指引一般那样强而有力且不可思议。更令读者感到神奇的是田边雄一和御影似乎梦到了一样的梦这一段,互相给予彼此支持鼓励,且说出了内心话,让人不禁怀疑是否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些都显示了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似乎有那么一点宗教性的暗示,这点也是吉本芭娜娜在接受访问时曾经说过的,希望能给读者宗教般的力量,使读者从绝望的心情转换到具有希望的心境,而从此书广受欢迎的事实上也证明了《厨房》或许真的带来了读者宗教般的治愈疗效。

五、结 论

吉本芭娜娜的《厨房》,在坊间普遍被称为“治愈系小说”。描写主人公御影在失去了人生最后的血亲之后,在田边家重新振作的故事。即使感到孤立无援,依然表示“好几次陷入痛苦好几次又恢复。我不会认输、也不会感到绝望。”可以看出这篇故事想表达的意旨仍然是对人生充满希望的、充满前进力量的。

本论文先从题目“厨房”出发,对主人公重新获得希望的两个重要场景——“梦境”、“和绘里子的对话”加以琢磨,得出此篇小说真正获得读者喜爱、触动人心的温情之处,是在于绝望中得到新的心灵慰藉,借由他人的经验和温暖找到重新振作的方向和动力。

参考书目:

[1]よしもとばなな『キッチン』、新潮文庫、2002年。

[2]吉本芭娜娜:《厨房》,吴继文译,时报出版,1999年。

(吴沛瑾: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中心大事记

2010 年下半年

- 7 月 1 日 日本经济广报中心调查员加藤博也一行来访。
- 7 月 8 日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天儿慧教授一行 5 人来访。
- 7 月 11-14 日 郭定平教授赴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
- 7 月 19 日 日本三起商事企画部寺本部长来访。
- 7 月 23 日 张浩川副教授参加中日地域论坛,并作题为“世博会与中国经济”主题演讲。
- 8 月 1-7 日 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赴日本北海道大学访问。
- 8 月 11 日 日本能率协会研究员横田等一行来访。
- 8 月 16-21 日 贺平讲师率本校 13 名学生赴庆应义塾大学交流。
- 8 月 18-22 日 复旦大学、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韩国崇实大学、俄罗斯远东国际大学四国学生论坛,共 50 余人参加。张浩川副教授率本校学生 7 人出访韩国崇实大学交流。
- 8 月 19-29 日 沈浩老师率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实验小学访日团赴日本坂城町访问。
- 9 月 6 日 日本研究中心一成蹊大学交换留学生项目互派学生,为期一年。
- 9 月 9 日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中心新楼落成,办公地点从光华楼搬至燕园日本研究中心新楼。
- 9 月 11 日 中心与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第一届复旦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亚地域合作论坛,主题为“非传统安全保障与可持续发展”。天儿慧(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等专家学者 200 人参加。
- 9 月 14 日 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学生一行 6 人来复旦短期交流。
- 9 月 17 日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生一行 25 人来复旦短期交流。
- 9 月 18-20 日 徐静波副教授参加在京都大学举行的中日韩三国研讨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终生教育”,并发表论文“我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浅见”。
- 9 月 21 日 日本关西大学校友会横山一行 8 人来访。
- 9 月 22 日 日本能率协会研究员肥本英雄一行来访。
- 9 月 22-24 日 胡令远教授赴香港大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当选为在香港成立的中华日本学研究协会副会长。
- 9 月 24 日 日本同志社大学国际交流中心西岗一行来访。
- 9 月 25 日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国分良成来访。

9月26日	日本同志社大学八田英二校长一行5人来访。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副主任张浩川副教授参加接待。八田校长一行参观了中心新楼以及位于新楼中的同志社大学上海事务所。
9月26日	日本三井化学中国总代表得丸洋来访。
9月27日	日本长野县坂城町町长中泽一一行20余人访问中心。
10月1日	香港大学外文学学院院长王向华教授一行4人来访。
10月4日-6日	贺平讲师参加复旦大学、美利坚大学、蒙特雷理工研究院、高丽大学、立命馆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六校国际学术研讨会“相互认知与双边关系”，并作分科发言。
10月12日-11月2日	复旦·三井物产冠名系列讲座“日本社会与文化”举行，讲座为面向全校师生的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的学者专家就日本社会与文化主题进行演讲。本期分为4讲：10月12日，“日美企业文化比较”（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亚洲大洋州本部副本部长魏杰）；10月19日，“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与中国比较的视点”（中心胡令远教授）；10月26日，“中国与日本之间”（复旦大学外文学学院庞志春副教授）；11月2日，“中国当代文学阅读视野中的日本现当代小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振声副教授）。
10月13日	京都友好人士船越邦夫等2人来访。
10月13日	日本能率协会专务水藤一行8人来访。
10月14日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田岛俊雄来访。
10月15-24日	张浩川副主任出访日本京都大学、关西大学、同志社大学、龙谷大学等，出席日本能率协会研讨会并作题为“中国BOP事业的可能性”的主题演讲。
10月21日	日本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一行6人来访，郭定平教授被授予日本熊本县亲善大使。
10月22-26日	胡令远教授应邀参加日本奈良迁都1300年庆典活动，参加“第11届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日本大会”，并作基调讲演。
10月23-24日	徐静波副教授赴北京参加北京联合大学举办的“人文北京与世界大城市建设”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东京都公益性文化体系建设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10月27日-11月1日	郭定平教授赴加拿大参加亚洲学会2010年会。
10月29日	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调查处高级研究员熊本五郎访问中心，并作2010瑞穗证券冠名讲座第一讲“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規制改革的方向”，校内师生60余人参加。
11月1-13日	日本学习院大学经济学部奥村洋彦教授来中心作短期研修。
11月4-11日	沈浩老师陪同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赴日本东京访问早稻田大学。
11月8日-9日	贺平讲师参加“东亚共同体与中日韩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分科评论。

- 11 月 10 日 三菱商事上海总经理山口一行 3 人来访。
- 11 月 11 日 上海领事馆领事佐治、文化领事德增香来访。
- 11 月 12 日 日本赛路特公司总裁宫岛一行 3 人来访。
- 11 月 16 日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校园宣讲会在中心举行。
- 11 月 18 日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佐佐木智弘来中心作访问研究, 为期 1 年半。
- 11 月 19 日 瑞穗证券股份有限高级研究员杉浦秀德访问中心, 并作 2010 瑞穗证券冠名讲座第二讲“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与企业行为的变化——对本次金融危机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校内师生 50 余人参加。
- 11 月 19-21 日 由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办的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庆典暨第 20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中日竞争与合作”隆重举行。原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徐敦信出席庆典并发表主旨演讲,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吴江浩、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宋耀明等出席并致辞。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银行、日本战略研究所, 以及东京三菱 UFJ 银行、瑞穗证券、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三井化学、卫材等 10 余家大型日本在华企业的代表出席庆典和会议。研讨会分为经济、政治与安全保障、社会文化三个分科, 深入进行了探讨。就“中日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伊东光晴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与会代表 200 余人。
- 11 月 21 日 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毛里和子教授向中心捐赠一批图书。
- 11 月 21-25 日 魏全平副教授赴日本访问, 自今年开始承担日本文部省课题(2010-2012 年)“中国解决贫困的财政支持与储蓄(资产)水平的效应——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比较分析”。
- 11 月 23 日 日本经济广报中心顾问、欧姆龙株式会社特别顾问、欧姆龙前董事长立石信雄一行 10 人来访, 在校逸夫楼报告厅为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举行特别纪念演讲, 题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成长历程”。我校师生 180 余人出席了演讲会。
- 11 月 23 日 日本财团法人日本经济广报中心为庆祝我中心成立 20 周年举行捐赠仪式。
- 11 月 23 日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驹形教授及该校学生一行 15 人来复旦交流。
- 11 月 26 日 日本瑞穗证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三坂希一来访。
- 11 月 27 日 戴晓芙副教授赴东京参加日本学生援助机构和日本武藏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并发表论文。
- 11 月 29 日 结合十二五规划, 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党委书记沈兰芳来中心调研。
- 11 月 29 日 日本能率协会经营研究所所长上野一行 2 人来访。

- 11 月 30 日 由中心和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合作主办的 2010 年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在中心举行。获奖名单如下:一等奖贝敏(经济学);二等奖蓝阳(经济学)、凌云志(国际政治);三等奖温永腾(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刘振声(广告学)、周欢(日语)。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森健、企划业务部部长高波喜一郎、企划业务部副部长内山正男、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日语系主任庞志春教授、中心副主任张浩川副教授、沈浩老师等参加颁奖仪式并为获奖同学颁奖。
- 12 月 2 日 日本自民党前议员木原诚二等来访。
- 12 月 2 日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校园宣讲会在中心举行。
- 12 月 3 日 日本肥后银行上海代表处高原一行来访。
- 12 月 16 日 贺平讲师获 2010 年度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 12 月 8-14 日 郭定平教授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访问。
- 12 月 10 日 日本武藏野市商工会议所吉田一行来访。
- 12 月 13 日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亚太课守屋、上海领事馆领事佐治、副领事长田一行来访。
- 12 月 14-17 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参加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研讨会,并作题为“中国 BOP 事业的现状”的主题演讲。
- 12 月 15 日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憇家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杨栋梁访问中心,并分别就“关于东亚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若干问题”、“技术·制度创新与经济现代化——日本的启示”发表演讲,我校师生 40 余人参加。
- 12 月 21 日 日本山口大学师生一行 17 人来访,张浩川副教授作题为“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的讲座。

(华 莉)

目 录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纪念特稿·

- 关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由来、内涵和面临的课题
——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庆典暨
第 20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徐敦信(1)
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庆典暨
第 20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伊东光晴(4)

·政治·经济·外交研究·

- 2010 年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日美关系、中日关系
..... 林晓光 周 彦(5)
“天安舰”事件与“韩美同盟”
——兼论对日本的影响 刘永辉(14)
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演变及挑战
——以外务省机构改革为中心
..... 包霞琴 松本久美(20)
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政策与日本外交 田 凯(28)
金大中政府对日外交政策评析 金敬珍(37)
浅谈日本的文化外交政策 朴宰范(42)
“清迈倡议多边化”研究
——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视角 范博伟(48)
中日韩 FTA 研究 朴昭姬(53)
日本和韩国对美国进口牛肉政策的比较研究 朴昶盈(60)

·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 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 乐 敏(64)
赴华与赴日之美国传教士对美国东亚政策影响之比较
..... 袁 瑒(71)
由《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看“八·一三”事变之后的上海形象
..... 徐 青(82)
东亚地区青年的东亚认同与价值取向 刘岱崧(89)
论体现“学习当事者需求”的教材开发及其支援网站建设
..... 田中祐辅(99)
论吉本芭娜娜的《厨房》 吴沛瑾(107)
附:中心大事记 华 莉(113)

主 编 胡令远
副主编 贺 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振声 陈建安
林尚立 郑勵志
胡令远 郭定平
贺 平 徐静波
樊勇明 臧志军

2010 年下半年刊
(总第 35 期)
2010 年 12 月出版

稿 约

一、本刊为日本研究的综合性刊物,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我国日本学研究的繁荣和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向校内外从事日本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诚意征稿。

二、凡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教育、法学、新闻传媒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均受欢迎。立意新颖及从中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文章尤受欢迎。

三、来稿要求:

1. 字数一般在五千至一万之间。
2. 文稿请用 A4 纸打印。来稿一般不退,三个后未接到通知的,请自行处理。
3. 正文前请附“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务请附在文后。
4. 请详写作者真实姓名(用笔名者)、职称、通信地址(包括工作单位、部门和邮编),以便联系。
5. 来稿请寄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集林》编辑部,邮政编码 200433,同时将电子文本发送至如下邮箱:

huali100@fudan.edu.cn

四、来稿一经采用,即奉致稿酬。